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学 子 报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道德认知视角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校院系党组织的制度体系与能力建设
孕育「中国新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实践路向

2020.12

(总第 276 期)

欢迎订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月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是由教育部主管、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教育管理类学术期刊。本刊已成为高等教育管理者、研究者与实践者对话的平台，教育决策部门与实践工作部门双向互动的桥梁。本刊主要栏目：教育学人、书记校长文萃、高校管理案例研究、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教育基本理论、专题研究、考察调研报告、国际视野等，随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求，相继增设新栏目。

全年共 12 期，总计约 180 万字，15 元/月，180 元/年。

- 订阅方式：
1. 欢迎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82-484。
 2. 关注“中国邮政微邮局”公众号，输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网上订阅。
 3. 批量订阅欢迎联系通过以下方式订阅。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 郭老师
电话：010-69226801、69241029
010-69248888 转 3568
邮箱：dingkan010@163.com
传真：010-69260513
QQ：1559874143；QQ：2927191594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账号：0200053009008801215
户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教育管理杂志社



公众号

订阅回执单可在学院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下载

网址：<http://www.naea.edu.cn> 网页路径：主办期刊/广告发行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订阅回执单

(本表复印有效，请用正楷书写)

单位名称			电子邮箱		
订阅部门		订阅人	联系电话		
刊物邮寄地址	省	市(县)	区(乡镇)	街道	邮编
订阅份数	《学报》份		订阅时间	20 年 月至 20 年 月	
汇款人或单位			是否挂号	○是(邮费3元/月)	
汇款金额				○否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电子发票邮箱			*收票人电话		
备注					

- 特别提醒：
1. 银行汇款请务必注明单位及汇款人；
 2. 平信邮寄刊物存在丢失现象，为确保贵单位及时、安全收到刊物，建议您采取挂号邮寄；
 3. 请将本表填好后及汇款凭证一并传真(自动传真)、拍照上传 QQ 或发邮箱，即完成订阅；
 4. 刊物多个邮寄地址可另附详细地址表；
 5. 请务必填写发票接收电子发票邮箱及联系电话，如需纸质发票请在备注栏注明详细收件信息。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月刊)

2020年第12期(总第276期)

目 录

编辑委员会

主任 侯慧君

副主任 韩旭 于京天

编委 (按音序排列)

陈丽萍 陈晓宇 陈子季

丁月牙 葛道凯 郭垒

韩震 胡敏强 胡锐军

黄晓玫 李曼丽 刘亚荣

刘元春 卢晓中 马怀德

孟繁华 沈壮海 石中英

王炳林 邬大光 邢晖

许杰 许玉乾 杨晓慧

游旭群 于建福 于鲁文

袁振国 张婕 张卫国

周玉 周作宇 朱庆葆

主 编 侯慧君

常务副主编 吕文妙

副 主 编 蒋园园

编 辑 吴 虑 吴潇剑

刘 红

美术编辑 张进美

录入排版 梁京京

本期执行编辑 吴潇剑

教育 学 人

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道德认知视角

俞国良 3

专 题 研 究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若干特征转变

研判与对策

刘在洲 12

孕育“中国新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

示范区的实践路向

王志强 20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挑战与战略选择

蒋凯 28

学 员 论 坛

创新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郭雳 38

加快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助力发展高质量教育

刘三女牙 46

目 录

面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等学校智慧校园研究 李武 52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校院系党组织的制度体系与
能力建设 方明 59

教育基本理论

高校美育的逻辑起点、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 王萌 68

强才智与强素质：素质教育改革新认识 陆一 76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优化探析 闫雪琴 刘永栓 90

致作者： 作者文责自负；
来稿如在一个月未接到
联系，请另投他刊；本刊
不收取版面费、审读费等
任何名目费用；本刊对刊
发的文章享有网络传播
权，如有异议，请在来稿
中注明，未声明者，本刊
视为同意。感谢您对本刊
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编辑部 010-69248888 转 3122
投稿邮箱 xuebao@naea.edu.cn
在线投稿 [http://gjxz.cbpt.cnki.net/
EditorEN/index.aspx?t=
1&mid=gjxz](http://gjxz.cbpt.cnki.net/EditorEN/index.aspx?t=1&mid=gjxz)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出版发行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教育管理杂志社
发行范围 国内外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青源北路8号
邮 编 102617
网 址 www.naea.edu.cn
传 真 010-69260513
广告发行 010-69241029
010-69226801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0年12月15日

征订单
黑河学院

封二
封三、封底

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 道德认知视角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 大中小幼道德认知发展与心理健康教育同步, 且互为因果。首先, 从道德认知发展的理论、内涵、功能和结果考察, 它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 从大中小幼道德认知发展走向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分析, 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举足轻重, 这是从道德认知视角梳理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内容的理论依据; 最后, 道德认知发展为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保驾护航, 应从关注社会消极现象的影响、加强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协作、重视道德认知的监测与干预三个方面, 痛下功夫, 追求实效。

关键词: 心理健康; 道德认知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03-09

当前,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发展阶段, 这不仅体现为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社会结构性变革, 还涉及社会和个体的心理性变革。^[1] 其中, 最为凸显的就是由社会快速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道德困境, 包括信仰缺失、道德冷漠、诚信缺乏与社会责任感、价值取向扭曲等。这些道德危机的出现, 已然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道德教育一直被公认为是学校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但无论是道德动机的激发、道德人格的塑造, 还是道德情感的熏陶、道德意志的培养, 实际上都离不开各个学段的心理健康教育。从个体发展的视角考察, 心理健康的发展规律、学生人格发展和其年龄特征不谋而合,^[2] 同时也与学生道德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殊途同归, 尤其是学生道德认知的发展轨迹, 更是与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休戚相关。

一、道德认知发展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个体心理发展的一个方面, 道德发展是个体认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 形成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过程。其中, 道德认知是道德发展的核心, 包括道德印象的获得、道德概念的掌握、道德评价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道德信念的产生和道德观念的形成等。毫无疑问, 一切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及道德行为的表现, 都是自身依据有关道德认知, 即对善恶是非、社会准则及其执行意义的认识、判断与推理而进行分析决策的结果。^[3] 在传统观念中, 学校德育工作统领了道德教育的一切内容, 它不仅关注社会伦理道德规则及道德规范的传授, 而且强调道德理论知识的学习与道德

收稿日期: 2020-11-19

作者简介: 俞国良, 男,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 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行为的培养、训练。然而,有研究者指出,在我国学校德育实践中,一方面充斥着大量与教育对象自身认知结构不相适应、理想化、绝对化的教育内容;^[4]另一方面教师与社会的权威人士又常常凌驾于教育对象对道德的真实认知之上,导致德育成为书本上刻板的文字以及教师灌输的生涩概念术语、条文条律,使得许多学生对道德教育缺乏学习积极性,更缺乏发自内心的认同,从而无法形成对社会道德规则的内化。这表明道德发展,特别是道德认知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心理客观规律,即道德认知发展的年龄阶段性。此时,单纯依靠德育发挥作用就会受到限制,必须结合和借助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才能实现道德认知的有序发展。道德认知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从理论上考察,道德认知发展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支撑。根据心理学中认知发展学派的理论观点,为了实现道德认知的良好发展,个体身心成熟、拥有充足的经验及环境与个体心理认知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缺一不可。^[5]这就意味着,道德认知的培育,并不单纯局限于社会伦理规范与道德习俗知识的简单传授,还强调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来匡助道德认知发展。科尔伯格的“三水平六阶段”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进一步认为,每个学段的道德认知发展都有着质的差异,道德认知发展无法进行跃迁,但高阶的道德认知又包含低阶的结构和功能。因而学校应尊重个体认知发展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6]一言以蔽之,在大中小幼不同学段开展侧重点相异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处理道德认知的冲突和矛盾,促进其道德认知由低到高、由浅入深发展,使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都能实现道德认知有序发展,这也是实现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的重要任务。

第二,从含义上解析,道德认知健康是心理健康的标准之一。早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

康”。^[7]这表明道德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个体总体健康的水平。同时,从大健康观出发,心理健康与躯体健康、道德健康始终都处于有机复杂的联系之中,各部分看似独立,本质上却是相互包含、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即心理健康也蕴涵着道德健康的内容。借此,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心理健康的标准不仅应包含智力标准、情绪控制标准、意志健全标准、行为协调标准、人际关系适应标准、行为反应适度标准等,还应囊括道德健康标准。^[8]道德健康者具有辨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等是非观念的认知能力,这种道德认知能力,不但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要求个体能按照社会道德规范准则来约束及支配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换言之,这种对道德规则的认知健康,也属于心理健康的范畴。因而,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同样不可忽视教育对象的道德认知发展,不能脱离主体对社会规则的尊重、理解、认同和运用,而只关注“纯粹”的心理健康。

第三,从功能上考量,道德认知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前提和保证。道德认知的良好发展有助于个体道德积极情绪如自豪感、钦佩感、羞耻感的获得,促进其公正道德信念的养成、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以及道德行为如诚信行为、利他行为的出现。研究者发现,这些无一例外都能显著消除个体的抑郁情绪,帮助个体从消极心理状态恢复,重获心理平衡。^[9]此外,许多心理学派也将道德认知健康视为心理健康的隐性内在前提,如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区分了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超我是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是道德认知化的自我,它在“三我”中处于最高层,凌驾于本我与自我之上,具有引导和控制本能冲动的作用,同时也监督着自我对本我的限制。可见,超我所代表的道德认知,在个体心理健康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第四,从结果上分析,道德认知不良会引发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大量研究者开始关注人类的积极品质如宽容、公正、感恩对个体心理健康及和谐发展的影响。^[10]这种带有鲜明价值取向的“美德”,

不但体现了有关道德认知的全部内涵，而且反映了人们已然注意到道德认知的不良发展对心理健康的消极作用。许多实证研究发现，不良道德认知倾向由于易受到责难、排斥和惩罚，会带来更多的人际紧张问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个体社会适应程度降低、人际信任崩塌，导致其遭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从而陷入心理行为问题的泥潭。^[11] 现实生活中诸多心理健康的危机案例和极端事件也表明，道德认知不良是抑郁、焦虑、自伤和自杀的“导火索”。

二、从大中小幼道德认知发展到心理健康教育

从大中小幼道德认知发展到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考察，科尔伯格“三水平六阶段”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基础，也是从道德认知视角梳理和分析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在不同年龄阶段教育内容的理论依据。

1. 幼儿道德认知发展与心理健康教育

幼儿期是道德认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所接受的善恶是非观念将会深刻影响成年后的道德行为表现。根据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幼儿期的道德认知主要表现为前习俗水平的第一阶段，即“惩罚与服从为导向”。此时，他们认为规则是由权威制定，必须对其无条件服从；而行为好坏是由所得结果确定，得到赞扬就是好的，受到批评惩罚就是坏的。它具有表面化及自我中心特点。首先是表面化。一方面，幼儿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容易受到个体的外在形象影响，这与其思维认知水平仍处在具体形象阶段不无关系。例如，幼儿容易将“高大”与权威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高大”权威对象所制定的规则就是对的。另一方面，幼儿往往会忽视行为的意图而将结果的好坏视为更加重要。与故意偷拿东西而导致打碎一个杯子相比，无意间打碎更多杯子在幼儿眼中是过失更重的行为。尽管后来有一些研究者对其提出质疑，但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年幼儿童比年长儿童更看重行为后果而非深层次的意图。^[12] 其次，幼儿的道德认知表现出自我中心特点，他

们不考虑他人的利益或无法区分出行为者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区别，只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去认识事物，而不能从客观的、他人的角度去认识事物。此时，最典型的表现即为“快乐的损人者”现象。^[13] 当他们的意愿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愉悦感，而无法得到满足则会产生生气、愤怒等情绪，因而，他们的某些“损人”行为会不顾对方的利益，仅以自己的愉悦感作为驱动。

基于道德认知视角，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是培养正确的自我意识、人际交往规则意识，帮助幼儿有序地进行生活适应。第一，家长和教师应重视幼儿的自我意识，避免对幼儿做出道德“审判”。由于此时幼儿的道德认知具有自我中心的特点，无法将社会普遍伦理道德原则内化，来自教师和家长的恰当评价很可能导致其自我评价能力降低，自尊发展滞后，从而形成负面自我认同。因而家长和教师应在尊重幼儿自我中心特点的同时，逐步培养幼儿正确的自我意识，帮助其自尊自信、自我认同与自我效能感的建立。第二，家校要同心协力，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包括人际交往的规则意识、情绪情感宣泄的规则意识等。一方面，家长和教师应尊重幼儿道德认知发展规律，通过树立权威这一方式，使幼儿能够正确识别道德行为的优劣，初步建立起有关善与恶、对与错、是与非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鼓励性或禁止性的道德规则、社会规范，及时对幼儿不良道德认知及行为加以制止，并对良好道德认知及行为予以肯定、强化，以此来培育健康道德认知和被社会所赞扬的规则意识。第三，帮助幼儿有序地进行生活适应。在家庭和学校中，家长和教师应主动培养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同时创设良好的道德认知培育环境，不断促使他们对道德现象进行思考，逐步学会沟通、合作与分享，以此来增强幼儿的生活适应能力，并协助幼儿的道德认知发展向下一个阶段迈进。

2. 小学生道德认知发展与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正式进入学校教育，小学生心智能力有明显提升。与此同时，他们的道德认知也从“惩罚与服从为导向”进入了

更高阶段的“以工具性的相对功利主义为导向”，这属于科尔伯格前习俗水平的第二个阶段。相比于幼儿期的“自我中心”特点，小学生已经能区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在进行道德判断时，他们可以考虑他人的意图、信念、需要等心理状态，然而其行为结果的好坏仍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此外，即使他们学会了公平、交换、互惠等原则，也同样无法内化社会规则和习俗。亦即，小学生的道德认知具有功利化与实用主义特点。首先是功利化。小学生的道德认知往往以自己的利益为根据来判断好与坏，他们渐渐摆脱了对权威及惩罚服从的依赖，开始考虑个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其次是实用主义倾向。他们往往不考虑行为结果是否会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也不考虑是否会影响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只在公平、互惠的原则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实用主义将彼此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结合起来。

从道德认知的视角来看，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点是帮助其初步认识自我、调适情绪以及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并进一步提高其生活与社会适应能力。第一，正确认识自己。尽管道德认知发展具有客观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干预。“以工具性的相对功利主义为导向”具有浓厚的利己色彩，如果不匡助他们的道德认知向更高阶发展，就很可能导致其终生都以自我利益为先，漠视他人利益，从而产生一系列内外化心理问题。^[14] 研究发现，大多数成年罪犯仍处于这一阶段。^[15] 这就意味着了解自我、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尤其是正确认识自己的特点、优缺点和兴趣爱好，初步学会情绪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是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第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引导小学生考虑他人利益，协助其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小学生理解群体的期望，并学会礼貌、开朗、和善、尊重、合群以及友好、谦让等，从而约束他们满足个人利益的需求，并使他们认识到道德规则中他人利益的重要性。第三，有效的生活与社会适应。不仅要帮助他们适应学校环境、学习和生活环境，适应学校纪律、

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还要培养他们对不同社会角色的适应。特别是正确处理学习与兴趣、爱好之间的矛盾，自己与他人利益的冲突，从小养成学校与社会肯定的道德行为和亲社会行为。

3. 中学生道德认知发展与心理健康教育

中学生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剧烈变化，他们的道德认知也在青春期迎来了质的飞跃，即从前习俗水平跨越到习俗水平。就初中生而言，其道德认知发展跨进了习俗水平的第一阶段，即“以好孩子为导向”。此时，他们对个人利益的考虑不再凌驾于社会道德规则之上。具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初中生已能理解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且会因为群体的期望而积极维护和支持人际关系，表现出人际化和寻求认可的特点。就高中生而言，其道德认知发展阶段处于习俗水平的第二阶段，即以“维护法律与秩序为导向”。这一阶段强调维护规则、法律秩序的重要性，主张恪尽职守、遵守规章制度以维持社会和谐，表现出社会化及规则中心特点。

初中生的道德认知发展表现为人际化和寻求认可的特点。首先，人际化意味着个体的道德价值开始以人际和谐为导向，倾向于顺从传统的要求并符合大多数人的意见。研究发现，初中阶段是人际交往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人际关系比小学阶段更加复杂和多元。^[16] 同时，初中生的社会交往关系也往往集中于合意社群间，即是否在该群体中感到满足快乐是交往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其次，初中生的道德认知以谋求赞赏和认可为基本准则。他们普遍认为好的行为就是受到他人称赞的、使别人愉快的行为，因而无论是在道德推理还是道德判断中，都倾向于将受到赞赏的行为当作“金科玉律”，并借此指导自身，希冀能获得周围人的认可。据此，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重点是帮助其科学认识青春期的身心特征，并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学会调控情绪情感，正确对待异性交往，继续引导其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第一，关注青春期的自我。这个阶段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青春期的生理、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因此，要帮助初中生增强自我意识，客观地认识自我、评价自我，正确认识青春期的生理性特征和心理特点。

第二, 强调情绪的力量。鼓励他们进行积极的情绪体验与表达, 并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管理, 正确处理消极情绪, 抑制冲动行为。特别是在道德认知层面, 受到广泛褒扬与赞赏的道德榜样可以催生积极情绪, 使他们能够在原有道德认知基础上对其“共情”, 并进行顺应、认知和同化的加工, 从而形成道德新知, 并抑制不良道德认知及行为。第三, 继续引导初中生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积极与老师、父母进行有效沟通,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该阶段学生对家长和教师的心理和情感依赖日益减少, 而更多依赖于同伴关系。如果出现交友不慎现象, 那么, 他们的道德认知则极有可能误入歧途, 容易不顾社会公序良俗, 错误地将在不良同伴关系中受到赞扬的行为(如逞凶斗恶等)内化为其道德准则。因此, 该学段的心理健康教育应促进其道德认知阶段向高阶发展, 倡导法律法规的重要性。

与初中生相比, 高中生的道德认知表现为社会化及“以规则为中心”的特点。首先是社会化。在这个阶段, 高中生能够把人际关系中的期望与社会期望区分开来, 并采纳社会化的观点, 将社会行为规范、准则等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 包括履行社会义务、避免破坏制度等。其次是以规则为中心。高中生的道德认知倾向于服从社会规范、遵守公共秩序、尊重法律的权威。凡是有悖于法律的, 即被高中生认为是不可取的、不道德的。据此, 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是在客观的、正确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 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 同时进一步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 特别是异性同伴关系, 提高承受困难和应对挫折的能力,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第一, 确立正确的、客观的自我意识。虽然高中生的道德认知发展已能够将社会法律秩序、规章制度内化为自己的认知及行为准则, 但由于许多对社会伤害不大的不道德行为无法被其他人所察觉, 更不能被法律秩序所惩罚, 因此, 道德解约机制极易被诱发, 使得他们会不顾及已经内化的道德准则, 转而放任不道德行为的出现。最典型的表现即是道德推脱, 它会促使个体重新定义对自己行为的认知, 使其

伤害性降低并减少对受伤害对象的认同感。^[17] 研究发现, 道德推脱的不良自我认知倾向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18] 因而高中阶段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在客观的、正确的自我意识基础上, 帮助其树立远大理想、坚定信念,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 培养积极的人际交往能力。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际交往状况, 尤其是学会正确把握与异性交往的尺度, 把握友谊和爱情的区别、界限, 防止因人际交往不良而出现道德认知错误等。第三, 提高情绪的调节和控制能力。无论是在学业还是人际交往中, 高中生都有可能出现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 并造成不道德认知及行为的出现。因此, 要倡导他们提高自身调控情绪的能力, 以及应对挫折的耐受力、心理弹性、意志力等, 使其正确对待学习与生活中的失意, 在出现挫折或失败时能够坚守道德认知底线, 坚决杜绝有损他人、学校与社会的不道德行为。第四,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引导高中生充分了解自身兴趣和性格特点的基础上, 帮助他们确立自己的职业志向, 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树立社会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4. 大学生道德认知发展与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时代是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成熟阶段, 他们越来越注重现实, 其道德判断已经超越了法律秩序的标准, 拥有更深刻的认识, 特别是对社会契约的理解。根据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大学生处在后习俗水平的第一阶段, 即“以法定的社会契约为导向”。他们认为道德判断、道德推理及道德行为不仅应该考虑社会法律秩序, 还应遵循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契约, 包括自由协议和口头约定。对其进一步的探究发现, 大学生道德认知发展具有复杂化与可逆性特点。首先是复杂化特征。这源于社会法律秩序与社会契约并不总是一致的, 有时甚至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不断纵深发展, 作为身处时代最前沿的群体, 大学生往往感到其道德认知受到强烈冲击。多数大学生仍然认可社会规范与普遍道德原则, 但少部分却持反对态度, 并认为这是“超前”的价值理念。这反映了大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的

复杂性。其次是可逆性特点。科尔伯格研究发现,高达 25% 的青年出现过道德认知的倒退现象。具体而言,在进入大学之后,部分大学生在持续 2—3 年的时间里,其道德认知发展倒退到了“以工具性的相对功利主义为导向”阶段,之后他们的道德认知大多又会回到“维护法律与秩序为导向”或“以法定的社会契约为导向”的阶段。对此,科尔伯格认为,这是因为部分大学生会对其以往坚持的义务及道德标准产生怀疑,从而造成结构性的倒退。该种倒退并不是指道德认知能力的下降,也不是全盘否定过往道德思维经验,而是旨在进行道德反省,并据此重组道德认知。

从道德认知的视角来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学习成才、择业交友、恋爱婚姻、社会适应和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问题。第一,强化自我意识。以道德选择为核心,引导大学生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帮助其构建和谐统一的道德认知体系。大学生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的倒退现象意味着个体对价值倾向的自我认知选择,尽管多数大学生在进行自我选择后,仍然会坚持先前的受社会认可的价值理念,但也有极少数大学生陷入价值取向扭曲的泥沼,如“药家鑫事件”“马加爵事件”。第二,强调情绪的自我管理。道德认知阶段的后退,很大程度上伴随着不良情绪如焦躁、愤怒、抑郁等情绪的出现,如果不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干预,这种不良情绪将会积聚发酵,对他们的学业与生活产生较大影响,很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恶性后果。因此,应进一步关注大学生情绪情感的调控,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情绪品质,特别是养成对情绪情感的自我监测、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和习惯。第三,完善人格。关注人格中德性的缺失即对其道德人格进行培养。促进人格向“善”发展也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而言,要倡导他们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努力奋斗、无私奉献。根据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这种立志为人类正义尊严奋斗的阶段属于最后一个阶段,即“以普遍伦理原则为导向”。虽然很少有人能迈入这个阶段的门

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崇高的道德人格和道德理想,对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第四,提高人际沟通能力。使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包括朋辈关系、异性关系等)中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和体验,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交友观、恋爱观、婚姻观,并为之后进入职业生涯、建立家庭和成为父母角色做好准备。尤其是在道德认知发展可能出现倒退的大学生时期,应重点关注其在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多疑、嫉妒、敏感、相互猜忌、索取无度等一系列退行状况。第五,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社会适应是衡量大学生社会性发展和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而社会成熟又是个体心理成熟的重要条件。^[19]大学生即将要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学业、就业、经济与婚恋的压力纷至沓来,社会适应的内涵不断扩大并提出了新要求。对此,从道德认知视角,应引导大学生学会忠诚、信任,遵守社会规范及规则,讲求社会诚信,培育社会责任心和主人翁精神,全方位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三、道德认知发展为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固本强基

如上所述,道德认知发展在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进入幼儿园到大学,道德认知发展涵盖了整个学生时代。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正是在尊重教育对象道德认知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与各个学段有机结合,依据其不同道德认知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对其进行匡扶,帮助他们达到最优化的心理健康发展水平,同时促进其道德认知发展朝着更高阶段迈进,最终形成相互衔接、有机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体系。然而,必须承认,随着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的加速变迁,当前我国道德失范现象频出,不良道德乃至违法犯罪行为也逐渐出现低龄化倾向,这为大中小幼心理健康一体化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先行“破题”。

首先,亟须关注社会消极现象的影响。心

理健康教育一方面要关注学生主动的道德认知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社会消极现象对其道德认知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当下互联网及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各种非主流价值喷涌,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拥趸者甚多,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被弱化,教育对象容易受此影响,出现道德认知偏差或道德价值观的偏移。研究表明,大规模的网络暴力事件会促使道德解脱出现“病毒式”传播,造成个体自控力下降,情绪情感冷漠等。^[20]此外,媒体被认为是改变道德认知发展的重要因素。^[21]因此不良媒体报道的错误价值观念、虚假及污名化信息,易导致学生形成不正确的道德评价与道德判断,并产生身份认同感降低、人际交往障碍及社会适应不良等一系列问题。可见,社会消极现象影响学生的道德认知发展,严重危害心理健康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第一,在自我意识方面,容易形成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倾向,表现出对自我的“异化”,甚至对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自爱自律等优秀人格特征不屑一顾。长此以往,容易出现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如反社会人格、反社会行为等。第二,在人际交往方面,容易诱发人际冲突,造成群体与群体之间隔阂加深、矛盾加重,攻击行为时有发生,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人际关系破裂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第三,在社会适应方面,无法及时将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内化,很大程度上会违反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从而出现不道德行为。因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开展多种多样的道德实践活动,使教育对象真正融入现实的道德情境中去,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丰富其道德实践的情绪情感体验,促使他们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中不断对自身进行纠偏,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亟须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协作。心理健康教育绝不只于学校,道德认知发展也并非仅仅依靠家庭。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和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心理健康教育互相支撑、互相补充、相互促进。^[22]具体而言,第一,以家庭心理健康教育为重要基础。早期的

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在树立儿童纪律与规则意识、培养道德人格、养成道德情绪情感及道德习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60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进行纵向追踪研究发现,其家庭教育对他们的道德认知发展有直接作用,该作用独立于个性、经济收入与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外。^[23]这意味着,倘若家庭心理健康教育严重缺位,那么,学校和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就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第二,以学校教育为主要阵地。当幼儿入学后,学校教育几乎就涵盖了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所有关键时期。因而,学校应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从自我、学习、人际、情绪情感、社会适应等方面入手,不遗余力地促进学生健康发展。重点关注自我意识的形成、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的提高、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情绪调适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适应的促进。唯其如此,才能为道德认知发展筑牢根基,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才会得到充足的“心理营养”。第三,以社会心理健康教育为关键依托。包括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打造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社区氛围;运用大众媒体的积极力量,致力于减少偏见和社会排斥的形成;培养良好的社会心态、社会风气,特别是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大学生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安全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最后,亟须重视道德认知的监督、测评及干预。与德育不同,心理健康教育具有成熟的测评工具以及成体系的干预手段,因而可以据此建立可观测的量化数据,即心理档案。^[24]这种心理成长信息,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自我的认识,促进其了解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从道德认知发展和心理健康教育视角看,第一,对自我意识偏低偏差的学生,可以重点关注其认识自我、接纳自我的程度,帮助其确立正确、客观的自我意识,防止不良道德自我评价和不良道德信念的出现;第二,对学习兴趣和学能力不足的学生,着重其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习动机的激发,引导其体验学习的快乐,从而预防不良道德认知的出现,如防止学生通过课业抄袭、学术不端等不道德行为提升学习成绩等;

第三,对情绪调控能力较差的学生,鼓励他们进行积极的情绪管理,以正确的方式和渠道管理消极情绪,而非通过自伤、攻击、破坏等行为宣泄情绪;第四,对人际交往困难的学生,则应帮助其建立公平、互惠、友好的人际关系,培养沟通、合作与分享的道德认知观念,促进利他行为、亲社会行为等道德行为的养成;第五,对于由社会适应问题引发的道德认知不良,应帮助其正确处理学习与生活中出现的挫折和困难,提高耐受力和心理弹性、意志力等,注重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强调社会道德规范与规则的重要性,使其逐步适应来自学习、生活和社会的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25]

总之,促进道德认知健康发展是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面临的重要任务,它不仅关乎儿童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及品德、美德的塑造,更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息息相关。因此,未来的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在尊重道德认知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应以促进道德认知发展为核心,以防止不良道德认知倾向为要务,使学生道德认知发展既符合年龄特征又能朝着高阶阶段靠拢,最终形成相互衔接、有机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体系。

参考文献:

- [1] 俞国良. 社会转型: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理服务 [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8 (4): 62-69, 168.
- [2] 俞国良, 张亚利. 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人格的视角 [J]. 教育研究, 2020, 41 (6): 125-133.
- [3] 任月娥, 黄永林. 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应注意的心理学问题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0 (5): 46-49.
- [4] 杨威. 道德认知发展学派的德育观评析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5 (7): 73-74.
- [5] 客洪刚. 科尔伯格德育理论特点及其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 (1): 105-108.
- [6] 俞国良, 王浩. 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理论的视角 [J]. 教育研究, 2019, 40 (8): 108-114.
- [7] 张忠, 陈家麟. 论道德健康与心理健康——兼议心理健康教育功能、价值、目标的拓展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7 (6): 53-56.
- [8] 徐辉. 道德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内在关联 [J]. 马克思主义学刊, 2015, 3 (4): 82-88.
- [9] 潘莉. 道德健康对心理健康的促进和发展 [J]. 当代青年研究, 2010 (2): 34-39.
- [10] 任梓荣, 陈永涌. 国内积极心理学研究变迁: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0, 28 (1): 152-160.
- [11] 王丽萍, 王宏升, 江新会, 等. 道德发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基于大学新生的实证研究 [J]. 人类工效学, 2014, 20 (4): 17-21.
- [12] 李晓东, 王轶楠. 关于 4~6 岁幼儿道德判断特点的研究 [J]. 学前教育研究, 2002 (2): 40-42.
- [13] 李占星, 朱莉琪. 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发展与影响因素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 (6): 990-999.
- [14] 邵景进, 刘浩强. 我国小学生品德发展关键期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J]. 心理科学, 2005 (2): 412-415.
- [15] 罗俊丽. 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及其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J]. 道德与文明, 2008 (2): 75-78.
- [16] 陈英敏, 李迎丽, 肖胜, 等. 初中生人际关系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J]. 中国特殊教育, 2019 (4): 83-89.
- [17] WANG Xingchao, et al. Childhood maltreatment,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dolescen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fathers' and mothers' moral disengagement as moderators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9 (95): 48-57.
- [18] 王兴超, 杨继平, 杨力. 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7): 1092-1102.
- [19] 张大均. 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心理学研

究刍议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40 (6): 79-85, 182.

[20] KEVIN C, RUNIONS, BAK M. Online moral disengagement, cyberbullying, and cyber-aggression [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5 (7): 400-405.

[21] MCKENZIE P. Globalization as a context for moral developmen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663.

[22] 杨雄, 刘程. 关于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合作的思考 [J]. *社会科学*, 2013 (1): 92-101.

[23] HART D. Family influences on the formation of moral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longitudinal analyses [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1999 (3): 375-386.

[24] 俞国良.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我个人 20 年研究实践的梳理与再分析 [J]. *中国教育科学*, 2018 (1): 62-76, 140-141.

[25] 俞国良. 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 实践的视角 [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47 (2): 73-80.

(责任编辑 吴 虑)

The Integr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reschoolers to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Cognition

Yu Guoli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cogni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reschoolers to college students are synchronous and have a reciprocal causation relationship. First of 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connotation, function and results of mo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mo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econdl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cognition 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reschoolers to college students, Kohlberg's mo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is very important, which is the content basis for combing the integr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cognition;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cogni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help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reschoolers to college student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social phenomena,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among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onitoring and intervention of moral cognition, so as to pursue practical results.

Key words: Mental health; Moral cognition developm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 若干特征转变研判与对策

刘在洲

(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迈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将会产生一些特征的变化。研究基于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 针对我国普及化初级阶段高等教育功能等四个方面特征变化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 高等教育功能将呈现出主育“专才”与辅育“通才”的多重使命特征; 国民高等教育观将呈现出易享“权利”与难尽“义务”的权利优先特征; 高等教育入学制度将呈现出主体“选拔”与有限“开放”的双轨运行特征; 普及高等教育内涵将呈现出整体“增长”与局部“转型”的同步发展特征。其应对之策为: 立足国情创设制度, 精准引导转变; 多元参与协同治理, 合力推动转变; 拓展功能把握角色, 积极应对转变; 创新手段融通技术, 助力支撑转变。

关键词: 高等教育普及化; 初级阶段; 特征转变; 问题与挑战; 研判与应对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12-08

2019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1] 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门槛。根据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 进入普及化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可能会有一些特征发生变化, 故基于我国国情,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在高等教育功能、国民高等教育观、高等教育入学、普及高等教育内涵等四个方面可能发生的特征变化及相应对策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20世纪70年代, 马丁·特罗提出, 高等教育随着量的增长必然会发生一些质的转变。他认为, 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大众化教育

阶段到普及化阶段随着高等教育量的增长, 将在教育规模、教育观、教育功能、入学和选拔制度等11个方面发生一些质的转变。^[2] 20多年后, 马丁·特罗修正了早先关于量变和质变划一性的观点, 把“普及高等教育”的内涵阐释为“接近于‘学习化社会’”。^[3]

自马丁·特罗提出量的增长将会带来一些显著特征变化以来, 国内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潘懋元等人认为, 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阶段转变过程中不仅有“量变带动质变”的现象, 还有“质变促进量变”的显著特征。^[4] 而且量的增长与质的转变两者呈非均衡性。^[5] 谢作栩认为, 马丁·特罗归纳的欧美等国规模变化相应出现质变的理论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可为向大众、普及教育进军的国家

收稿日期: 2020-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大学科研育人机理研究”(BIA180189)

作者简介: 刘在洲, 男, 教授, 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要从事高校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但因时过境迁且样本受限,难免以偏概全。^[6]李盛兵认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具有混合性特征,既有精英化特征和大众化特征,也有后大众化特征,更有显著的本土化特征。^[7]钟秉林等人认为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将在院校的多样性、管理和行政、课程和教学形式以及学术标准等方面产生显著的特征变化。^[8]王志强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既需要梳理发展历程,明确演化图谱,从而总结阶段特征,也需要厘清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时空方位以确定新时代再出发的行动基础。^[9]李硕豪等人将普及化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认为未来20年将实现从初级普及化到高级普及化的历史性变革。^[10]

上述研究表明,马丁·特罗提出的规模变化引起质的变化并形成相应特征的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任何一种教育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从应然状况来看,我国普及化初级阶段也可能发生上述一系列特征的变化。但从实然状况来看,由于我国在文化、传统、人口、体制等方面的特殊性,其特征转变可能具有本土性。这些已有的研究无疑为探讨这一时期特征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但这些研究较为宏观,全面系统、精准深入研究不够。高等教育功能、国民高等教育观、高等教育入学、普及高等教育内涵等四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普及高等教育进程的关键因素,事关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使命定位、就学观念、入学制度、发展目标等,是马丁·特罗提出的11个特征转变中的关键所在,但因对其现有研究显得薄弱,故深入探讨这些特征转变的形态、分析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实属当务之急。需要说明的是,普及化初级阶段没有特指的时段,泛指普及化的初期。

二、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若干特征转变的趋势研判

(一) 主育“专才”与辅育“通才”:高等教育功能的多重使命特征

马丁·特罗认为,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功

能将从精英阶段塑造统治阶层的心智和个性、大众化阶段培养技术精英转向普及化阶段为大多数人面向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和提高大多数人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能力。^[11]可以看出,他主张的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功能在于面向大多数学生培养他们如何生活和生存,其实质是强调要从侧重科学知识的“专才教育”回归到以通识课程为主的“通才教育”。

诚然,针对过度强化科学技术的“专才教育”带来的问题,强调通识课程有特殊意义。但在我国现阶段,如果高等教育功能如马丁·特罗所言发生转变,对大多数人仅进行“通才教育”,将面临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和与国民对高等教育期许相冲突的尴尬局面。

1. 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尚需大量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社会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而科技的进步依赖于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如果高等教育的功能仅仅是为大多数人面向未来生活做准备,大学不是把大多数人培养成为国家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仅仅是对学生进行通才教育,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知识面广、活动面宽,但可能是“知识结构博通不够、专精欠缺,工作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不强的万金油型人才”^[12],那些国家需要的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从何而来呢?

生存和适应能力的培养可能也有技能培养之意,但应该是一种很基本的素质和能力的教育。如果普及化阶段仅仅着眼于基本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则要求显得过低,与社会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相差甚远。如果大学本专科是“通才教育”和一般的职业教育,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势必要延至研究生教育阶段,一是造成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年限延长,教育成本增加;二是造成专业技术人才紧缺,因为研究生规模是有限的。

此外,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导致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中西部地区仍缺乏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在充分发展和

平衡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总体上还是以满足经济和社会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为主。正如别敦荣所说，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在普遍提高社会人力资本价值的基础上，仍要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使高等教育普及化成为社会持续进步发展的核心动力源。^[13]

2. 从国民对高等教育的期许来看，其目的还是为了学专业找技术工作

发达地区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可能是多元的，也许有纯精神方面的追求和个人消遣。但一般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工作和生存。他们的期许是掌握专业知识，找到合适工作，改变自己命运。有学者指出，普及化高等教育中一般民众占绝大多数，如果普及化高等教育不能为受教育者增强其就业能力，提高就业质量，就不可能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14]可见，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满足就业是广大国民的主流意向。

综上所述，在普及化初级阶段，高等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功能特征不会有大的改变，面向大多数人仍然是“专才”功能。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时代的发展，确有少数人群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了学本领就业，可能是为了消遣和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这是高等教育功能必须关照到的。但从总体来看，高等教育功能还是以培养“专才”为主、以培养“通才”为辅，高等教育功能将呈现主育“专才”与辅育“通才”的多重使命特征。

(二) 易享“权利”与难尽“义务”：国民高等教育观的权利优先特征

根据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将从精英阶段某些群体的特权、大众化阶段人民群众的权利转变为普及化阶段国民的义务。^[15]即进入普及化阶段，除特殊情况外，适龄青年都应自觉接受高等教育，从道义和社会舆论来看，上大学乃人生之必需。在我国，受民意的制约和国力的限制，国民义务观在这一阶段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面临诸多挑战。

1. 国民受教育义务观受制于民意的制约和影响

教育义务是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依法履行的教育方面的责任，与教育权利构成矛盾的统一体，二者既对立统一又相辅相成。就接受义务教育本身而言，劳凯生认为，这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履行的义务。从教育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来看，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从教育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自个角度看，受教育是公民的义务。^[16]但教育权利和教育义务的履行，特别是教育义务的履行，离不开法律的监督保障。由于国家尚没把高等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没有强制措施，仅凭道义和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的力量有限，当教育义务和教育权利在遇到冲突和矛盾时，国民优先保证的是自己上大学的权利，而不是选择履行接受高等教育的义务。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老百姓生存的压力还很大，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有许多适龄青年会选择直接就业，放弃上大学的权利，一时还无法尽接受高等教育的义务。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不少学生虽然愿意接受高等教育，但他们希望享受优质资源“上好大学”，由于高等教育消费竞争性突出，特别是享受优质资源“上好大学”竞争激烈，如果没有理想的大学，他们宁愿放弃也不会选择一所与自己期望值相差较大的高校。

2. 国民受教育义务观受制于国情的制约和影响

强调国民义务，首先要有物资保障，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像基础教育一样免费。现阶段，由于高等教育兼有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属性，学生除承担日常学习生活费用外，学校还收取了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应该是由政府负责提供的免费教育，由于人口众多，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巨大，据测算，202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为7145.1万人，2035年达8409.1万人，^[17]“面对未来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如果全部由政府承担，财政将不堪重负。此外，我国从1986年实行九

年义务教育以来，其均衡发展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高等教育更无从谈起。

可见，在普及化初级阶段，实现从权利观到义务观的转变不太可能，权利优先是当下国民的选择。只有人们受教育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国家财力进一步提升，国民不再为生存就业困扰，受高等教育的义务观才会随之而来。总之，国民高等教育观从权利观向义务观转变是将来不是现在。从总体上看，国民高等教育观将呈现出易享“权利”与难尽“义务”的权利优先特征。

（三）主体“选拔”与有限“开放”：高等教育入学制度的双轨运行特征

马丁·特罗认为，普及化高等教育将对所有希望入学或者有资格入学的人开放，其标准是个人是否自愿入校。^[18]也就是说，只要想上大学都能实现，这标志着入学和选拔制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至少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条件保障，办学资源满足开放入学后民众的需求；二是取消考试选拔，直接注册上学即可。在我国，普及化初级阶段实现这一转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

1. 从条件保障来看，普及化初级阶段无力支撑开放入学，即使是非选择性入学

第一，以财政经费为主体的资源保障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基础，从我国财政经费投入来看，现阶段无力支撑开放入学。由于社会资本注入高等教育在体制机制方面还不是十分畅通，目前我国还是以国家财政经费为主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19]有关研究表明，2005—2015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政府投入从2005年的1496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5930亿元，增长了2.96倍，年增长平均为15.16%，政府投入占高等教育总投入的比例平均为52.88%，^[20]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占比差距不大，想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不太现实。即使不完全依靠国家财力办学，高等教育资源同步增长也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短期内实现开放自愿入学几乎不太可能。

第二，从民间资本投入来看，目前投入有限，要想大规模进入高等教育有待时日。有关

研究表明，2005—2015年在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方面，非政府投入占高等教育总投入的比例平均为47.12%，其中社会投入平均值为18.63%，家庭投入的平均值为28.49%。在非政府投入中，家庭投入始终高于社会投入，社会投入偏低，且呈逐渐下降趋势。^[21]由于民间资本投入仍显不足，以致民办高等教育学校数和规模占比偏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贡献度不高，也无能力分担普及高等教育开放入学的压力。据教育部网站2020年5月公布的数据，在全国2688普通高等学校中民办高校仅757所。除去独立学院257所，只有500所真正的民办高校，仅占全国高校的18.6%。^[22]可见当前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举办学校数、办学规模，都与普及化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2. 从开放角度来看，国民不经过任何形式考试选拔选择入学，特别是选择优质资源入学几乎不可能

第一，如果开放入学，国民势必会紧盯优质资源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面对14亿人口和七八千万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教育大国，这种选择入学基本上是不可能。以2019年为例，据教育部网站显示当年实际考生1031万人，普通本专科实际招生录取914.9万人，^[23]录取率达88.7%。根据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网站数据统计，本科高校录取占44%，其中一本录取占13.8%，原“985工程”高校录取占2.0%，原“211工程”高校录取占6.4%。如果把一本高校都视同优质资源，只能满足不到14%的考生选择入学，还有86%的考生只能进入其他本科或高职学习。即使是今后社会发展进步了，优质资源得到改善，也不可能面向全体国民开放。事实上，在美国等早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进入优质大学依然需要通过考试选拔录取，而实施开放自愿入学的大学以二年制社区学院居多。可见，目前我国要实现全面的开放自愿入学还做不到，充其量只能限于一般高等教育机构。

第二，如果是开放选择性入学，除了会造成优质资源紧张和一般资源过剩外，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并可能滋生

社会腐败。从理想状态上讲,虽然高水平的开放自愿入学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但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复杂的,由于每个受教育者的能力或才能是有差别的,每个受教育者投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学习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努力的程度是不同的,他们对社会的未来贡献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开放自愿入学和社会公平有时会发生冲突,特别是当教育资源稀缺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更突出。教育选拔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对稀缺教育资源进行分配,它力图通过公平的分配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并使教育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24]

目前我国实行的高考选拔制度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国家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有效机制。^[25]其核心价值是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和维护社会公正。此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健全,权力寻租等招生入学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实行完全的自愿入学,也很难保证教育公平。

综上所述,优质资源不足是长期的,面向高层次大学开放入学不大可能。选拔制度永远在路上,在普及化初期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取消。但非选择性入学,面向高职院校和社区学院的开放入学是可能的。高等教育入学制度总体上将呈现出主体“选拔”与有限“开放”的双轨运行特征。

(四) 整体“增长”与局部“转型”:普及高等教育内涵的同步发展特征

20世纪90年代末,马丁·特罗依据欧美的经验将普及高等教育内涵的标志从入学人数增长调整为“普遍参与”接近于“学习化社会”。^[26]在我国实现这一转变面临许多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普及化初期整体上转变为学习化社会特征阻力重重,恐难实现。

1. 从学习动机与目的上看,国民普遍重学历文凭的观念很难改变

马丁·特罗认为:普及化阶段大多数学生学习将不再是为了获得学位和学历,而是学习怎样保持或提升自己在就业市场中的职位,或者为了自我消遣。^[27]的确,在一些欧美国家,高等

教育进入普及化时期后,不少国民上大学不是追求学历,而是以更新知识为主。

在我国,其情况可能不尽相同。近百年高等教育形成的学历文化已根深蒂固,无论是受教育者本人还是用人单位,普遍看重学历文凭或追求师出名门,以至于国民上大学多以拿文凭为目的。同时,国人不仅看重学历,而且注重对学历的选择,与欧美国家情况迥异。从我国后大众化阶段化的情况来看,学生学习动机虽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包括非传统的学生,表现为追求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的少,追求学历文凭的多。从高校继续教育办学情况来看,还是以学历教育为主,非学历教育普遍发展不足,处于尴尬境地,主要承担单位集中组织的培训和个人获取职业资格前的技能培训,大部分人的目标是晋升和考证。可见,民众重学历文凭教育、轻岗位能力培训的状态仍然较为普遍。

2. 从学生就学形态上看,延迟入学、工学交替现象很难普及

马丁·特罗指出:“在普及教育机构中,延迟入学的现象更为普遍,辍学现象增多,大多数学生都有就业经验。”^[28]

然而,在我国,一年一度的全国统一高考是一大特色,学校没有组织考试选拔的机会。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通道狭窄,高中毕业生或者参加高考入学,或者放弃高考直接就业,除了少数学生复读再次通过高考入学外,先工作几年再来参加高考入学者很少。与此同时,学生不仅倾向于通过统考按正规程序入学读完本专科,且绝大部分学生希望一次性完成学业;用人单位也是如此,招聘人才时强调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优先,且非常重视招聘人才的第一学历,对后续深造取得的学历另眼相看;从学生就业心态来看,很多人注重工作岗位的稳定性,一旦有了稳定的工作,除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学位外,一般不会轻易辞职再读,即使深造,大部分人也会选择在职学习。可见,学生学习形式以连续性学习为主,断续性学习较少。加上我国高校缺乏弹性的学籍管理制度,断续性学习几乎没有可能。可见,延迟入学、工学

交替现象在我国很难普及。

综上所述,在我国,未来20年将实现从初级普及化到高级普及化的历史性变革,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将稳步增加,^[29]要想整体走向学习化社会的道路不太可能。但随着一些城市的社区学院、老年大学的兴起,学习化社会特征已初见端倪,局部学习化社会特征可望到来。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融入高等教育,对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将起到促进作用。可以预见,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学习化社会特征会由点到面逐步展现出来。普及化初期高等教育内涵将呈现出整体“增长”与局部“转型”的同步发展特征。

三、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若干特征转变的应对举措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普及高等教育初期虽然不会完全实现马丁·特罗预言的一系列特征的转变,但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特征转变迟早要来。面对可能发生的特征转变而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应尽早谋划。

(一) 立足国情创设制度,精准引导转变

本着借鉴他国经验、发展本土特征、立足中国大地办学的思想,精准制定一系列引导普及高等教育特征向适合我国国情方向转变的政策,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促进普及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一是建立国民“普遍参与”的高等教育制度。一方面,通过教育政策激发国民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和意愿,从而促进普及化进程。实践中除了要注重在量的增长进程中通过政策引导质的变化外,还要注重通过政策促发质的变化带动量的增长,正如潘懋元指出的“先质变后量变”“以质变促进量变”。例如,实施高职开放入学的政策,以部分开放入学刺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带动毛入学率增长,从而促进普及化进程。另一方面,从制度乃至法律层面面对提高全体国民教育素质做出制度安排,调整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强化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促进国民高等教育观从权利观

向义务观的转变。同时,还要建立普及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和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制,“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30]。通过构建符合多元利益群体的教育体系,努力实现人人有学上、时时有学上、处处能上学目标,迎接学习化社会的到来。

二是建立面向不同需求的人才培养制度。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受教育者的构成复杂而多样,应从他们的个性特点出发,根据他们的受教育需求和发展意向,调整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模式,建立面向不同需求的人才培养制度,为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可选择的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既培养“专才”又培养“通才”的多重功能价值。同时,用人单位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特别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用人制度,防止出现用人方面的“高消费”状况。^[31]

三是建立更积极的高等教育多元投资制度,促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功能、不同面向的高校蓬勃发展,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为开放入学打好基础。当下,构建多元的高等教育办学主体、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政府要继续加大财政经费投入,起到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应通过刺激政策,拓宽民办高校办学资源渠道,促进民间资本大量投入民办高校中。高等教育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参与,社会各界除了直接投资办学外,还可以通过设立教育基金、提供优惠借贷等方式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要形成社会各界捐资高校办学的风尚。目前,社区学院的发展是一个短板,高等教育通向县级行政区域还显得力量不足,社会力量在这方面将大有作为。

(二) 多元参与协同治理,合力推动转变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特征转变的深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利益群体强烈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为此,建立多元参与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尤为重要。^[32]

一是建立多元协同决策和治理机制。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决策受到政府、企业、教师、学生、校友、家长等多元利益群体的影响，于外要建立健全社会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于内要尊重教师和学习者对高校内部治理的参与权，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建立多元协同决策和治理机制，既能权衡这些利益诉求，又能保持大学的理想与价值。

二是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目前，当务之急是贯彻新时代教育评价精神，遵循教育规律，发展素质教育，推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评价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多元评价机制，一是注重多元的评价标准，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实行分类评价；二是更加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评价，重视第三方的专业评价和国际认证与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协助评价；三是注重在多元利益群体共同参与下构建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体系，通过制定实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既维护高等教育质量，又保障各类受教育者的学习权利，从而实现从权利向义务的转变。

三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政府要支持高校根据章程依法自主办学，为促进相关特征转变，其一，建立多渠道和一年多次的招生制度；扩大高校自主招生范围，允许高校根据自己的学校类型和服务面向，自主招收学生，对特色性人才实行免试入学，摸索开放入学经验；其二，允许高校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规格，自主确立培养模式，自主设置专业，满足具有不同入学需求的学生需要，实现高等教育多重性功能；其三，在学籍管理方面松绑，改进当下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统管的学籍管理体制，允许高校自主注册学籍，允许高校实行有限度的弹性学制，允许同层次高校间学生转学流动，建立不同层次学生流动的立交桥。

（三）拓展功能把握角色，积极应对转变

高等教育机构是普及高等教育的载体和各种特征演变的舞台，面对可能发生的特征转变，要勇于应对和主动适应。

一是要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始终把握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职能，这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赋予高等教育的功能。普及高等教育初期，高校还是要坚守“专才”功能的定位，但同时也要顺应时代发展，拓展高等教育功能，满足培养“通才”的需求。实践中要找准“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结合点，在坚守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跟进通识教育，实现“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整合。正如马陆亭所言，高校首先属于专业教育，只是该专业教育不能僵化，要有一定的通识教育为基础。^[33]

二是要准确把握各类高校的角色定位，促进形成多样化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从目前我国高校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国家层面的“双一流”高校培养高层次管理和科技精英；省级层面的“双一流”高校面向社会需求，输送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地方本科高等学校着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要着力面向市场需求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民办高校着力提高水平，办出特色，满足普及化阶段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34]各高校各安其位，多样发展，形成特色，既可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受教育者的需求，又可促进各类高校自身健康发展。

（四）创新手段融通技术，助力支撑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人可学、处处可学、时时可学将变为现实。信息技术使学校和学生所处的物理空间、学习与工作的边界变得模糊，使学生和老师交流更加便利；信息技术的运用为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多便利和更多选择。从席卷全球的MOOCs浪潮到疫情期间数亿人的网络课堂，标志着高等教育形式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同时，信息技术极大刺激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学生的就学形态在不断丰富，为非传统的学生延迟入学和学时辍提供了便利；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着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学习化社会将成为现实。

为此，高校应主动迎接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构建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新形态，让更多的传统学生和非传统学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接受高等教育，

实现以学习化社会为目标的高等教育普及化。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 全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取得新进展 [N]. 中国教育报, 2020-05-21 (1).

[2] TROW M.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Z]. Paris: Conference on future structures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1973: 63-75.

[3] MARTIN T. From mass higher education to universal access: the American advantage [M].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303-328.

[4] 潘懋元, 谢作栩. 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1 (2): 1-6.

[5] 潘懋元.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1 (6): 1-5.

[6] 谢作栩. 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述评 [J]. 现代大学教育, 2001 (5): 13-18.

[7] 李盛兵.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阶段特征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12): 1-6.

[8] [32] [34] 钟秉林, 王新凤. 迈入普及化的中国高等教育: 机遇、挑战与展望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9 (8): 7-13.

[9] [19] 王志强.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总体方位、实践样态与未来进路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 (11): 8-15.

[10] [17] [29] 李硕豪, 耿乐乐, 富阳丽. “全面二胎”政策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 [J]. 开放教育研究, 2018 (3): 85-93.

[11] [15] 特罗. 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 [J]. 王香丽, 译. 外国高等教育资

料, 1999 (1): 1-22.

[12] 董泽芳. 理念与追求: 大学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40-42.

[13] [14] 别敦荣.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逻辑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6 (3): 31-42.

[16] 劳凯声. 教育法论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100-101.

[18] [28] 特罗. 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高等教育的反思: 二战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形态与阶段 [J]. 徐丹, 连进军, 译. 大学教育科学, 2009 (3): 5-24.

[20] [21] 方芳, 刘泽云. 2005—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变化与启示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 (4): 78-85.

[22] [23] 教育部网站. 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20-05-20) [2020-10-05].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

[24] 田正平, 李江源. 教育公平新论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2 (1): 39-48.

[25] 戴家干. 坚持公平公正 深化高考改革 [J]. 求是, 2011 (2): 57-59.

[26] [27] 特罗. 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 [J].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2003 (2): 8-10.

[30]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19-11-06 (1).

[31]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N]. 人民日报, 2020-10-14 (6).

[33] 马陆亭. 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理论要点 [J]. 现代教育管理, 2017 (1): 1-14.

(责任编辑 吴潇剑)

(下转第 45 页)

孕育“中国新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实践路向

王志强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035)

摘要: 建设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是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布局,也是未来区域高等教育的鲜明特征。孕育立德树人且融合共治、高起点有影响力、面向未来有引领作用、走向国际有示范性的“中国新大学”为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未来建设提供了新视野、新角色和新路径。在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内孕育“中国新大学”,既有规划明晰、需求旺盛、资源丰富等可行条件,也有内部文化价值神离、治理现代化升级滞慢、高校设置的范式传统、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外联水平和形态落后等现实藩篱。以建设“中国新大学”为牵引促进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形神兼备,需要重点实现从利益共同体、传统性管理、单一性办学、过去式学科、单向性引进向文化共同体、现代化治理、多主体交融、未来型组织、双向性合作等的系统转化。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 中国新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20-08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这一战略目标,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是实现这一前瞻布局的主要内容和动力牵引,也是促进体制机制创新、重塑高等教育形态以支持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进入世界前列的先行探索。21世纪以来,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等多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新的大学形态和秩序体系正在孕育调整,构建适应乃至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新大学”既应是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重要使命担当,也

为其未来变革提供了新视野、新角色和新路径。

一、“中国新大学”的孕育背景与内涵解析

从历时性扫描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这一时空现象是随着大学发展理念、承担使命和组织形态等的系统创新孕育出新大学而逐渐生发的。当今世界,包括高等教育体系在内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旧势力的起伏而加速调整重构。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外部规制性要素发生新变

收稿日期: 2020-10-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2020年度一般课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政策支持体系研究”(BIA200192)

作者简介: 王志强,男,副研究员,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室,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区域高等教育规划研究。

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重大命题,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这些既为高等教育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基础又对具有支撑作用的“中国新大学”建设提出新要求。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内部的规模与质量等核心要素跃入新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6.5%提升到2019年的51.6%,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史新方位;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发展任务从“推动内涵式发展”向“实现内涵式发展”全面有效转换。世界格局之变与中国全域之治为“中国新大学”的蓄势而发提供了理念指引、内在动力与条件支持。

从学术史梳理看,“新大学”的内涵随着历史动态演进而不断丰富发展。早期,“新大学”特指19世纪英国创建的以新主体、新学科、新职能为形态标识的区分于牛津、剑桥等传统大学的城市学院。总体来看,我国学术界针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领域的新变化先后提出了“新大学”“新兴大学”“新型大学”三个概念,虽然其在文本寓意上确存差异,但在实际的教育研究中均指代新情况及新变化,这里统一概述为“新大学”。我国“新大学”的提法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鉴于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办学中的实践动向,提出“新兴大学”一词,认为所谓“新”指这批大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由地方或民间创办起来的,在办学方针、培养目标、经费筹措、专业设置与调整、招生与分配等方面都突破了传统大学的框架。^[1]这一时期,有学者以广东中心城市办大学现象为研究主题来论述“新大学运动”^[2],还有学者将这种地方创新性举措称之为“中国新大学运动”^[3]。当前关于“新大学”的概念论述较为明显地割裂为以下两个维度。一是针对研究型大学,如有学者提出“从国家战略角度构建中国新大学”^[4];还有学者将“新大学”界定为“建立时间较短,通过采用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办学体制和知识生产方式,获得全球卓越声誉,并表现出持续发展潜力的大学”^[5]。二是特指应用型本科院校,有学者提出“中国新大学”是指从1998年至今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设置的

以本科教育为主、面向区域经济社会、以学科为依托、以应用型专业教育为基础、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新型院校。^[6] 相较之下,自2010年起,随着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政策的完善和实践的深入,第二种论述在学术研究中得到更为广泛的行动支持。针对大湾区及其他区域在事实层面或未来变革中已经萌发或可能出现的新变化,本文探讨的“新大学”是指通过体制机制、组织形态等的系统变革而塑造的具有新理念、新使命、新形态、新前景的大学,既涵纳通过改造升级而面向世界与未来的传统大学,也包括按照创新设计而构塑的新建院校;既囊括立足国际高端合作办学和依托大型科研装置而孵化的研究型大学,也包括立足区域及行业企业而设置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从内涵逻辑看,未来的“中国新大学”(以下简称“新大学”)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一是立德树人且融合共治。新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在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方面充分体现立德树人这一主线,可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高水平人才支持。同时新大学建设坚持国家或区域“所有、所需、所向”,突破原有大学单一主体的运行框架,具有鲜明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在运行机制上表现出高校、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高度融合和共同治理的特征。二是高起点有影响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水平和未来动能对高等教育在世界体系中的总体方位提出新期盼,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递升,创新、优质、特色发展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这些决定了新大学是摆脱传统思维桎梏,以新体制、新机制、高起点建设的在本层次、本领域具有区域、国家甚至国际影响力及辐射力的大学。三是面向未来有引领作用。当前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明显加快,第四次科技革命深入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社会阶段目标正在转换,这要求新大学是具有前瞻视野且与产业调整趋势相适应、与科技发展内在需求相一致、与新时代新战略相协调、引领国家及地区未来经济社会全

域发展的大学。四是走向国际有示范性。加快教育领域对外开放、建设国际化大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再出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大学是以国际化进行系统涵养的，将国际化制度、理念、目标、学生、教师、课程、合作办学等有效贯穿于改革发展中，旨在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和范式的大学。

二、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孕育“中国新大学”的支持条件

新大学的孕育既置身于世界发展的宏大格局中，也遵循着自身内外部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现实基础；既受政治、经济、人口、科技、文化等共时性要素的现实性规制，也受其未来性牵引。从基础条件看，大湾区战略规划明确、创新意识强烈、产业资源丰富、教育体系发达，在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这一目标牵引下成为我国最有可能孕育新大学的区域之一。

1. 新战略新规划新定位为新大学孕育提供坚实保障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定位，要求广东省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应走在全国前列，当好“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以及“国际社会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这些战略定位和要求决定了大湾区必须在改革开放新格局中充分发挥排头兵、先行地和实验区作用并合力构筑大湾区新大学孕育的时代背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在大湾区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教育和人才高地”等一系列战略目标，要求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在教育发展上“支持深圳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先行

先试”“充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一系列新战略新规划新定位有利于在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进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行快速应变和前瞻布局，加快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面向国际和未来谋设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2. 政府需求与雄厚资源为新大学孕育提供多样土壤

现代大学与地区经济社会互动共促关系已经相当明晰和牢固，这是地方政府普遍将发展高等教育摆在优先事项的动力来源，同时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但分布极不均衡的态势也促使部分地方政府在兴办大学上不遗余力。目前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值得学术溯源，包括深圳市共引进境内外24所著名大学建立深圳校区、研究院，广州以新体制新机制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广州交通大学等，东莞市、中山市将各投入百亿元分别建设大湾区大学、中山科技大学等。在政府需求之外，大湾区雄厚的科技和产业资源也为多主体协同、多领域交叉孵化新大学提供了可能。目前大湾区拥有中国散裂中子源、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一大批国家重大科学装置，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全国大科学装置布局最多的省级行政单位。大湾区产业资源丰富，2020年有21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深圳8家、香港7家、广州3家、佛山2家、珠海1家。这些高端创新型企业发展动能强劲且教育需求旺盛，普遍建立了产教深度融合和高层次人才集聚的企业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包括华为大学、美的学院、碧桂园机器人谷等，这为未来建设以护航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目标的新大学提供了基础。

3. 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史为新大学孕育提供发展基因

大湾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枢纽和前沿阵地，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引领作用也非常突出。长期以来，香港和澳门凭借背靠祖国内地和中西文化交汇的优势，创造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香港科技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等的跨越式发展为新建大学快速入列世界知名大学提供了范例。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伴随着体制机制与办学形式的不断创新而丰富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通过高等教育管理权、举办权、办学权的调整与优化,以中心城市办大学为主要形式,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7]21世纪初开始建设的“广州大学城”也是促进高等教育集群化、大众化发展的重要典范。21世纪以来在高等教育办学形式方面持续创新,目前已具有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5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办学机构,占全国的50%。2010年以来,广东率先启动高水平大学及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高水平学科建设,为国家“双一流”建设提供实践经验;以新体制新机制高起点建设具有引领和示范效应的南方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等;推动省市共建,持续激发深圳、佛山、东莞、江门、茂名等地方政府的办学积极性,在地市层面汇聚起数百亿高等教育发展资金;积极布局发展以产教融合及校企合作为核心的产业学院在全国“新工科”建设中具有示范效应。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历史文化基因和现阶段创新理念及实践将有助于在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牵引下快速孕育新大学并镶嵌中国特色。

4. 高水平大学资源富集为新大学孕育提供广阔平台

大湾区教育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与京津冀、长三角一起构成引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三驾马车”,这一区域不仅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还有大批较高办学水平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基本形成港澳一流研究型大学聚集和广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领先的发展态势。在综合世界各知名大学排行榜形成的第三方指数研究中,大湾区共有2所大学进入前100名,6所大学进入前200名,10所大学进入前500名,18所大学进入前1000名,高等教育综合竞争力在世界四大知名湾区中位列第2,虽与纽约湾区有较大差距,但已小幅领先

东京和旧金山湾区。^[8]同时高水平合作办学机构众多,在本地高校以外还聚拢着大批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国外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佐治亚理工学院、以色列理工学院、莫斯科大学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及国内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约20所“双一流”大学在大湾区设有分校、研究生院或研究院。高水平大学尤其是国际一流大学资源集聚为多理念揉融、多高校协同、多学科交叉及多领域合作提供了交汇平台,是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进程中孕育新大学的重要前置条件。

三、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孕育“中国新大学”的现实困境

目前,为适应并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结构调整,世界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布局新形态大学。^[9]中国高等教育正在沿着面向2035年的宏伟蓝图向世界前列迈进,必须推动理念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筹谋新大学以实现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屹立与引领。目前,在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进程中以创设新大学为重要内容和抓手,既有国家层面的共性问题,也有区域层面的个性障碍。

1. 内部文化价值的神离损耗着行动合力

新大学建设有赖于粤港澳三地内部制度、理念、人才、信息、资源等各种创新要素的充分流通与交融(见图1)。从现状看,一方面,部分香港高校教师、学生长期受西方势力或文化影响,对内地的发展成就与未来潜力还不够了解,粤港澳三地尤其是香港与内地高校发展的理念、制度、价值等还存在冲突,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建设重点还不够明晰;粤港澳三地制度互补优势还未激发出来,交流合作新机制需要探索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三地共同打造新大学的力度和进度。另一方面,目前大湾区内部利益共同体正在加快凝聚但基础尚不扎实,主要原因在于三地虽然高水平的高校数量较多但分布不均衡,广东与港澳高等教育尤其是香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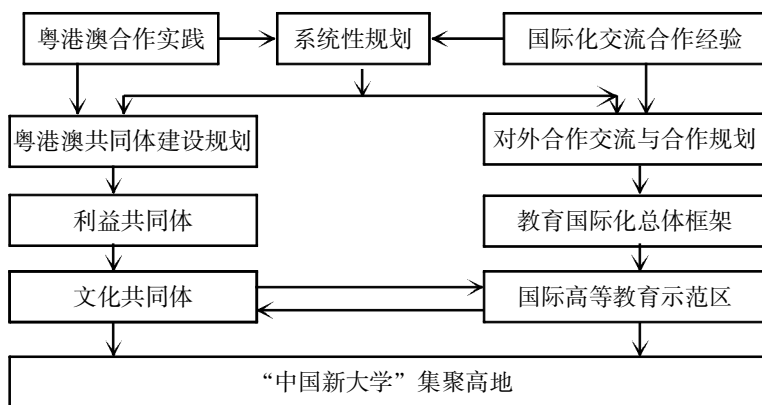


图1 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新大学”集群建设思路图

展水平有不小差距，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广东在校研究生占高等教育全日制在校生的6.09%，不仅低于香港的10.08%、澳门的25.52%，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80%），^①这不仅说明了国家在大湾区内地布局的一流大学数量较少，而且潜在提醒着在聚拢高层次人才、产出高层次成果方面后继乏力。这些差距导致大湾区基于知识、文化等要素平等交流的利益共同体还需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价值整塑和城市繁荣稳定。

2. 治理现代化升级滞慢压抑着顶层引领

从“管理”走向“治理”，为中国高等教育变革提供了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10]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通过尊重规律、挖掘传统、放眼国际、面向未来来实现制度规范体系不断科学健全、决策权力分配不断优化、行动主体力量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是新大学产生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现实层面上，省级政府因地制宜统筹高等教育发展的权力还比较有限，导致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各类创新要素及时有效协同能力等均有待提升。最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在政策、目标及重点上先后确立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破五唯”等战略性路径，但是高等教育仍较为严重地依附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标准体系和发展逻辑，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还盲目追求着西方大学学术排名和推进模式，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内新大学孕育而生的评价体系亟待深化完善。同时

在院校内部治理体系上还存在着封闭性，政府、行业、企业、科研设施等外界要素以及教师、学生等内部要素共同参与治理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延，基层单位的创新创业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3. 高校设置的范式传统制约着中层革新

新大学产生的机理在于突破传统大学设置的范式和路径，在复杂性系统的交互作用与要素调整重组中产生新功能、新形态。有学者认为未来大学是与世界保持联系并扎根社会的具有鲜明开放性的“生态大学”。^[11]大湾区的科技、产业等创新性国际化要素丰富且产教融合需求旺盛，但目前国家在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方面尚没有给予其充分的相关优惠政策支持和试点探索。长期以来，我国在高校创设上遵照以满足规模扩张需求为主要目标的单一性、大而全的大众化高校模式设置，高校办学主体以政府或个人为主，科技、产业和资金等相关资源优势有待进一步激发与集聚。办学过程中政府、高校、社会、产业、科研院所等办学主体之间依然相对泾渭分明，尚未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共促格局，这些都直接制约着以复杂性、开放性及不平衡性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系统自我组织和革新，也是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中大学系统创新的共性制约。

4. 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影响着基层转型

新大学的产生和建设依赖于学科这一核心及基层性组织的优化升级。在高等教育与社会诸要素的共时性秩序中，以知识创造与传播为

动因而产生的学科更新落后于以经济利益为动因而催发的产业交叉迭代速度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常态性存在。同时以学科建设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在恪守传统利益格局中形成的思维惯性及路径依赖深层次影响着新大学的孕育形成，这既制约着传统大学向新型大学的转变，也影响着新建大学的前瞻与创新。正如有关学者所探讨的那样，“使大学变强的东西削弱了大学”，学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走向僵化……学科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已经确立的探究界限，即使在这些界限变得陈旧时，他们仍然继续保护它们。^[2] 大湾区内虽然产业、科技等资源丰富，但是各高校学科发展理念、定位及组织形式等与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要求还有差距，粤港澳三地高校及院系学科之间的壁垒依旧界限分明，与外在经济社会互动共促的新型关系还未有效形成，这些影响着具有引领未来知识和科技创新作用的新兴及交叉学科的产生。同时大湾区内产教、科教融合的内在资源优势还未充分体现，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等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亟需凸显，学科发展尤其是大湾区内地高校学科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这些封闭性和滞后性因素都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大湾区建设立足区域、面向未来且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大学。

5. 外联水平和形态落后弱化着特质积淀

“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功能定位和关键标识要求持续汇融外部元素以充盈新大学国际化特征，这涉及办学理念、目标、形式和支持体系等国际化全域要素的优化升级，同时未来数字科技必将重塑大学本体及交流互动形态，由信息化引致的从实体大学到虚拟大学的转变将突破传统国际合作中空间场域和时间确定的限制从而创生未来教育国际化新方向和新手段。从现实来看，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正在立柱架梁并有序铺开，但粤港澳三地在国际化要素培育方面的分工协作还未定型；国际化要素发展还不充分，在最新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调查中仅深圳进入前10名，^[3] 大湾区内地留学生数量少，比重不足1%；合作形式不够灵活，合作办学上固化采用“学校+学

校”模式，“政府+”“科研机构+”“大型企业+”等形式未有效开展；以信息化护航的教育国际化有待充分重视并加快试点建设；由于优质资源有限而导致大湾区内地高等教育国际化尚处于资源引育阶段，带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亟需提升。

四、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孕育“中国新大学”的未来进路

国际趋势、中国需求及大湾区实际为在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进程中孕育新大学提出紧迫需求并提供现实基础，未来需要厘清发展方位并实现办学资源条件的有效整合，站在世界全局性连锁性变革的角度明确发展方向，瞄准现实制约要素并精准施策以尽快催化孕育形神兼具的新大学。

1. 实现从“利益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的有序递进

加快推进大湾区高等教育利益共同体建设进而形成创新要素错综交织、价值追求高度凝聚和理想信念协调一致的文化共同体不仅对促进新大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将有助于维护区域稳定繁荣，助推港澳尽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从“利益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的升华需要经过可同步、非线性、有主次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持续支持三地高校开展合作，制订专门的大湾区合作办学政策体系，重点以更积极灵活的政策实现粤港澳合作办学与中外合作办学的有效区分，充分利用珠三角空间和产业优势，带动大湾区高校合作建设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办学机构和项目，建设基础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其次是补齐大湾区内地发展短板，着力扩大创新型人才培养规模，在国家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向大湾区内地高校倾斜，借鉴港澳高等教育经验，在国家监测质量的前提下赋予大湾区内地省级政府或重点高校研究生招收资格审批权，退而求其次的是在研究生招生规模上统筹考虑大湾区建设需求，在发展中提升大湾区内地高等教育综合实力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平等交流中逐渐促进大湾

区高等教育由“利益共同体”向“文化共同体”过渡。再次是筑牢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根基，促进大湾区大中小幼教育协同发展，重点是建设三地高校共同参与且面向未来的新型教师教育学院，以教师互通带动课程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以教师为根本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及凝聚力。

2. 推进从“传统性管理”到“现代化治理”的系统变革

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政策及决策体系各具特点和优势，是通过互学互鉴互融而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理想实验田。首先，在宏观管理体制上，通过放权赋能激发基层首创精神，重点在新型办学机构审批、创新型人才招生和培养、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国际留学生培养以及大学内部治理等方面通过逐层梳理、建立试点、渐进放开等方式激发各级组织的创业活力。探索粤港澳三地高校人员尤其是校长的互访互学以及互相挂职锻炼机制，面向国际招揽管理和教学人才，实现中国特色和世界经验的有效对接。其次，围绕制约管理体制机制关键性问题持续发力，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构建引领大湾区新大学产生和传统大学转型的评价体系，以破除“五唯”为导向在大湾区先行先试加快改革现行的学校评价和教师评价机制，将评价重点转移到对国家和区域人才培养、科技进步、产业发展等的贡献力和影响力方面，以评价体系改革为产教深度融合、科教互动相长的新大学孕育蓄势聚能。最后，着力构建高校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以评价和绩效分配为核心激发基层教学和科研单位发展活力，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建设和管理，推进政府、社会和产业等力量的深度参与从而为共同体建设集聚资源，同时进一步提升国际高等教育先进治理经验和要素的融入程度，促进国际力量的大规模有效介入。

3. 助力从“单一性办学”到“多主体交融”的有效转换

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14]。从国际趋势看，世界范围内在

科技、产业等核心要素推动下的以多主体、跨学科、重协同为主要特征的创新、创业型大学正在加速崛起及布局，带动并引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科技和产业走向深入。促进大湾区各类具有创新性的多元要素充分参与办学是新大学产生的关键，在新建大学上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前瞻性制度设计为各类要素的介入或整合留足空间，使大学建设可以根据内在需要在政府、高校、社会、产业、科研院所、科学装置等办学主体上进行排列组合，以创新办学主体激发各类要素的参与积极性和资源汇聚力。同时坚持立新改旧，加快对大湾区传统大学办学模式的系统性改造，通过积极引进产业、科技等主体参与办学打破传统的创新要素之间的壁垒，实现产教融合从传统的“学校+”向“产业+学校”“科技+学校”新型模式转向，促进人才、知识、技术与就业市场、产业布局、创新需要等紧密连接，加快从封闭的知识生产框架向开放的市场需求逻辑转型。

4. 加快从“过去式学科”到“未来型组织”的持续转型

在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建设新大学必须聚焦学科这一核心组织的深层次变革，注重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产业对学科进行成建制系统性优化。加快建设以服务重大科技创新和支柱产业为旨归、以前瞻性学科为支持的“小而精”的高起点大学，重点突破土地面积、学科数量、学生规模等传统高校设置限制，面向大湾区未来科技和产业布局，依托大型科研装置和企业集团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学院、机器人学院、新材料学院、生物医药学院、先进制造技术学院等小型学院，在某一学科领域实现精耕细作，同时这种轻型架构也便于及时调舵转向以持续与发展需求相适配。在传统学科的优化升级上，基于科技协同与产业交叉发展的新趋势对传统学院进行合并重组与方向调整，构建面向未来新兴学科发展的互动交叉且营养多元的新型复杂生态系统，焕发传统学科新活力，推动学科建设从松散式的科学原理探索研究，转化为面向未来产业愿景、多领域协同攻关的突破创新态势。^[15]

5. 完成从“单向性引进”到“双向性合作”的格局塑造

推进国内外两种教育资源有效对接,构建“输入”“输出”协调并进的交流新格局。在国家层面加强粤港澳三地统筹,充分发挥港澳海外联系广泛和内地发展空间广阔的各自优势,携手建设面向世界的以国际要素集聚为核心特征的新大学。重视国际化核心要素的培育,无论是国际化学生的培养还是国际性科研的协同都需建设一支高素质国际化的教师队伍,应着力采用降低安家费税率、完善购房补贴、人才绿卡、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措施打造高层次人才集聚强磁场和新高地,尤其是建立一批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图灵奖等科学家实验室、工作站,发挥高端人才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创新合作办学形式,鼓励大湾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集团面向全球开展合作办学,支持粤港澳三地高校合作开展境外办学试点并有效防范风险。加快谋设在全球具有引领作用的以信息化带动的国际交流合作机构,试点建设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世界一流大学虚拟国际化园区,合作开展在线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技术转化,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的国际化新范式。

注释:

①香港数据主要统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支持的8所公立大学。澳门数据为现有的10所大学。国家数据根据教育部网站资料测算而成。

参考文献:

- [1] 蔡永莲. 沿海开放地区新兴大学的办学特点及启示 [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3 (2): 30-34.
- [2] 杨移贻. 新大学运动——广东省中心城市办高等学校的经验、问题、对策 [J]. 高教探索, 1995 (3): 10-14.
- [3] 秦国柱. 中国新大学运动: 广东中心城市新办院校研究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 [4] 刘得斌. 从国家战略角度构建中国新型

大学——从美国一流大学的培育谈起 [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6): 143-144.

[5] 朱炎军, 宋彩萍. 世界新兴大学: 内涵、动力机制与发展策略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8 (3): 77-82, 89.

[6] 柳友荣. 中国“新大学”: 概念、延承与发展 [J]. 教育研究, 2012 (1): 75-80.

[7] 陈伟. 论省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创新: 以广东为例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 (1): 28-33.

[8] 南方教育智库大学第三方指数课题组. 全球四大湾区高等教育第三方指数排行榜出炉, 粤港澳大湾区哪家强? [EB/OL]. (2019-12-15) [2020-10-15]. <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1912/15/c2897379.html>.

[9] ORR D, WELLER M, FARROW R. How is digitalization affecting the flexibility and open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provision? results of a global survey using a new conceptual model [J].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edia in education, 2019 (1): 5.

[10] 周光礼.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现状、问题与对策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4 (9): 16-25.

[11] BARNETT R. The coming of the ecological university [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11 (4): 439-455.

[12] 埃伦伯格. 美国的大学治理 [M]. 沈文钦, 张婷姝, 杨晓芳,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62.

[13] 中华网. 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中国城市出炉 [EB/OL]. (2020-03-13) [2020-10-23]. <https://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90416/35683100.html>.

[14]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郑继伟, 徐辉,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3.

[15] 余江, 刘佳丽, 甘泉, 等. 以跨学科大纵深研究策源重大原始创新: 新一代集成电路光刻系统突破的启示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1): 112-117.

(责任编辑 刘红)

(下转第37页)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挑战与战略选择

蒋 凯

(石河子大学, 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要: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条件。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体现出以下特征: 主动开放, 促进国家改革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 平等交流, 珍视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 双向流动, 发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性作用。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复杂国际形势考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传统理念和政策制约、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不足等挑战。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战略选择包括: 坚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合力迎接大变局的挑战;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对象和范围, 构建广阔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关键词: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高等教育国际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28-10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不断转型升级, 加快开放步伐, 扩大开放程度, 在我国国家战略和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提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成效, 不但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 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而且能够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的国家发展规划,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走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需要正视当前面临的挑战, 并探寻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未来发展战略。

一、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特征

开放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一项基本特征和内

在要求, 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各国高等教育应当坚持开放原则, 以开阔的胸襟主动开放, 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开放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活力的重要源泉, 能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新理念、新方式、新动力, 封闭则会导致闭塞落后。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不断向前发展, 深入推进, 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 也是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及其他机构的国际科研合作近年迅速发展, 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收稿日期: 2020-10-15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专项课题重大攻关课题“‘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境外办学发展研究”(2019SYLZG01)

作者简介: 蒋凯, 男, 教授,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事业蓬勃发展, 迈向一个全新的高度。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推动现代化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之一是加快和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体现出以下几点鲜明的特征。

1. 主动开放, 促进国家改革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动开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思想的第一要旨。改革开放以来, 高等教育扩大开放与推进国际化思想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思想和高等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一以贯之地坚持教育对外开放, 深度融入世界教育改革潮流。^[1] 坚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推进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共同繁荣发展, 既是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文化互利合作的需要, 也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核心力量, 通过国际学生流动、国际学者流动、国际科研合作、教育理念和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对外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要求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在持续的文明交流对话的基础上, 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与外部世界积极互动的特征日益明显。^[2]

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国家改革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促进改革发展的原则。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致力于统筹国内与国际发展大局, 自觉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外交政策和国家其他重大战略, 积极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强国等战略。例如, 在出国留学工作中, 改革开放前期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以出国留学为重点, 在派遣方针和条件、留学国别和专业等方面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 即缩小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国家鼓励出国留学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关心、支持和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工作方针。除出

国留学以外, 我国在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与国际组织进行教育合作等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中也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的原则。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中, 我国大力提倡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反对全盘引进和西化, 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服务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还始终强调促进人文交流, 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友谊,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2. 平等交流, 珍视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

平等交流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初期, 虽然我国在与发达国家进行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起步较低, 更多地扮演输入者的角色, 但是我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始终注重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平等交流, 致力于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进行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日本学者喜多村和之倡导教育发展的三个特性: 一是通用性, 即能够为异国、他民族所承认和接受; 二是平等性, 即能够与外国进行平等交流; 三是开放性, 即能够充分对外开放。^[3]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中的平等交流, 不是仅仅向国外学习科学技术、教育经验和其他知识, 而是强调相互学习借鉴; 不是盲目崇拜、故步自封, 而是强调平等互益。国际大学协会 (IAU) 是高等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 该组织提倡将互惠、尊重、平等作为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 以基于互惠、尊重、平等的对话和互动来共同应对国际挑战。^[4]

虽然平等交流是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本要求, 但是在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实践中, 由于各种原因在合作方之间往往难以实现完全的平等交流。加拿大学者许美德 (Ruth Hayhoe) 分析了中国与工业化世界的教育合作关系, 指出中国与欧洲、日本、北美的教育合作有互益的一面, 但是有的工业化国家在对华教育交流中政治动机较明显, 有向中国进行渗透的倾向。^[5] 许美德教授的研究指出了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教育主权问题以及平等

交流的意义。教育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教育事务的最高权力,包括对内教育主权和对外教育主权。维护教育主权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教育交流的前提,同时也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基础。我国历来注重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独立自主性,重视维护教育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相关活动不得违反中国法律,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6]此外,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承担了更多的国际教育责任,加大了教育“走出去”的力度,开展了一系列国际教育援助,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形式不断深化发展。

3. 双向合作,发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性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具有双向性的特征,重视发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对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性作用。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强调既要扎根中国大地,又要放眼全球,在实践中表现为“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引进”,主要包括我国输出留学生、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在境内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聘请外国专家,还包括借鉴国外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吸收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等。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的“输出”,主要包括我国招收留学生、输出教育资源、在国外举办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输出教育理念和经验、传播科技知识和中华文化等。为了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竞争力和影响力,培养大批国际化人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坚持引进与输出相结合原则,积极了解世界,同时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工作。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人员生源地国家。1978至2019年度,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在国际化和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拥有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知识和国际经验的国际化人才,就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我国向国外派出

大量留学人员,客观上为我国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储备了大批国际化人才。在出国留学意愿不断攀升、留学人员规模巨大的背景下,我国出国留学工作已经转换重点,积极采取措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通过一系列人才计划和优惠政策引进大批学有所长或取得成就的高层次人才回国参加各项建设事业,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近年,来华留学生教育迅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亚洲第一大留学生目的地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批知华友华人士,增进了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文明交流互鉴。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积极统筹谋划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发挥二者对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中外民众友谊、促进国际理解、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二、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一系列挑战。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更凸显了挑战的严峻程度。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中,如何看待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正在面临的挑战,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1. 复杂国际形势对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造成多层次负面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有的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乃至国家整体对外开放上渐趋保守。复杂的国际形势对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造成了多层次的负面影响,而背后是全球主导力量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较大规模反全球化力量。^[7]复杂的国际形势不但阻碍了各国形成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共识,而且对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实践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制约了学生流动、学者流动、合作办学、科研合作等形式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新的国际形势对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构成的挑战具有多层次性和关联性。一方面,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浪潮的消极影响逐步蔓延开来,催生了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中美

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相互叠加后衍生出更多的棘手问题。上述两方面彼此联系所形成的挑战,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人员流动、科技合作和经济贸易等领域对中国的遏制,不但直接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而且通过干预他国政府的方式对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添加了其他限制。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下的贸易战和科技遏制,折射出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均衡受益和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巨大挑战。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在受益于良性全球发展环境的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全球发展的繁荣和稳定。基于主权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需要平等稳定的国际环境,国际形势突变尤其是国际关系紧张和有的国家留学签证政策收紧,给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和科技遏制,对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大幅度削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签证数量。2020年7月,中国大陆计划赴美留学人员的留学签证申请仅有145个(F1类)和12个(J1类)获批,较上年同期下滑了99.3%和99.7%。^①此外,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24家高校和企业等机构被特朗普政府列入“实体清单”,这些高校对外交流与合作严重受限。^②

2.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程度断崖式下降

作为一次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对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致使国际学生流动和国际学者流动等形式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幅度削减。新冠肺炎疫情危害人类生命安全,需要通过保持社交距离来控制 and 预防,许多国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因而中止或改为线上开展。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疫情影响了全球近16亿学生的学习,占全球学生群体的94%,波及99%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③国际大学协会对全球109个国家或地区424所高校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与调

查的高校都表示受到了疫情冲击,其中59%的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被迫停止运行;超过三分之二的高校表示教学受到了疫情影响,改为采用网络教学;89%的高校经受国际学生流动的挑战;80%的高校表示科研受到了影响。^④作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深受疫情困扰。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我国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运行逐步恢复,但高校主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国际学生线上学习和学术交流等,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受到严重的制约。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所造成的挑战具有全方位、联系广、持续长等特点。此次疫情冲击着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中的国际学生流动、国际学者流动、合作办学和国际科研合作等各个方面。国际贸易和学生流动等方面的活动,因疫情冲击而产生了复杂的联系,增加了应对挑战的难度。由于疫情在传播范围等方面的复杂变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各项实践将面临持续的考验。除此以外,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所受到的系统性冲击之下,疫情还导致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受疫情影响,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不能按时出国学习,转而选择网络学习或者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就读。滞留海外的大量中国留学生因疫情不能及时入境回国,他们考虑航班、国际旅行安全、交通成本因素后选择暂不归国或辗转多国后入境。前所未有的学习生活环境和社交压力等因素影响了一部分留学生的身心健康。

3. 传统理念和政策体系制约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效

发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在促进国家改革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成效,需要富有活力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理念和政策。但是,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理念和政策体系制约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效。传统理念制约集中体现在对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必要性和具体方式的认知上,即是否需要开放、向谁开放和如何开放等。高等教

育对外开放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其中第一条经验就是，思想解放是活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体制的基础，是保证对外开放政策体系稳定性的观念基础。^[1] 在实践中，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传统理念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视为高校少数部门的职责，多数部门缺乏深度参与。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发展至今天，不仅需要高校在学校层面加以统筹谋划，积极响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号召，更需要高校以推进国际化思想实施新的举措，打通院系与职能部门之间的隔阂，构建开放的、国际化的高校学习交流与生活环境。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体系制约突出地表现为新旧政策更迭所造成的延续性和适应性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亟需发挥在培养“一带一路”新型国际人才、推动国际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作用，但是实现新战略目标的紧迫需求与新政策制定和执行耗时费力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换言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体系尚处于过渡转型期，在新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以形成合力，要求高校投入人力和资源以高效地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以创新的理念应对内部转型的需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此外，在加快和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在输出国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引进优秀外籍人才和来华留学生毕业后就业等方面，仍然存在较明显的政策缺口，进而造成了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时缺乏政策依据的问题。

4. 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不足约束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转型升级

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顺利开展和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仍不足，约束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应对的挑战和实现转型升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既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在探索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形塑着其他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及国家发展的理解与认知，并且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高等教育国际竞争

力包括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中的核心竞争力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提升科学研究能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应对全球性公共危机时的能力。例如，当前我国派出到国际组织工作的高层次人才数量不足，与我国对国际组织发展应做贡献不符。我国输送到国际组织的高层次人才有限，尤其是担任高级别职位、参与国际高级别对话和议程设置的人才稀缺，不利于输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公共产品，阻碍了我国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与维护。在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中，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既需要通过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来增强竞争力，也需要通过我国在经济和国际地位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来保障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发挥。

我国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对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升级转型的要求，需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在发展理念、实践形式、作用和成效等方面进行及时的调整更新。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意味着能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掌握更多更大的主动权，有利于加快和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与贸易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还存在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遭遇沿线国家的政局变动、部分国家社会认知趋于保守等方面的挑战。在共同治理全球性教育发展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不足不利于我国输出高等教育公共产品，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一系列挑战，但是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的发展需要我国对外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实施也离不开世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迎接挑战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需要理念更新和制度建设,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程度的对外开放。

1. 坚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合力迎接大变局的挑战

开放带来繁荣和进步,封闭则会导致落后。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前进的过程中往往伴随各种困难和挑战。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浪潮对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我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坚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在挑战和危机中寻找发展机会。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而形成的宝贵经验之一。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需要在国家层面持续投入公共资源,维持相关政策的执行力。与此同时,需要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实践中进行统筹协调、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融汇各级政府和其他渠道的资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一项战略重点工作。^[12] 该建议强调,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助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高等教育要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发挥作用,通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助力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国际新形势下的挑战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和卫生等众多领域,具有复杂性、关联性和变化性,亟需各相关方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以应对和防范国际性公共危机。在全球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不但要在已有基础上思考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对解决传统公共问题的作用,还需要探寻应对保守主义、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的创新性合作途径。^[13] 此外,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所面对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所处环境

复杂多变,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实践中需要做好对有关国家的跟踪调研,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实际成效和危机应对能力。

2.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开辟了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共同繁荣发展,既是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文化互利合作的需要,也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通过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推动现代化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将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民生和社会观念、基础设施和经济贸易、政策制度等方面形成了日益密切的互联互通格局,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多次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重视“全球共同利益”,向所有人开放知识的创造、掌握与运用,融合教育治理与知识治理。^[14]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追求的实质上就是全球共同利益。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要突破旧有发展思维的束缚,超越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中心-边缘”依附格局。^[15]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需要推动构建多中心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局面,在共享国际资源的同时共担风险。

在传播创新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需要调整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立场。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作用,需要在本土立场和观念的基础上增强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和观念。^[16] 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方面,我国高校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比较紧密的互动,高校在响应和落实国家战略和发展规划等

方面积极发挥作用。2020年,无论是通过直接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借助网络技术等共享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我国高校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蕴含了增进人类福祉的全球性关怀,以“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理念为指引,分享中国智慧和方案,通过平等互利的国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具体的战略选择和策略实施中,我国高校需要进一步发挥能动性,增强自身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能力,通过更有广度和深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经济建设和民心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对象和范围,构建广阔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为了应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对象和范围需要进行较大幅度调整,以构建更广阔、更有利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在近年的逆全球化浪潮中,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对象和范围,为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灌注活力,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前些年,我国学生出国留学、教师国际交流、国际科研合作等都偏重少数几个英语国家,国际交流与合作对象失衡现象较为严重,这种状况不利于形成广阔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除此以外,大量的出国留学学生主要流向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才流失,也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应当加强我国与更广泛国家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避免将交流与合作的对象集中于少数一些国家,这样才能构建能更好地应对国际形势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基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进展,亟需认真思考如何扩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象和范围。扩大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象和范围需要防止矫枉过正,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双向留学和国际科研合作等的发展。面对

新的全球形势尤其是逆全球化浪潮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应当确立“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合作国家和地区,以响应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新布局和新要求。^[17]在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未来规划中,需要丰富国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内容和机制,增强交流与合作的特色。^[18]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需要通过探索新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象、扩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范围、探索新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来寻求突破,依托“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设立跨境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平台,扩大与更广泛国家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4. 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有利于提升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21世纪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世纪,面对有关国家的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加上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知识型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我国需要不断拓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范围和深度。在贸易战、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等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学生申请的留学国家及留学专业的范围、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与其他国家的科研合作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亟需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增强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减少对通过出国留学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依赖,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反过来也有利于我国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开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吸引更多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提高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科研合作的层次,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为国际共同利益、全球共赢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提升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需要以内涵式发展方式引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升级转型,从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内容形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完善和创

新,更需要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切实发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作用。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需要通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激发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深层次和多样化活力,在知识传播与创新、文明交流互鉴、应对全球性难题等方面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和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既有巨大的需求,也有坚实的基础和现实条件。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杨锐教授所指出的,在持续的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高校既是改革创造的结果,也是未来发展的缔造者。^[9] 在国际形势变化与国内发展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模式、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有利于增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活力,把握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

四、结语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博采众长,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流互鉴。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进程中,我国注重主动开放,通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促进国家改革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注重平等交流,珍视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注重双向合作,积极发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性作用。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和实践探索,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不断向前推进,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事业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严峻的挑战,处于前进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同时也处于关键窗口期和发展机遇期。虽然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仍将面临复杂的内外部考验,但是经历挑战和调整后,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肩负着培养高层次人才、促进人文交流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使命,是一项必须坚定不移地

长期坚持的教育基本政策,在困难和挑战之下更加需要坚持。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2020年11月14日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东南亚论坛”2020国际会议暨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融合创新论坛上周满生研究员所做的学术报告《当前留学形势简析与进一步扩大教育改革开放》。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网站.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EB/OL]. (2016-08-11) [2020-11-2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
- [2] YANG R. China's strategy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 overview [J].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2014 (2): 151-162.
- [3] 陈学飞. 高等教育国际化: 跨世纪的大趋势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8.
- [4]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ffirming academic value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 call for action [EB/OL]. https://iau-aiu.net/IMG/pdf/affirming_academic_values_in_internationalization_of_higher_education.pdf.
- [5] HAYHEO H. Penetration or mutuality? China's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Europe, Japan, and North America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86, 30 (4): 532-559.
- [6] 中国人大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EB/OL]. (2000-12-05) [2020-12-10].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638.htm.
- [7] [17] 马佳妮. 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留学生教育的特征、挑战与趋势 [J]. *教育研究*, 2020, 41 (10): 134-139.
- [8]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mmerce Department to add two dozen Chinese companies with ties to WMD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to the entity list [EB/OL]. (2020-05-22) [2020-11-21].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5/commerce-department-add-two-dozen-chinese-companies-ties-wmd-and>.

[9] United Nations. Policy brief: education during COVID-19 and beyond [EB/OL]. (2020-08-22) [2020-11-21].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20/08/sg_policy_brief_covid19_and_education_august_2020.pdf.

[10] MARINONI G, VAN'T LAND H, JENSEN T.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higher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Global Survey Report) [R]. Paris: UNESCO House, 2020: 11-12.

[11] 徐小洲. 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就、机遇与战略构想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5 (5): 1-9.

[12] 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EB/OL]. (2020-11-03) [2020-12-06].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13] DE WIT H, ALTBACH P G.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trend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ts future [J/OL]. Policy reviews in higher education, 2020 (103): 17 [2020-09-16]. <https://doi.org/10.1080/23322969.2020.1820898>.

[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72.

[15] 周作宇, 马佳妮. 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价值坐标 [J]. 教育研究, 2017, 38 (12): 42-50, 67.

[16] 吴寒天, 阎光才. 大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国大学的时代使命与自我革新 [J]. 探索与争鸣, 2019 (9): 149-157.

[18] 教育部网站.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EB/OL]. (2019-02-23) [2020-11-24].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

[19] YANG R.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arrier within [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20, (103): 14-16.

(责任编辑 刘红)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Opening-up: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Jiang Kai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opening-up is a core component of China's overall education opening-up. It is a critical condition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building a stro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hina's opening-up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active opening-up, emphasizing on promoting both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civilization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equal exchange, cherishing discussion, collaboration, and sharing with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valuing the two-way flow aims to fulfill the developmental role of opening-up. At presen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opening-up is standing the test of complicated world situation, the shoc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raditional perception and policy constraints, and in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discourse power.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persisting in the practice of opening-up higher educa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ollaboratively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profound changes; serv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d jointly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panding the objects and ra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and constructing a more favorable pattern of opening-up; increasing the high-level talent training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building China into an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opening-up;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上接第 27 页)

Nurturing “New University of China”: Practical Direction and Route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ang Zhiqia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HEDZ) is an important layout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is also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reg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Building “new university of China” with moral edu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high starting point and influence, leading role in the future and international exemplary provides a new vision, new role and new path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reater Bay Area. The cultivation of “new university of China” in IHEDZ has not only feasible conditions such as clear planning, strong demand and rich resources, but also practical barriers such as internal cultural value separation, slow upgrading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raditional paradigm set up by universities, path dependence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backward level and form of outreach. In order to promote IHEDZ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niversity of China” as the traction, it needs to focus on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from community of interest, traditional management, single school running, past discipline, one-way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community, modern governance, multi-agent integration, future-oriented organization, two-way cooperation, etc.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New university of China

[编者按] 近期,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了第 1 期教育部直属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 61 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14 名学员在为期 3 个月的培训中, 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以自选课题为依托, 深入研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并催生出系列研究成果。学院组织了相关专家进行严格的答辩评审, 甄选出一批优秀论文。本刊协同学院干部培训部工作, 将部分优秀论文在“学员论坛”栏目持续推介, 以期更好地宣传学员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方面的新经验、新认识。

创新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郭 雳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 要: 探索创新涉外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 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 也是教育领域制定和实施“十四五”规划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目前, 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实践面临教学培养体系有待完善、能力训练中实践性强调不够、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障碍等三项突出问题。夯实复合交叉培养、开展法律诊所实训、探索新型联合培养项目是法律院校应对上述挑战的最新尝试。在国家层面, “两支持、一引导”(政策支持、经费支持、项目引导) 的组合方案可被考虑。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涉外卓越法治人才; 教学改革; 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38-08

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 在教育领域, 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改革创新涉外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方法, 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要“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必须“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教

育部为此积极行动, 明确“德法兼修”原则, 将法治人才列入“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并会同其他部委研究部署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 结合境内外高校的有效做法, 就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提出若干见解和建议。

一、加快培养涉外卓越法治人才的重要意义

加快培养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契合国家发展

收稿日期: 2020-11-16

作者简介: 郭雳, 男, 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 1 期教育部直属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 61 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主要从事经济法学、法学教育研究。

战略，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

1.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

为适应世界多极化和国家对外开放的要求，我国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国际竞争的涉外法治人才。^[6] 涉外法治人才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政府部门、跨国经营企业的法律顾问和专职法务工作者。在我国政府国际交往持续拓展、企业不断“走出去”的当下，这类人才对维护国家及相关主体的利益越来越重要。第二，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主要在律师事务所或涉外专业机构从事法律实务。第三，在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从事国际法、国际商事规则、外国法、比较法等研究的学者。毋庸讳言，目前的法治人才培养面临着结构性问题。面广量大的中低水平法律从业者整体上供大于求，而真正符合“涉外法治人才”要求的法科毕业生仍然相当短缺。

虽然我国已有一些高端法治人才在相关国际组织任要职，像国际法院副院长薛捍勤、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负责人赵宏、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段洁龙、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等，但整体而言，在各类国际组织尤其是法律类国际组织或者国际组织下设的法律部门中处于领导层、发挥领袖作用的中国人数量很少；^[7] 而且在各类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籍雇员占比非常低。以联合国秘书处为例，至2018年年底，其总雇员人数为37505名，其中中国籍雇员546名，占比仅为1.46%，远低于美国的6.75%，属于40个“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之列。^[8] 加快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成为充实我国法律人才供给的必然之举。

同时，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对较长时期的摸索与积累。这些人才不是简单的“外语+法律”的堆积，而应当是具备国家利益意识、法律专业素养、语言文化底蕴这三方面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使各法学院积极地寻求变化和突破，创新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9]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

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6]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涵。^[7] 涉外卓越法治人才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发出中国声音的关键推动力量，加快培养涉外卓越法治人才是强化涉外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成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

中国早在2010年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各地拥有广泛的国家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不断加强，各种涉外活动日益增多，涉外法律事务空前频繁。当今国际社会和国际交往建立在日益繁复的规则体系之上，中国要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向公平公正方向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世界性挑战，就必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妥善应对诸事。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等全球性议题相关治理规则的讨论与制定，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到全球治理规则文本之中，促进国际法治建设与完善。这就需要培养大量涉外卓越法治人才。

作为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是“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布《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2.0的意见》，针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师资、课程、国际交流等方面提出诸多举措，^[8] 其对加快培养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中的突出问题

考察目前国内各法学院开展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教学培养体系有待完善、能力训练中与实践性强调不够、

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障碍等三项突出问题。

1. 学校教学培养体系有待完善

一是人才培养体系尚未与国家战略充分对接。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目前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均未完全到位,学生仍以学习中国法律为重点,包括国际法、普通法(英美法)、比较法在内的涉外教学体系在系统性、内容丰富性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9]在某种程度上,涉外法律学科的重要性未得到足够重视,如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三门课程原先均列为所有法学专业学生需修读的专业核心课程,但近年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调整后,仅有国际法被保留,其他两门则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纳入其学生的必修课程。^[10]此外受制于资源约束,涉外教学计划和课程(特别是外文课程)较为零散,随机性强,且外文课程与整体教学计划融合度不高,导致学生涉外法律基础不扎实。

二是国际资源的引入和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优质国际资源的争取较为困难。中外法学院希望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关系,而非资源的单向流动。另一方面,国际资源的可持续性不容忽视。国际交流项目中交换生来往失衡问题普遍存在,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例,过去五年间派往境外访学的学生是同期学院接收外国交换生的一倍多。这类问题常使国际交流项目遭遇瓶颈,甚至出现合作院校流失,其在与境外顶尖名校的合作中尤为凸显。

三是课程思政建设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融合不足。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更应强调立德树人要求,增强学生国家利益意识,坚定学生理想信念。然而目前从师资到内容再到形式,相关课程思政的整体水平距此目标均有差距。

2. 能力训练中对实践性强调不够

早在十年前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相关意见中就将培养法律实践能力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开展,^[11]但是学生涉外法律实践能力不足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这主要是受到知识不够系统、结合不够紧密、应用不够充分等因素的影响。

一是法律实践知识掌握不够系统。培养娴

熟的涉外法律实践能力需要学生掌握法学、外语、国际经贸、国外社会文化等多学科多领域知识。然而据学者的调研发现,只有少数院校专门设置了“法学+小语种”或“法学+经贸”的培养模式。^[12]这主要是受学科设置、培养体制等条件制约,现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整体仍侧重于法学知识的讲授,学生在外语(特别是小语种)、跨境商务等方面的知识积累不足。

二是传授内容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给学生讲解涉外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前沿问题,有利于激发其创新学习能力和自主学习动力。但目前国内法学院能够密切追踪涉外法律实践发展的高水平专业教师缺口较大,课上介绍的涉外法律实践内容相对陈旧浅显。

三是法律实践应用不够充分。目前涉外法治人才的教学培养仍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内容主要是法条解读和学理阐释。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模拟谈判等教学方式逐渐获得认可,但受条件所限,尚未大规模普及。而实践性最强、锻炼效果最佳的境外法律实习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与一些重要的国际资源对接,尚需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方能推进。尽管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出台了《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选派管理办法(试行)》,对学生前往国际组织实习提供了一定资助,^[13]但如何进一步拓展重要国际组织、机构的实习机会,仍有赖于相关部门的努力和协调。

3. 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障碍

一是制度和管理障碍。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与国家、学校现有规章制度存在一些冲突。例如,国外高校希望开展的双学位等创新型项目,因受相关规则限制,推进实施困难;聘请外教涉及诸多外事手续,开设课程手续较为烦琐;部分环节存在制度不协调、程序不清晰,如与国外法学院协商相互减免学费达成一致后,却因财务流程、审批渠道不明确而难以落实。

二是经费紧张且财务限制较多。涉外卓越法治人才的教育培养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丰富国际法律课程体系,国内法学院要聘请优秀国外学者或法律实务人员讲授涉外课程。按世界一流大学的薪酬标准,价格不菲,而目前

国内法学院仅能提供较为微薄的课酬，一些国际学者甚至是免费授课。类似地，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参与国际交流或国际赛事的资金支持也缺乏制度性保障。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主要用于相对长期的国际交流学习资助，且倾向于博士研究生，因此大量优秀本科生参与的短期项目或一些重要的国际赛事，往往没有机会获得资助。同时，高校现有财务制度严格，对经费使用的限制较多，无论是聘请优秀国际学者短期授课，还是学生参与国际赛事及聘请专职外籍教师辅导，具体列支报销往往遇到困难。

三是国际化教学管理团队人才紧缺。除了高水准的教学科研人员，涉外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还需要国际化的教学管理人才。他们应具备国际视野和思维，在行政管理、外语和法律专业方面富有经验，才能更好地起到服务和支持作用。而目前该等管理人才受限于学校的编制和待遇，常出现紧缺。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例，目前仅有2名管理人员，负责学院200多个国际化项目，任务繁重，工作待遇和个人发展空间受限。

三、创新培养方式的若干最新探索尝试

针对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需求和问题，国内部分高校结合自身特色，开展一系列创新尝试，丰富了相关实践。

1. “法学+N”：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迥异的法律传统、语言文化和风土人情，对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提出了较高的复合型要求。一些高校或整合校内资源或开展校际合作，为学生提供“法学+语言、经贸、社会、文化”等新的学习机会。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曾建议，提升“一带一路”语言服务能力，增加非英语语种法学教育。武汉大学的“中德德语、法学双学士学位试验班”、中国人民大学的“中法联合项目”等都是“法学+小语种”的教学尝试，有利于培养法学基础知识牢靠、小语种能力扎实的涉外法治人才。此外，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外国

语大学联手以“外语法学双精通”为目标，试水本科和研究生跨校贯通培养模式。除语言能力外，涉外法治人才还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有一定掌握。北京大学专门开设“一带一路”文化类选修课程，以供包括法学院在内的校内外学生修习。

2. 涉外“法律诊所”

教育面向未来、回应现实，与现实相结合的教育往往是更加深刻的教育。在回应涉外法律具体挑战的实践中，师生们可以一道获得成长。涉外“法律诊所”可起到检验学生涉外法律知识、锻炼学生涉外法律技能的目的。建设类型多样的海外法律诊所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国际化法律教育上的一大贡献，如通过国际人权法律诊所调查巴西的监狱状况，通过谈判和仲裁法律诊所评估亚洲开发银行的争端解决系统。^[14]

而在我国政府带领人民英勇抗疫反受恶意指责、无理兴诉时，在华为、TikTok等企业遭遇境外“法律陷阱”时，在相关主体面临各类制裁或威胁时，同样有法学院的师生运用所学投入抗争，提供了大量的决策依据和行动建议。在某种意义上，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为今天的中国法学院提供了一套独特的“法律诊所”，因势而为将缔造难得的专业和精神锤炼。^[15]

3. 新型本科双学位

为响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要求，北京大学与香港大学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平等互惠”的原则，最近在法学领域开展了新型本科双学位项目合作。该项目为五年学制，由两校合作招录、共同选拔，学生分别在北大和港大接受两年半的专业法学训练，达到两校毕业要求后将同时获得由北大和港大颁发的法学学士学位证书。项目旨在探索法学教育合作新模式，助力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培养和输送通晓国内外法律的一流人才。

中国内地属于成文法传统的大陆法系，香港地区属于判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两地法律制度迥异，法学教育模式各有所长。新项目能

够让学生同时接受内地和香港最顶尖的法学教育,深入了解两地的法律制度和不同法系的法治理念,在比较融会中拓展全球化视野,形成跨法系的知识储备,拥有解决跨境法律问题的专业能力。同时,项目将通过培养造就融通两地法治的人才,维护和促进香港繁荣稳定,增强其与内地的紧密联系。^[16]

四、提高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对策建议

若不积极应对解决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中的突出问题,势必会对保护我国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努力造成不利影响。结合上述最新探索,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1. 补齐院校教学培养体系短板

一是聚焦国家战略,加强涉外课程建设。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课程设置应着眼并服务于“一带一路”等重大主题。首先,高校应强化课程思政建设,在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强化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目标。同时,国内院校可效仿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做法,尽可能多地开设国际法方向课程,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多通晓涉外法律规则的机会。与此相关,应增加境外教师直接授课的比例,提供原汁原味的外文教学。过去几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聘请了30多位海外著名学者、实务专家担任访问学者,开设了Global & Comparative Law系列课程、普通法精要课程等;学院设立“众达全球化与法治讲席教授”,耶鲁法学院Paul Gewirtz教授、哈佛法学院William Alford教授成为该讲席前两任教授。这些外文类课程能够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实现专业知识、技能与语言表达的结合,培养其在全球化环境下理解、运用法律的能力。^[17]

二是多途径拓宽对外交流渠道。国内高校应通过交换项目、联合培养、创新计划、暑期学校、博士生会议等多种跨境访学渠道,为学生提供海外留学机会。留学能够让年轻人获得优质、便利的域外法学教育,亲身体验外国社

会文化,锻炼跨国沟通能力,这对学生积累涉外专业知识、培养涉外法律技能、开拓国际视野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国家有关部门也应支持和帮助法律院校争取优质国际资源,如协助其与更多的重要国际机构、组织建立联系,开发具有可持续性的合作项目。

三是有规划地推进高水平专项国际合作研修。例如,可将年轻律师和高年级研究生混编,通过与国外高校、机构深度合作,境内外联动实施,集中强化涉外律师专业技能。研修科目包括国际商法、国际投资与并购、国际贸易、海外合规、跨国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商事与公司涉外争议解决、国际商务谈判规则与技巧、国际形势分析、突发事件应对及涉外法律环境、国际公法、国际组织、法律体系与法律文化等。

2. 强化学生涉外法律实践能力

一是汇聚高端师资,强化实务指导。除了校内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和调整讲授内容,巧用“外脑外力”也是不错的办法。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聘请国外名校的专精学者前来开设涉外法律实践类课程,近距离观摩借鉴。高校也可以主动与国际组织、仲裁机构、知名律所、跨国公司合作,延请具有涉外法律服务一线经验的专业人士作为校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丰富培养内容。

二是尝试开设涉外“法律诊所”课程。针对涉外法律实践课程内容薄弱陈旧等短板,有条件的法学院可以参考哈佛大学法学院“海外法律诊所”的做法,结合法律焦点和现实需求,如国际贸易争端、跨境投资纠纷、制裁及其应对等,具体剖析其中的涉外法律难点,利用现实场域、鲜活案例来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实践能力。

三是建立健全法律院校与涉外的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企业、法律服务机构等之间联合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协同工作机制。重点是将法院、仲裁、司法、商务系统等涉外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更有效地引入法律院校,强化和创新实践教学。

四是推进境外实习这一国际化培养新途径。国内法学院应积极探索与欧美、亚太等地区的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企业等签订

合作协议,为学生提供境外实习机会,锻炼学生涉外法律实践能力,并为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创造赴国际组织机构就业的机会。

五是推广模拟法庭,强化实训锻炼。法律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庭是法律人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用好模拟法庭这一形式,特别是借助国际性模拟法庭赛事的平台,将其与常规的课程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联动互助,是培养涉外卓越法治人才的有效途径。

在这方面,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经验值得借鉴。其模拟法庭实训课程以平台化的教学组织方式,聚焦国际公法争议解决、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刑事裁判、跨境企业并购、国际人道法实践、空间法争议等主题,以“理论+实务+赛事”的模式提高学生从事涉外法律实务的综合素能,并形成“基础课程+九大国际赛事”的标准模式。通过模拟法庭实训课程平台的培养训练,一批涉外卓越法治人才脱颖而出。

3. 协力克服体制机制障碍

在国家层面,可考虑采取“两支持、一引导”的组合举措方案。

一是政策支持。首先,应鼓励各法律院校根据自身学科专业实力、办学特色和区位优势,有规划、有侧重地确定不同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功能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国家支持若干领先法律院校各开展1—2个有特色、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其次,应支持各法律院校调整、优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建立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将涉外法律、国际法、英美法、国际关系、英语、法语等相关科目,纳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再次,应在学制、学分、学费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使学校及学院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包括必修课程的设置调整,以增加制度安排上的灵活性,提升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同时吸引更高质量更多元化的国际学生到我国法学院来学习。最后,应支持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相关的师资队伍建设试点。如前所述,训练涉外法治人才除了聘请境外和实务领域的客座教师,还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常设教师及管理队伍。这些教师与目前各

法学院多数教师的特点和职能均存在差异,应与“破五唯”的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相结合,探索建立该类教师的评聘和考核机制。

二是经费支持。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平台搭建、师资队伍、课程设计、教学改革、竞赛实习等多方面都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目前,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突出,主要依靠各法学院自筹经费来解决。建议在制定“十四五”教育规划时,国家能够更加重视经费投入问题,安排专项支持,特别是考虑与前述特色品牌项目相结合,夯实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条件,使法学院可以集中力量抓好教育教学工作。

三是项目引导。针对涉外法治工作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和急迫需求,有必要选取如“一带一路”建设、国际营商环境改善、外国制裁应对等领域设立专班专项,重点攻关,及时考评,得出真招实招,助力国家战略的实施,摆脱被“卡脖子”的局面。

五、结语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谈到“学生在大学里学什么、能学到什么、学得怎么样,同大学人才培养体系密切相关”,要求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就是其中一个范例。“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出了多方位需求。下一阶段,畅通国内大循环、打造开放的双循环各个环节,都需要各法律院校不断输送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持续提供高质量的研发支持。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晨同志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调研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培养既掌握国内法律又熟悉国际法、国别法的高素质人才,更好维护我国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8]。

中国的法学院任重道远,要使相当数量和

比例的毕业生既熟悉国际法律规则和实践、具备良好的国际交流能力和业务能力，同时也胸怀国家利益，积极报效祖国。无论在促进中外政治、经贸、社会往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方面，还是在向海外输出优秀人才、提升中国法律体系和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方面，各家法学院都应付出更大努力。同时，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还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考虑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外语教学等更加紧密地开展跨学科跨专业的教育合作。希望高校和社会各界携手，动员更大范围内的积极因素，通过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的总体目标服务。

参考文献：

- [1] 陈宝生.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N]. 光明日报, 2020-11-10 (13).
- [2] [11]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 [EB/OL]. (2011-12-23) [2020-12-05].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75/201204/xxgk_134451.html.
- [3] 黄进. 完善法学学科体系，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J]. 国际法研究, 2020 (3): 7-10.
- [4] United Nations. Composition of the Secretariat: staff demographic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EB/OL]. (2019-04-22) [2020-12-05]. <https://undocs.org/en/A/74/82>.
- [5] 李晓磊. 涉外法学教育的国家战略情怀——专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梅夏英 [N].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9-12-12 (5).
- [6] 陈训秋.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努力奋斗 [N]. 法治日报, 2020-11-20 (1).
- [7] 新华网. 新华社重磅文章带你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 [EB/OL]. (2020-11-18) [2020-12-05].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18/c_1126756837.htm.
- [8]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 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 [EB/OL]. (2018-10-08) [2020-12-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9/s6550/201810/t20181017_351892.html.
- [9] 贺赞.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以课程体系建设为中心 [J].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2017 (2): 3-11.
- [10] 刘坤轮. 我国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流变及最新调整 [J].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2019 (2): 3-16.
- [12] 韩永红, 覃伟英. 面向“一带一路”需求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现状与展望 [J].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2019 (1): 79-92.
- [13] 国家留学网.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选派管理办法 (试行) [EB/OL]. (2017-08-03) [2020-12-05]. <https://www.csc.edu.cn/chuguo/s/971>.
- [14] 郭雳. 中美一流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以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为例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 (11): 71-77.
- [15] 郭雳. 创新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方式 [EB/OL]. (2020-10-10) [2020-12-05].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010/t20201010_364096.html.
- [16] 车浩, 朱煜琪. 北大港大强强携手 正式开展新型法学本科双学位项目合作 [EB/OL]. (2019-02-27) [2020-12-05]. <https://www.law.pku.edu.cn/xwzx/xwzd/90878.htm>.
- [17] 郭雳. 北大法学院怎么改革法科研究生教育 [N]. 光明日报, 2016-11-01 (13).
- [18] 王岩, 李香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来北京大学调研 [EB/OL]. (2020-11-27) [2020-12-05]. <http://pkunews.pku.edu.cn/xwzh/0938bb783b4a4f4ca9b1b2c7147564ce.htm>.

(责任编辑 刘红)

Innovating and Reforming the Education of Foreign-related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s

Guo Li

Abstract: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the training models of foreign-related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 signific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also a key issue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 the education field. In the course of cultivating foreign-related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s, there are three concerns needed to address: the law school’s teaching and training method to be improved, the practical skills in the ability training to be emphasized, and the obstacles associated with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to be overcome.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hrough building a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base, upgrading the legal clinic training and launching the new joint degree programs. At the state level, further supports should be provided in terms of both policy and funding, coupled with necessary guidance in the form of special task force projects.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Foreign-related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s; Teaching method reform;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学
员
论
坛

(上接第 19 页)

Research, Judg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Liu Zaizhou

Abstract: China higher education will face some remarkable changes in the popularization stage. Based on popularization theory of Martin Tro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eatures in China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ill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missions of mainly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s” and auxiliary cultivating “generalists”;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will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ority of rights which are easy to enjoy “rights” and difficult to fulfill “obligations”; the enrollment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will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uble track operation of “selection” and “limited opening”; the connotation of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will present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to create a system, accurately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multiple participation 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expand the function, grasp the role,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means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to help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itial stage; Characteristic change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Judgement, research and response

加快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助力发展高质量教育

刘三女牙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我国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 科学研究呈现出集成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态势。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极大地推动了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 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导方向和颠覆性创新的重要途径, 也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建设的新增长点。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学科领域的前沿交叉与融合发展进行了前瞻性布局, 相关高校也纷纷做出了有益尝试。然而, 机遇与挑战并存, 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新的高度和新的体制入手“求突破”, 大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发展“筑高峰”, 加快培养交叉学科人才“强基础”, 促进高等教育深层次变革和高质量发展“辟新路”, 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 学科交叉; 交叉学科; 科技创新; 科技强国; 高质量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46-0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当前, 中国教育事业正处在迅猛发展的新起点, 抢占未来人才储备战略先机, 办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育, 既迎来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纵观人类历史, 科技进步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教育的发展走向, 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和原创性成果大多是由不同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产生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前沿技术与原始创新提供了源泉与动力, 更驱动现代教育不断进行系统改革, 以学科交叉融合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已成为世界

共识, 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交叉学科也是大势所趋。2018年8月, 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双一流”高校要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 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1] 这是我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国家层面对如何建设和发展交叉学科的重要引领和指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 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 推进学科交叉融合”^[2]。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驱动下, 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发展将助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 对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收稿日期: 2020-11-18

作者简介: 刘三女牙, 男, 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1期教育部直属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61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主要从事教育技术、教育大数据、教育人工智能研究。

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途径。

一、学科交叉融合是应对变局、开拓新局的时代需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也在深刻改变着世界格局，科技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国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重大突破，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保障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发挥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但与一些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科技领域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尤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破解“卡脖子”问题实现原始创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1]，我们必须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探索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作用。

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关键在于教育。教育要主动服从、服务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自觉成为新发展格局中的内生变量。迈向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党中央关于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部署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意味着要进一步夯实科技创新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引领大学发展的主旋律。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往往都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人工智能、脑科学、集成电路等许多战略性前沿科技领域都具有典型的多学科交叉色彩，没有多学科融合就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难以应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多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科学与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优势学科的发展点、新兴学科的生长点、重大创新的突破点，也是人才培养的制高点。^[2]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而学科交叉融合则是促进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构

二、学科交叉融合的国内外探索

1. 发达国家学科交叉发展的举措

世界多国政府高度重视学科交叉发展，纷纷进行前瞻性战略布局，相关一流大学也积极推进学科的交叉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体制机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经验与举措。

第一，顶层设计布局，引领学科交叉协同发展。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协会发表了《促进交叉学科研究》的调研报告，明确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内涵与特征，制定了从专业学会、学术机构、资助体系和研究队伍等方面促进交叉学科研究的整体战略思路。^[3]

第二，优化资助体系，加大学科交叉经费投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应用矩阵式资助体系，纵向资助传统学科领域，横向资助学科交叉相关领域，从而形成一个纵横相辅相成的矩阵式资助体系。^[4]该体系体现了对学科政策的通盘考虑和全面统筹，保证了纵向和横向领域的协调稳定和创新。英国于2018年成立了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RI），UKRI设立了战略优先基金（主要资助传统通道无法覆盖的交叉学科科研项目）支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科学问题，同时还通过全球挑战研究基金（主要资助双多边国际合作项目）促进以学科交叉方式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战略性挑战。^[5]此外，英国还通过建立博士培养中心资助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6]德国于1999年推出国际博士生院培养计划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资助期限一般为4—9年，每年投入20多亿欧元的科研经费，占博士生院建设经费总预算的5%。^[7]

第三，构建实践载体，支持学科交叉科研与教学。美国大学的学科交叉教育载体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成立交叉学科学院。交叉学科学院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一个与其他传统学院相似的教学科研机构；另一类是在交叉学科领域基础上将多种课程整合在一起的教学

科研机构。前者多是本科生阶段的培养，后者主要针对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第二种是交叉学科教育项目，通过项目的方式开展教学和科研的协调工作，并根据学校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其主要包含硕士和博士层次的培养，研究领域较为集中。第三种是交叉学科中心和研究所，这是大部分美国知名大学用以推动学科交叉研究的平台，也是培养研究生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科研基地。^[10]除此以外，还包括设立“学科交叉专家委员会”等支持多学科交叉教学与研究的载体。

第四，优化课程建设，创新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美国大学在交叉学科课程建设上较为注重文理结合，并提供相应的交叉学科课程和科研训练。^[11]为了突破传统学科界限以及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英国高校引入生活化“联合课程”，该课程主要以一门学科为中心并向相邻学科辐射以培养学生的知识组合和内化能力。^[12]同时，美国大学采用虚拟的跨学科组织来开展交叉学科研究和教育，该组织可以整合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成员以支持跨学科团队的建设，并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13]英国高校通常实行双导师制，两位导师可以不分主次，也可以选择一名学科专业导师为主导师，而另一名则为第二导师，为学生的专业发展提供建议和指导。^[14]

第五，完善评价机制，为教师跨学科实践提供保障。为解决以传统学科和院系为主体推进学科交叉的师资问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构建了一个四维创新性评估矩阵，该矩阵主要从教学、科研、团队协作、社会服务四个维度来建立交叉学科教师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为每个具体的指标体系分配了不同的权重。^[15]密歇根大学在交叉学科教师评价方面也做了相应探索，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联聘教师评价机制：全方位的考评计划、多学科交叉背景的教师评审委员会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模式。科学全面的评价机制可以有效地保障联聘教师的科研成果贡献和晋升通道支持，并调动教师的投入积极性。^[16]

2. 我国学科交叉发展的现状

我国为营造学科交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育

人氛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交叉研究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改革了二级学科设置办法，我国逐渐出现众多按二级学科管理的交叉学科。^[17]据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完成交叉学科备案的高校共有160所，交叉学科共计549个。^[18]2020年7月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我国的第14个学科门类。与此同时，科技部在“十三五”期间加大对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稳定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式成立第九大学部即交叉科学部，以改革完善项目资助机制，为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各高校开展多学科交叉协同研究的趋势愈加明显，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方面积累了有益的做法和经验。2001年，南开大学设置经管法试点班，是国内高校首个设置的经济、管理、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基地；^[19]2006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率先开辟了跨学科研究的试验田；^[20]2014年，该院协助并推动北京大学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交叉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旨在理顺交叉学科学学生在培养过程、毕业要求与学位授予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Med-X研究院，是学校直属的从事医工、医理、医管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科研教育机构，^[21]旨在通过学科交叉研究解决多个重大医学工程问题。

2020年5月，华中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把促进信息科学与教育学之间的交叉融合作为学校学科发展的核心战略，在促进学科交叉、发展交叉学科方面迈出了新步伐。该学部聚焦国家教育现代化的重大使命和需求，坚持问题导向，以建设“人工智能+教育”集成攻关大平台、构建“人工智能+教育”复合型高水平人才培养模式、打造“未来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人工智能与教师教育创新服务改革示范基

地为重点任务,采取全新的“学科特区”管理体制机制,坚持目标导向,开展自主化的学科治理创新。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在学科建设、人事制度、科研服务、人才培养、资源配置、校企合作、国际合作等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采用“固定+协同”的用人模式,吸引相关学科和学院的教师“双向选择、自由加入”;建立健全柔性引才机制,采取“双聘”制、合作制、项目制等多种“柔性引进”方式,吸引校内外相关领域优秀专家,联合组建团队,开展协同科研攻关与技术合作,以期集聚校内学科资源,打通社会办学力量,形成融合创新、务实协作奋进的学术文化,推动人才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1+1>2”的综合效应,最大限度地激活办学活力,提升办学效益,促进学科交叉的深度融合和高位发展。

三、学科交叉融合的问题与挑战

学科的交叉融合由于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边界,必然带来高校在学科架构、人事聘任、成果考核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如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是世界各国高校与科学资助机构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我国高校在推进学科交叉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与挑战。无论是组织管理方面的障碍,还是考核评价方面的困难,都制约着学科交叉融合的快速发展。

1. 管理体制缺乏

一方面,推进学科交叉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多主体协同创新,而协同创新的基本要求就是“跨学科”“跨机构”。传统的教学科研体制是按学科分立建制,强化了院系的学科归属管理,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资源分配主要根据现有的相对固化的成熟学科和专业。交叉学科的出现势必带来与传统单学科管理体制间的冲突,产生了学科交叉意愿不强、教学科研人员主动性不够、学科交叉人员难以汇聚等问题。^[21]另一方面,学科交叉必须要有相应的发展载体。比如,美国高校主要以成立交叉学科中心和研究所、交叉学科科学院、交叉学科教育项目三种载体支

持学科交叉的科学研究活动。我国高校的学科交叉实践以跨学科研究院和研究中心、跨学科课题组、学科群、跨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实验中心等为主,这些组织大多挂靠在学校各院系,独立性较差,^[23]极少学校采用成立交叉学科学院的形式,缺乏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方向,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也缺乏有效的鼓励学科交叉的措施。

2. 人才培养薄弱

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价值取向。基于学科交叉的复杂性、开拓性、综合性和高度系统化,单学科知识教学无法实现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这需要教师具备广阔的跨学科视野和较高的能力。由于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有差异性,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容易导致教师的跨学科能力不高,也使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产生局限性。同时,学科作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特定组织系统与知识体系,同时具有知识传授和创造的双重功能。学术专门化使高校院系划分细化,独立的学科专业强化了人才培养、教学等方面的条块分割。目前,多数高校交叉学科学生的培养还存在规范化严重不足、规模效应不强等问题,不同程度面临着顶层动力设计偏差、院系阻断优质资源流动、培养过程与出入口不符、考核评价背离实际等现实问题和突出困境。^[24]

3. 评价体系滞后

开展绩效评价是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必要手段。由于涉及研究范式与知识内部的融合,交叉学科相较于传统学科更为复杂,对交叉学科以及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的评价难度更大。当前,高校学科和科研评价以传统学科质量标准为主,绩效评价以同行评议为主,更注重论文、获奖、项目等阶段性量化标准,呈现出的指标单一化、标准定量化、方法程序化等倾向仍然存在,不适用于研究周期长、阶段性成效不明显的交叉学科评价。同时,交叉学科归属不明,会带来交叉学科在新学科设立、科研立项、基金分配、学术成果发表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亟须建立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开放多元

的评价体系。

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相关建议

学科的交叉融合需要多学科专家的协同,具有复杂和综合的特色。因此,要以新的高度审视学科交叉发展,以新的体制创新学科交叉发展。要坚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学科方向,坚持以培养具有综合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育人方向,完善管理机制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考核评价方式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要素,构建符合学校特色优势、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学科体系,促进学科交叉融合高质量发展。

1. 建立协同创新机制,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管理保障

在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校在政策、制度、资源等方面的引导与支撑作用。通过加强顶层体系设计,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优势学科为核心,引导其他学科相互渗透,打造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多学科交叉协同创新平台和基础支撑平台,整合多学科队伍与平台资源;要尊重不同学科特点,鼓励打破常规和个性发展,推崇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为促进学科交叉深度融合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以重大项目合作为牵引,以资金投入为支撑,建立跨学科、跨部门的人才流动机制、科研协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科研管理模式,设计合理的绩效考核和奖励办法,从而有效调动各方参与学科交叉的积极性,促进多学科对复杂问题的协同攻关。

2. 培养多学科交叉人才,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智力支持

为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人才,要完善学科布局,优化学科体系,支持建设一批特色突出、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学科群体,打破指标化学科门类设定思路,拓展专业课程建设和学科发展空间,瞄准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和行业发展需求,对重点研究方向进行规划,构建顺应时代要求的课程体系和宽泛的多学科知识体

系;建立由多学科背景的教师组成的教学科研团队,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学创新、科研实践与跨国境学术交流,拓宽学生视野;建立多方协同、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校际校企校所联合、优势互补、项目共建、成果共享的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以融合性学科的实验项目为抓手,培养学生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

3. 构建多元评价体系,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科学指引

针对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建立符合交叉学科特点的全面、客观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变重成果的单一评价方式,以创新度、贡献度为导向,建立交叉领域成果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而不是仅从各自学科的标准来评价交叉领域中的成果。强化目标管理和绩效评价,设计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测量性的评价指标,均衡教学、科研、团队协作等指标,明确研究成果的认定机制和协商机制,实施分类考核,实现个人、团队、单位等各方责权利的统一。完善学科交叉的同行评议制度,坚持定量与定性、同行与社会、过程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完善学科建设效益评估。

总之,学科交叉是走新路,发展交叉学科是辟新局,传统的学科壁垒、发展思路、机制体制、路径惯性不仅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更多时候还会成为进步的阻碍。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建立高质量的交叉学科,进而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迫切需要大胆、大量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改革创新是我们促进学科交叉、发展交叉学科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EB/OL]. (2018-08-27) [2020-09-05]. 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7/content_5316809.htm.

[2] [3] 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EB/OL]. (2020-11-03) [2020-11-12].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4] 赵云云. 交叉学科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研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0 (11): 123-125.

[5] 赵文华, 程莹, 陈丽璘, 等. 美国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借鉴 [J]. 中国高等教育, 2007 (1): 61-63.

[6] 沈新尹.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跨学科和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支持及启示 [J]. 中国科学基金, 1997 (1): 68-71.

[7] 李文聪, 徐进, 申洁, 等. 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学科交叉研究资助机制及启示 [J]. 物理化学学报, 2020 (11): 173-178.

[8] 谢冉, 肖建. 英国博士培养中心: 背景、成就及其启示 [J]. 现代教育管理, 2017 (6): 124-128.

[9] 余同普, 银燕, 邵福球. 从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看创新型交叉学科人才培养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3 (6): 64-68.

[10] 杨海燕. 美国高校交叉学科发展的制度保障 [J]. 中国高等教育, 2009 (Z1): 77-78.

[11] MACLACHLAN A J.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flow of graduate education models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 [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4: 210-227.

[12] 韩萌. 英国一流大学博士生培养机制及其启示——基于牛津大学教育学院的经验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8): 96-104.

[13] 魏华飞, 汪章. 高校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共性与启示——基于美英德日的比较 [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0, 39 (10): 8-11.

[14] 毛慧芳. 中美英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培养的比较研究 [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15] 魏丽娜, 张炜, 林成华. 激励学术创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交叉学科教师绩效评估体系及其经验启示 [J]. 高教探索, 2020 (7): 54-60.

[16] 林成华, 徐瑞雪, 王雅莉. 密歇根大学交叉学科教师联合聘任制的经验与启示 [J]. 高校教育管理, 2019, 13 (2): 40-48.

[17] 教育部网站.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EB/OL]. (2009-02-25) [2020-11-12]. http://www.moe.gov.cn/s78/A22/xwb_left/moe_833/tnull_45419.html.

[18] 教育部网站. 学位授予单位 (不含军队单位)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 [EB/OL]. (2020-08-27) [2020-11-11].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22/202008/t20200827_480690.html.

[19] 何自力, 沈亚平. 探索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南开大学经济、管理、法学跨专业人才培养试验 [J]. 中国高教研究, 2006 (9): 55-57.

[20] 文学, 魏朋. 交叉学科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初探——以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为例 [J]. 教育现代化, 2020, 7 (24): 77-80.

[21] 王薇. 医学院“985工程”重点建设的三个科技创新平台之一——Med-X研究院正式成立 [N]. 上海交大报, 2007-11-19 (12).

[22] 罗勤, 梁传杰. 论高校学科交叉的困境与出路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 (4): 189-194.

[23] 王彩霞, 陈金库, 陈昕. 促进高校交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探讨 [J]. 内蒙古电大学刊, 2014 (1): 82-84.

[24] 吴伟, 何秀, 姜天悦, 等. 多学科交叉培养研究生的困境与出路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 (21): 12-17.

(责任编辑 吴 虑)

(下转第 58 页)

面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等学校智慧校园研究

李 武

(天津大学, 天津 300072)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做了重要论述, 提出了六个“下功夫”的明确要求。当前,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运用, 智慧校园的发展十分迅猛, 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恰逢“十四五”规划编制, 高等学校智慧校园规划应充分考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智慧校园建设的需要, 做好谋篇布局。一要充分发挥智慧校园的入口效应, 引领、守护校园意识形态工作; 二要发挥智慧校园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方面的作用; 三要发挥智慧校园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中的作用。

关键词: 高等学校; 智慧校园; 立德树人; 高校治理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52-07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立德树人”确立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做了重要论述, 提出了六个“下功夫”的明确要求, 即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 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 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 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2019年5月1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的贺信中指出,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

力, 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 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 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是教育的重要使命”。^[1]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 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一大批IT技术应用越来越深入, 智慧校园建设如火如荼。智慧校园指的是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化的校园工作、学习和生活一体化环境, 这个一体化环境以各种应用服务系统为载体, 将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活进行充分融合, 在“三全五育”的大背景下, 为高质量人才培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0年年初,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高校

收稿日期: 2020-11-18

作者简介: 李武, 男, 研究员, 天津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1期教育部直属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61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主要从事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创新管理研究。

信息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流调跟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教育系统“网上办公”“数字防控”“停课不停学”等要求也逐步改变了师生的学习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此次大规模在线教学的实施，对推动大家接受新理念、利用新技术有很大的促进，同时也提示我们智慧校园的规划建设要从支撑日常业务工作、提高管理运行效率的阶段转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阶段，引领“互联网+人工智能+教育”改革创新。

智慧校园形态下，学生进入高校后，会面对两个校园，一个是实际存在的物理校园，另一个是与物理校园相对应的数字孪生校园。这个数字孪生校园就是当前教育界正在构建的智慧校园系统。高校智慧校园概念模型将校园划分为物理校园和虚拟校园，虚拟校园通过汇集和研判各种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种技术来支撑整个校园治理，开展智慧化的系列应用，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应用，^[2]从而支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的迅猛发展为一流大学建设孕育了最佳环境。^[3]深入研究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智慧校园规划建设的需求，使智慧校园在未来的运行中更好地支撑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二、研究现状

近年来，智慧校园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成果较多，同时由于相关学科应用性较强，有不少高校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譬如浙江大学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和学术创新服务平台重点关注了一网通办和智慧科研，上海交通大学网上办事大厅和复旦大学网上办事大厅重点关注了一网通办等。

王运武等人认为我国在智慧校园功能的设

计上虽进行了不少研究，但常常偏离了其核心功能。如一味追求通过“酷炫”的新技术来打造智慧校园外在形象，而忽略了这些技术在教育教学、教育管理方面的功能作用；智慧校园对提升教育管理的效果明显优于其支持教与学的效果。^[4]肖苏睿对中国知网2014年1月至2019年5月发表的1910篇智慧校园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了高频的关键词，其中高频词前五名为：智慧校园、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教育信息化，相关性分析表明“物联网”与“智慧校园”的相关度最高。^[5]谢幼如等人认为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统合互联网思维，培育具有新时代特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是我国教育的宏大目标，也是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的落脚点。^[6]关于智慧校园建设，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总体框架设计与基础环境建设两个方面。通过对教育部、省、市三个层次的14份智慧校园建设规范标准进行分析表明，内容中体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建设规范仅有两份，占7.14%，比例非常低。这也从一个角度上说明目前的发展阶段还没有脱离技术驱动的模式。从国外的研究来看，Nasro Min-Allah^[7]、Saleh Alrashed^[8]、Tiago M. Fernández-Caramés^[9]等人认为智能校园是一种新兴的趋势，各种解决方案已在校园层面实施，如智能微电网、智能教室。智能控制建筑物的视觉和热学特性、人脸识别和智能卡等也开始应用，但是一个智慧校园的通用模型尚未建立。大学应该在智慧校园战略目标层面关注和采取一系列不同的举措。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智慧校园相关的研究比较热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智慧校园的系统设计、功能实现、系统集成、技术应用等方面，高校校园网络建设逐步由数字化走向智慧化，^[10]更加强调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更多地体现服务的智能化和管理的人性化。^[11]有的研究者已经关注到我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该成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技术应用导向的，面向立德树人需求导向的成果尚不多见。

三、立德树人对智慧校园系统建设提出的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发挥网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给我们的智慧校园建设规划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应该把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始终做到将厚植爱国的深厚情感、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练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等育人元素和要求嵌入智慧校园的建设中。

美国学者凯文·凯里的《大学的终结:泛在大学与高等教育革命》一书提出面临信息技术革命严峻挑战的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然后描绘了一个平等自由、开放共享、丰富多样、低廉适用的高等教育新模式将随着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融合应运而生。^[12]我国著名教育学者朱永新教授的《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一书也对未来学校的一种形态——学习中心进行了阐释,描绘了没有统一教材,全天候开放,没有周末、寒暑假,没有上学、放学时间,没有学制的学习中心教育形态。^[13]无论未来学校走向何方,无论何时会出现这些学者心目中新的教育形态,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智慧校园形态下将会更加开放共享的、自由平等的学习。基于随时可以接入的网络系统,智慧校园网络平台也就是互联网思维下常说的“入口”将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载体,将对学生的思想养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虽然教育领域的变革不会像一般的市场行

为那么容易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但是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教育培训行业的应用已经呈现出井喷的态势,也正在培养着一代已经适应了通过网络获取知识谋求发展的新新人类。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到来,他们正排队进入大学的校园,成为高等学校的教育对象,我们当前的智慧校园建设规划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发展趋势和未来学生的特质。

中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校校园具有人口密集的社区、服务高层次人才发展、学术交流和高新技术创新创业集聚三个方面的属性,汇聚了全社会知识层次较高、活力较强的人群,智慧校园在校园管理、教学支撑、科研保障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的校园同时是新技术开发、测试、示范和应用的最好场景,对标六个“下功夫”的要求,智慧校园系统要在网络意识形态、思想引领上做足文章。可见,智慧校园系统应该具有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智慧社区(城市)、智慧教育、智慧政务服务四个方面的属性,这也恰恰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智慧校园建设规划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在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方面,要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通过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大数据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网络行为分析等技术手段,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政治观点、心理健康、学业情况、生活需求等进行动态观察和系统分析,从而对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同时,还要围绕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成功实践开发、推送一批精品课程,使校园的网络环境成为让学生时时处处接受正面教育的精神家园。在这方面,一是通过智慧校园建设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一系列的基本工具,包括问卷工具、数据分析工具、通用统计工具等;二是要提供一个多维度展示学生个体和群体画像的算法集,以便更加科学精准地了解每个个体和群体的实际情况;三是要提供一批符合当前学生网络行

为需求的，以短视频、文字、评论等为表现形态的，能引领学生思想发展的网络资源，形成明确、健康的导向。

第二，在智慧社区方面，主要集中在校园各类社区安全保障、门禁管理、水电等用能管理、智慧物流、物业维修、停车管理、校园 GIS 及 BIM 的应用等方面。目前，各类具体应用的技术成熟度较高，关键在于系统整合与集成，以及在高校社区应用场景下的大数据利用。为了更加有效地达到充分整合和集成的目标，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类似城市操作系统的“大学操作系统”，并使其成为大学校园治理和运行的基础性系统软件。通过大学操作系统实现在大学校园中对校园所有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包括对校园基础设施、算力、存储、物联设备、 workflow、课程、人员和基础数据的管理；建立物理校园和数字孪生校园之间的映射关系；建立校园实例的数字标准，形成一系列的通用接口，将这种管理功能分别设置成相应的程序管理模块，每个管理模块分管一定的功能，也为业务层级的各类工作建立一套可以进行二次开发与定制的基础性工具集和接口。

第三，在智慧教育方面，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科技创新的阵地、文化传承的高地，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才和学科优势，在推动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支撑引领作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教育”正在引起一场关于教育的革命。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0 年 10 月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而智慧校园对教育行业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恰恰体现在教师的教法、学生的学法，以及对师生教学效果的评价方面。在教师教法上，需要对现有的课程大纲和知识点进一步梳理，厘清知识点的前后逻辑，形成可数据化的表现形态，再结合相应的案例进行讲解。这样可以使每门课程的体系性更强，更适合用现代信息论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去处理。在学生的学法上，学生学习的状态和例题训练会变得更加精准，学生通过互联网学习的场景会更多。通过互联网学习以及现代的人脸识别、眼动识别等方式可以

更加精准地识别评估学习的状态和效果。从师生教学效果评价方面来看，通过考试、日常答疑等手段，能更加精准地了解评估教学双方的契合程度，更加精细地了解教和学在学生掌握知识这一进程中的效果。从应用来看，一是 MOOC 平台和直播授课要进一步实现更加广泛的应用；二是新一代智慧教室的应用；三是 VR 和 AR 的应用提升了教学的效果；四是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进一步改变教学的方式，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利用智慧教室或者线上平台收集到的数据，更加便捷地对学生进行评估评价，帮助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内容，实现因材施教，也可以替代教师的一些机械式劳动，减轻负担。

第四，智慧政务服务方面，构建数据、报表中心，实现跨部门、跨业务、跨应用的信息共享和集成；依托网上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最大限度实现可定制的“制度流程化、流程表单化、表单信息化”，为跨部门协作、柔性动态审批、数据采集提供基础性工具集，实现随时、随地、随心办公和行政审批，利用既有数据最大限度实现数据核对事项的自动智能审批。这部分需求的关键点在于，传统视角下开发用于支撑行政审批和流程定义的应用系统比较复杂，一般都需要信息化部门的深度参与，通过应用程序代码级的工作和调整后才能进行优化，因此业务系统一旦确定后，再调整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技术依赖性较强。当下，校园的行政管理工作处于改革攻坚的阶段，各种行政审批事项的表单和流程时常会进行调整和优化，上级要求也经常会出现动态调整的情况，而一个大学的行政服务事项往往都有数百项之多，这种调整的工作压力都压给信息化部门，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调整需求频繁出现时，为了提高效率而使用的信息化平台反而在有些时候会成为效率的障碍。因此，一套更加柔性的、无需信息化部门在代码级开展工作，通过简单拖拽就可以自定义的表单和流程定义工具就显得较为必要。同时，当这些行政审批数据信息得到充分的积累后，可以进一步加工，用于对大学行政效能和效率评估等工作。

四、智慧校园系统的规划策略

未来的高校智慧校园将成为日常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中的基础保障,随着一批新技术与教育工作的深度融合、网络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智慧校园中软件系统的运行和迭代创新作用越来越突出,根据需求分析,提出以下工作策略。

1. 充分发挥智慧校园的入口效应

现在网络媒体为了吸引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会针对大学生的兴趣和特点来提供相应的信息,这无疑是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原本固有的喜好,逐渐给其制造了一个信息茧房,容易使个人和群体变得更加极化,疏远了与其他思想碰撞的机会。智慧校园系统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引领力,发挥智慧校园入口和媒体效应,构建课程、案例、短视频等全系列的网上宣传和氛围营造工作,引领师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加强师生理论学习;构建全网上传内容的审核工作机制和审核工作队伍;守住网络安全管理的底线,从安全事件的发生、处置、验证、上报、分析到主动防御,建立完整、统一、可视、系统的安全管理体系;实现全网用户身份统一管理,实现统一身份认证全覆盖,完善账户管理的规定,统一管理全口径师生数据,为全网业务系统提供统一的身份认证服务,实现一人一号、单点登录,一次认证,全网通行。通过多种渠道守护校园意识形态工作阵地。

2. 发挥智慧校园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方面的作用

在智慧社区方面,重点关注整个校园物联体系的构建,包括全校门禁权限(含智能物流柜门禁权限)物联化、视频系统物联化、各类计量表具物联化、道闸等其他权限设备物联化。也就是说,未来接入校园的每一台设备都有其物联化的虚拟账户用来对其进行管理,每一类物联设备都有通用的驱动 API 用来做数据的交换。重点关注校园 GIS 及 BIM 的应用体系,包括校园空间、房产管理和位置引导服务,校内基础的位置信息服务等。重点关注校园各类物

联数据的利用。

在智慧教育方面,着力构建“MOOC-直播-智慧教室”线上线下协同的教学体系,形成优质的教学资源库,推进智能技术深度融合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智慧校园建设本身迭代创新的实际需求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场景,为新工科教育中开展项目式学习、探究性学习等新型学习方式提供场景支撑;对于新工科项目中形成的可产业化成果,为创业团队提供创业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形成“学习-创新-创业-就业”的全链条培养模式。

在智慧政务方面,要面向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转变,重点关注以“一网通办”为牵引的管理服务提升工作,强化学校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职能部门跨部门协同、多级管理模式的扁平化设计,用好既有数据,在流程优化的进程中统筹形成新的数据规范和规范数据。

3. 发挥智慧校园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作用

每一次技术革命对行业发展都可能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智慧校园的发展表明教育领域正处于新技术变革的活跃期,一场教育革命正在到来。在组织变革方面,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校园信息创造、传播、共享的速度,使组织运行效率大幅度提高,这就带动学校的行政运行模式进行变革,进一步从组织架构上进行优化,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压缩学校、学院、系(支部)之间的距离,进行扁平化改造,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不同院系等二级单位之间由于单位人数不同带来的一些同质化工作在工作量上的不均衡问题,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和师生的满意度。在流程优化方面,校园管理、服务工作流程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跨部门的超长、多入口、多出口、多路径的复杂流程越来越多,依赖数据自动审核的流程将成为常态,进一步大大提高运行效率。在人员评价方面,随着人员分类评价以及大数据支持下的人员画像技术的应用,对每一类、每一个人的个性化评价将成为常态。这些评价结果在学生就业、教师发展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学生在校园中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其他类型的课程、履历等也可以以微证书的形式得以认可,

促使学生发展更加多元。在算法方面,要从不同领域和视角构建一系列的算法库。通过智慧校园的升级,在支撑校园运行的同时,倒逼学校行政机构、运行模式的改革。

五、展望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面对党中央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世纪成长起来的被教育者,高等教育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智慧校园的建设发展是未来教育的重要载体,必将对教育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智慧校园的规划建设大多是从教育信息化的视角,用技术驱动和引领。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视角和需求来看,智慧校园的规划建设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创造更加美好的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是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最大变量,需要更多的参与和关注。这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时代之需。

参考文献:

- [1] 新华网.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 [EB/OL]. (2019-05-16) [2020-11-0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5/16/c_1124502111.htm.
- [2] 刘革平. 基于智慧校园平台的高校治理方式变革 [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0, 34 (10): 120-125.
- [3] 锁志海, 董文欣, 毛琦, 等. 西安交大: “十四五”规划围绕新基建 [J]. 中国教育网络, 2020 (6): 39-40.

[4] 杨萍, 姚宇翔, 史贝贝, 等. 智慧校园建设研究综述 [J]. 现代教育技术, 2019, 29 (1): 18-24.

[5] 肖苏睿. 2014—2019: 国内智慧校园研究评述——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J]. 软件导刊 (教育技术), 2019, 18 (11): 81-83.

[6] 谢幼如, 黎佳, 邱艺, 等.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智慧校园建设与研究新发展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9 (5): 63-69.

[7] MIN-ALLAH N, ALRASHED S. Smart campus—a sketch [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0, 59: 102-231.

[8] ALRASHED 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smart campus and microgrid [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0, 60: 102-264.

[9] FERNÁNDEZ-CARAMÉS T M, FRAGA-LAMAS P. Towards next generation teaching, learning, and context-aware ap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a review on blockchain, IoT, fog and edge computing enabled smart campuses and universities [J]. Applied sciences, 2019, 9 (21): 44-79.

[10] 黄成兵.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智慧校园建设应用探讨 [J]. 智能计算机与应用, 2017, 7 (1): 131-133.

[11] 吕金梅. 大数据时代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实践研究 [J]. 高教学刊, 2020 (32): 153-156.

[12] 凯里. 大学的终结: 泛在大学与高等教育革命 [M]. 朱志勇, 韩倩, 等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13] 朱永新. 未来学校: 重新定义教育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责任编辑 吴潇剑)

Research on the Intelligent Campu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Li Wu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made an important exposition concerning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tasks of education and has put forward six clear requirements for “hard work”. At presen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campus is very rapid, which has an increas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inciding with the formulation of the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planning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ful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mart campus and create a strong layout accordingly. Firstly,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ntrance effect of smart campus to lead and protect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campus; secondly,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mart campus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irdly,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mart campus i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planning of smart campus in the next step.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mart campus; Moral educati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上接第 51 页)

Acceleration of the Promo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Liu Sannyvya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t present,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emerging,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presents a new trend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has greatly promoted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leading direction of today’s society and an important wa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is also a new growth point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made a forward-looking layout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and relevant universities have also made beneficial attempts. Howeve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We must take reform and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start with a new height and new system to “seek breakthrough”, vigorously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o “build a peak”, speed up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promote the deep-seated reform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o “open up a new way”, and provide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for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fracture.

Key words: Interdisciplinary; Crossing disciplin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werful nation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quality education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 高校院系党组织的制度体系与能力建设

方明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摘要: 在新发展阶段, 高校党建引领大学治理现代化、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政治要求和历史任务。院系党组织应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以制度建设为枢纽, 把党的政治优势和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转化为大学内部治理情境中的制度优势, 完善院系党组织的领导制度和治理体系; 以制度执行力为主线, 全方位提升基层组织力和治理能力, 把社会主义大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院系事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校党建; 院系治理; 制度建设; 组织力; 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59-09

学
员
论
坛

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以来, 高校党的领导和党建工作全面加强, 翻开了以政治建设为核心、以制度建设为重心的新篇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高校系统谋划推动治理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党建引领高校治理已经成为共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做出了应对变局、开辟新局的顶层设计, 高校必须勇挑立德树人、服务国家地方、释放创新潜力、深化治理改革的历史重担, 党建推动发展的需求和动力空前强烈。在新发展阶段, 高校党建引领大学治理现代化、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成为政治要求和历史任务。

院系党组织是高校党组织体系的“中场线”, 承上启下、统领一方, 联动条线、支撑全校。院系党的建设是高校党建狠抓落实、提高质量的基础, 是激发活力、彰显特色的中坚。

新发展阶段, 充分发挥院系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是加快推进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抓手和坚实依靠。一是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大学治理具体情境中的制度优势, 引领保证院系治理改革; 二是把实践着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层治理效能, 引领推动院系事业发展、争取竞争优势。通过这两步转化, 实现党的建设、依法治理和发展改革三个方面同向同行、协调高效, 确保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深入基层、落在实处、见到实效。

一、院系是高校党建引领治理和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之一

院系泛指高校管理体制中的二级机构, 在现实语境中, 通常指大学内部二级学术实体单

收稿日期: 2020-11-18

作者简介: 方明, 男, 副教授, 复旦大学党委政策研究与改革办公室,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1期教育部直属系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暨第61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主要从事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位,包括与学院平级的学部、系、研究院、所、中心、实验室等各类二级单位,不涉及这些学术单位下设的系、所、中心,也不涉及虚体组织和直属或附属的独立法人单位。在二级实体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设立的党委或党总支(个别因党员人数较少,只设立直属支部),被称作院(系)级单位党组织或院(系)党委(党总支)^①,一般简称“院系党组织”。

高校本质上是学术性组织,主体始终是师生、学科,“底部沉重”是其组织特性,^[1]以人为本、思想活跃是其文化特性。院系始终处于伯顿·克拉克形容的“学术心脏地带”,^[2]是大学管理的主体。有学者认为,二级院系承载了高校近80%的行政决策。^[3]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跨过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高校院系的体量规模普遍扩大,办学、治学、教学活动和内部关系日趋复杂,经济往来和社会联系快速增加。每个院系的治理都面临共性与个性问题交织的复杂场景。在这样的复杂场景中,学校和院系不再只是简单的上下级科层关系,大学治理现代化必须调动学校和院系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学校统筹有力度、院系发展有空间;同时,要坚持集中领导与多元治理相统一、制度管理与文化引领相统一、院系活力与学校统筹相统一、个体创造与团队协作相统一;^[4]更为关键的是,治理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5]在中国高校的院系治理中,党组织发挥了这样的政治核心功能。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关键在党。党的全面领导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优势,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和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高党建工作质量,全面加强思想引领、制度建设、组织协调、生态净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提升、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6]当前,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内部治理改革向纵深推进,“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高校将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系统考验,院系党组织建设也越来越凸显出重要性和紧迫性。

1. 院系基层已成为当前落实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工作重心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高校党建。自1990年4月首次召开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召开一次,研究新问题、落实新要求、部署新举措。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加强高校党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重要部署,为抓好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根据中央要求,先后专门召开中管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属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高校党建存在的现实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高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扬“钉钉子精神”、推进高校党的政治建设,建立完善高校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保高校和谐稳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7]在制度建设层面,一方面强化属地管理,明确地方党委的领导责任和主管部委抓部属高校党建的责任,强调地方党委、主管部委协同配合,把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强化高校党委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落实党员校长任党委副书记,抓细党的政治建设具体措施,出台普通高校常委会会议、校长办公会议、全委会会议议事规则示范文本,指导各高校修订完善议事决策制度、健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不断提升高校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能力。

同时,中央清醒认识到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较突出问题。“上热中温下冷”、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虚化、党建业务“两张皮”、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等现象都与院系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不过硬、制度建设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密切相关。政治核心作用不强、教师党支部相对软弱涣散、青年教师入党积极性不高、基层党建工作力量能力不强等问题成为难点和短板。近年来,《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务》都把加强院系党建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着力推进制度建设和长效举措，在院系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党政领导班子交叉任职、教职工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等方面成效显著。2019年年底，全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比例达82%。^[8]当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的指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重心不断下沉、举措不断深化，院系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要求越来越细致，抓基本、攻难点、补短板、促规范的工作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2. 院系党建要成为高校治理加快内生性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现代大学由于规模扩张、结构复杂、功能多元，治理形态越来越多元，政治治理模式、学术治理模式、科层治理模式、企业化治理模式耦合，^[9]多元利益相关方共处，自治、管治、共治的行为和诉求缠绕，^[10]成为治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热点领域。现代大学是文明的渊藪、创新的源泉，因此大学治理必须扎根民族文化和历史环境，同时也不能脱离时代角色和办学使命。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先后出现学校主动向院系放权、行政权力向学术权力让渡、自上而下实施制度建构等几次内部治理热潮，校院两级管理改革热度长期不减，但改革的时度、效均有不足，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制度成果不多、改革成效不显著，^[11]甚至受到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导致对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也有所干扰。总结经验教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重视落实不够、党推进系统重大改革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是关键原因，这导致了从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步履蹒跚。

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现代化是对社会、组织形态和事物状态赶超先进水平，进而迈入“自由王国”变迁进程的描述。大学治理现代化是大学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变迁进程。本质上，这是一种内生性现代化，内生于本土社会政治条件和民族文化环境，而不是在国外思潮或治理模式的外在干预下，不顾国情模仿，以期实现本国高校治理的现代化。^[12]内生性现代化为“扎根中国

大地办大学”提供了一种学理逻辑。坚持党的领导是走出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之路的历史必然选择和客观必要条件。

在新发展阶段，深化校院两级管理和院系治理模式改革，必须坚持内生性现代化原则，坚持把党的领导和党建工作放在核心位置。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本身是院系治理体系的核心原则、基本要素，院系党组织在院系治理中必须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工作导向。二是院系党组织在高校党的组织体系中处于中场位置，既有确保党的领导从中央到基层一线贯通的政治责任，也有协调学校与院系、机关与院系和院内各种关系的政治能力，^[13]还有保证教学科研管理各项任务完成的政治要求，是承接学校改革任务、解决院系治理现实问题的关键因素。三是院系党员干部和党务工作队伍是院系治理的骨干力量，院系党组织的工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院系治理水平，基层党建质量决定了院系治理效能。四是发挥院系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以人为本、紧密联系群众，充分激发院系内部推动管理改革、提高治理效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 院系党组织要为高校服务支撑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保证

迈入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必须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支撑引领作用，适应普及化阶段的质量提升要求，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主动迎接科技革命和教学模式深刻变化，沉着应对国内外环境格局变化和风险挑战。^[14]新阶段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客观进程，也是一个以服务求发展、以贡献促发展、以斗争保发展的过程。院系将处在高校立德树人、扎根办学、服务社会、防控风险、治理改革的第一线，院系党组织统筹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治理任务更加复杂，把大局、促改革、聚人心、保落实的领导责任更加重大。用好为国奋斗的旗帜和题材，党建和业务工作将在更高水平上相辅相成、协调统一，整合大党建、构建大思政格局将获得强大动力。院系党建要为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国家区域发

展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办学实力和提高治理能力,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组织保证和纪律保证。新阶段新征程也将成为提高党建质量和思政工作针对性、有效性的大课堂、大舞台。

在以党建促治理、保发展的过程中,院系党组织既要提高“硬改革”水平,积极稳妥推进组织、机构、结构、制度等方面的治理改革;也要提高“软治理”能力,^[15]在高校基层治理中更加凸显对“人”的因素的关注。既要强化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实效性,注重前瞻性、操作性、坚韧性,促进改革目标与发展目标相统一、改革任务与内涵发展相结合、改革成果与制度建设相衔接,解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推动事业发展;也要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人民至上”的理念落在实处,更加注重发挥非正式组织、组织文化在治理中的正向作用,在治理实践中更加重视师生群众对改革的支撑力和承受力、对治理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对施策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二、组织体系与治理体系:以制度建设为枢纽,把政治功能转化为制度优势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我们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在2018年7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要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16]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基层组织是执政大厦的基石。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战斗堡垒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上。只有基层党组织增强组织力、发挥好政治功能,执政根基才能巩固。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在高校治理中,党的组织体系与治理体系、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与院系治理能力的链接点,

是制度的建设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7]有“制”才有“治”,国家治理体系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两者相辅相成。^[18]高校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聚焦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力这两条主线。在院系治理中,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发挥好政治核心与战斗堡垒作用,就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安排,把党的领导嵌入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在治理实践中彰显制度优势。发挥政治功能,是院系党组织的主要治理方式。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再到十九大突出政治功能,反映出基层党建工作重心的变化和时代新要求。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为加强院系党的领导,发挥院系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学者细化为“五位一体”,即“以把关定向为重点的领导核心功能,以全面过硬为导向的组织建设功能,以立德树人为重点的宣传教育功能,以师生发展为重点的服务保障功能,以服务大局为重点的团结凝聚功能”。^[19]

近年来,中央围绕高校党的政治建设,修订研制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和重要文件,特别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下简称《条例》)和2020年10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院(系)党委会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示范文本》(下简称《示范文本》),为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党建思政工作、完善院系治理规则提供了法规依据、制度样板。《条例》是党内重要的组织法规。这次修订是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的部署,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的重要举措,也是自1996年颁布和2010年修订以来的第二次修订。这次修订全面对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党章》,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具体化,把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建设的要求在高校治理中法制化,把十

年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治理经验体系化,把全国高校党建实践的有效经验制度化。《示范文本》从议事规则入手,着力解决院系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问题,以强化院系党组织政治功能为重点,突出党委会的政治核心作用,对院系“集体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工作机制做出具体化、场景化的规定,为完善院系治理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供给。面向“十四五”,结合《条例》和《示范文本》的落实,应着重加强院系党组织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1. 领导一方、属地管理的制度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部属高校党建工作责任的通知》,对全面落实部属高校党建工作责任制作出明确规定,强化了地方党委的领导责任和属地管理原则,突出了高校党委的主体责任。按照这一模式,高校内部也采取“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层层压实党建工作责任。《条例》突出了院系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政治责任。一是坚持把关定向,为本单位的事业发展提供政治保证,把好教师引进、课程建设、教材选用、学术活动等重要工作的政治关。二是加强党建思政,落实本单位的党建工作主体责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三是强化属地原则,对党员、干部、人才的教育管理和联系服务等条块结合的工作切实担负起“块”的责任。

进入新发展阶段,高校出于推动科研融合创新和服务地方的需要,设立跨学科研究平台和异地办学的情况较为普遍。对于这些情况,应坚持全覆盖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建立相应的二级党组织或明确挂靠二级党委。对于跨省区市异地举办的分校、校区、研究院、研究生院,抓党建工作的责任原则上以所在地方党委为主,主管部委加强督促指导,高校党委主动履行党建工作具体职责。对办学规模较大、党员人数较多的,经高校党委和地方党委协商,可隶属所在市级以上地方党委。

2. 三线联动、一线贯通的制度

在高校党的组织体系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心线”,院系党的领导是“中场线”,党支部建设是“生命线”。高校党组织以

“三线联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一线贯通”,体现组织体系的组织力、战斗力。院系党组织是起承转合、上传下达的中场枢纽。既要强调纪律性、执行力,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学校各项决定,并为其贯彻落实发挥保证监督作用;也要强调主动性、创造力,结合基层实际、发挥主体作用,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学校工作部署,推动落地见效。鉴于此,《条例》特别吸纳实践经验,要求建立师生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等联动制度,具体指导党支部开展工作。“三线联动”作为一套工作机制和方法,能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应科学运用到办学治校各领域、立德树人各环节,转化为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大学办学治校的制度优势。

3. 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高校院系领导体制经历了反复探索。1989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提出,高校较大的系要配备专职党总支书记。1990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出台,明确院系党总支是政治核心,参与配合行政工作、发挥监督作用。1996年《条例》出台,明确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明确院系的决策机制是党政联席会或院系务会议,确立了党政共同负责的制度。《条例》2010年修订版正式确定党政联席会议为院系决策机制,事实上终结了学术主导的各类院长负责制。此后,有研究者提出党组织领导下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建议,以加强党对院系的全面领导。考虑到院系治理以学术为主要内容,二级单位更强调决策效率和执行能力等因素,《条例》在二次修订中继续把党政联席会议作为行政决策机制并强化了抓落实职能,同时明确了党组织会议的党务决策事项和政治把关职能,并通过《示范文本》对党政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作了统筹周密的制度安排。

一是明确和强调院系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操作原则。总体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重大事项由党委或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

论决定,支持行政领导班子和负责人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条例》还规定,院系党政班子成员一般应实行交叉任职,强化了党政分工合作的制度保障。二是明确院系党委会会议、党政联席会议议事决策范围。要保证党政联席会议对院系重要事项的决定权,但也不能用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党委会会议。党委会会议讨论决定本单位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人才的政治引领政治吸纳和教育管理服务、师生思想政治工作、教风学风和师德师风、宣传统战群团、安全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事项;涉及办学方向、教师队伍建设、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党委会会议对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先行把关,再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事关院系发展改革稳定、教师队伍建设、学生培养、学科科研、国内外交流合作、学术治理、表彰奖励等方面的重要事项;党委会会议形成决议或决定的事项,可提交党政联席会议成员共同研究落实。三是明确议事决策原则和程序,对会前酝酿、前置研究机制做了详细规定。比如,对于党委会会议的重要议题,书记应会前听取院长意见,意见不一致的暂缓上会。集体决定重大事项前,书记、院长和相关党委委员要个别酝酿、充分沟通。涉及教职工的重要人事议题,应征求党支部意见;涉及干部工作议题,应充分听取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又如,对党政联席会议涉及教学科研、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事项,应充分听取学术组织的意见;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应通过党支部、教代会或其他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4. 统筹兼顾、联系群众的制度

在高校院系治理中,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利并存。社会主义大学办学治校,强化党的领导,与其他主体行使权力(利)、协调权益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20]党组织必须首先发挥好政治核心作用,一方面通过党委会会议、党政联席会议履职尽责,支持行政领导班子行使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加强对各利益相关方的统筹兼顾。《条例》特别强调了党委会对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

事项必须事先研究再提交决策,并明确院系党组织要领导好本单位的群众组织、学术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有针对性地做好新发展阶段的统一战线工作。教授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分委员会等各类学术组织,按照体现社会主义大学性质和要求的制度设计,行使好学术权力。师生通过工会妇委会、团组织等群体组织和教代会、学研代会行使好民主权利。同时,党政班子决策管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和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贴近一线优势,重大决策前后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听取师生意见。应该说,这四种权力(利)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发展目标,在现行制度设计中,能够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理、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有机统一。

三、组织力与治理能力:以制度执行力为主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党建的重点是提升组织力。一部党史就是一部把党员、群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的历史,一部重视组织、善于运用组织力量的历史,这是我们党成功的基本经验。^[21]强大的基层组织力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对党执政兴国有重要影响。^[22]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为提升基层组织力明确了具体目标。

组织力是组织生命力的具体体现,也是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组织力与治理能力、治理效能密不可分。^[23]从基层视角看,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的强弱关键在于执行力。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体系,制度的关键在于执行,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制度执行力。以增强制度执行力为主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学在制度执行方面的优势,以组织力的提升带动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治理效能的提升和治理目标的实现,进而又可以巩固制度建设成果,进一步扩大制度优势,实现党建引领治理现代化的良性循环。对标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综合高校当前的改革要求、发展形势和制度条件，院系党组织提升组织力，增强院系治理能力，应重点考虑以下六个方面。

1. 政治领导力

院系基层组织是政治组织，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一要强化理论武装，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强化把关定向，保证正确办学方向在本单位贯彻执行。三要强化政治动员，用信仰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凝聚起报国强国的磅礴力量。增强政治领导能力的关键是党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院系党政班子是事业发展的领头人，也是政治建设的带头人，精气神和素质能力直接关系到治理水平。上级党组织要突出政治标准，选好配强院系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院系党组织也要自我严格要求，建设“讲政治守纪律、善学习能团结、有格局行务实、扬正气敢担当、懂学术明育人、想做事会做事、有公信力有感召力”的班子团队。^[24]还要从选拔任用、管理评价、教育关心等各环节入手，下功夫建设事业心责任感强、顾大局能奉献、综合素质高的党务和管理干部队伍。

2. 思想凝聚力

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内外“时与势”的变化、“危与机”的转化、“竞与合”的衍化有深刻洞察。应变局、开新局、稳大局，高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支撑，师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坚定信仰信念、激发信心斗志。一要根据上级要求，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构建立体有效的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体系。二要构建有院本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挖掘学术资源、发挥学科特色，把“四史”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与科研报国、科研育人紧密结合起来，增强感召力、精准度。三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有效防范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的煽动、滋扰、渗透、倒灌。四要深入师生员工思想实际，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推动思政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3. 组织覆盖力

科学合理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是提高基层组织力和党建质量的前提基础，也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经验。^[25]院系党组织应迎难而上，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一要创新组织覆盖，可依托重大项目组、课题组、科研平台或学生公寓等设置师生党支部，注重在本专科低年级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确保每一名党员都被纳入有效管理，每一名积极分子都得到组织培养。二要激发支部活力，抓实“双带头人”培育，选优配强用好师生党支部书记。三要抓好党员发展，加强在高层次人才、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四要扩大有效覆盖，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做好毕业生党员、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组织关系和党籍管理工作。五要善用科技手段，提高党员日常管理效率、精准服务供给能力。

4. 发展推动力

高校要把落实“四为服务”作为办学最大的实际，把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作为最大的政治。院系党组织要把治理与发展两件大事同时抓好，把党的组织资源转化为协调发展的资源，组织优势转化为共享发展的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创新发展的活力。一要围绕中心抓党建，基层党组织围绕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开展工作，把党建工作与学科建设、教学创新、人才工作、服务社会有机融合^[26]。二要砥砺奋斗抓党建，激励党员干部自觉增强斗争本领，尽责尽力、善作善成，引领师生发扬斗争精神，投身创新、服务和奉献的时代洪流，坚定攻坚克难、自立自强的魄力定力。三要创先争优抓党建，教师党支部书记积极参与学术治理，发挥党员在完成教学科研管理任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四要防范风险抓党建，强化底线思维、提高驾驭风险的本领，完善风险内控机制、确保安全稳定。

5. 群众服务力

基层党组织是落实人民至上执政理念、保持党同群众血肉联系的组织依靠。院系党组织要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精准把握师生实际需求，深入细致地做好新发展阶段

的群众工作、知识分子工作。一是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有效引导党员自觉践行党的宗旨，提升服务本领。二是切实深化民主管理，落实师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支持群众组织、学术组织依法依规开展工作。三是不断提升服务实效，在为师生解决实际问题中凝聚民心、集中民智、传递民意，维护党员和师生员工的正当权力和利益。四是健全党内关怀机制，加强政治关怀、思想关怀、生活关怀。^[7]院系党组织还要把握好党管人才原则，保证人才战略在本单位落实，在人才规划、人才引育、政治把关、政治引领、政治吸纳、人才安全等方面担负起主体责任，围绕“人才链”延长“服务链”，健全联系服务专家工作制度。

6. 自我革新力

院系党组织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改革创新的精神、不讳家丑的勇气，着力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党支部和党员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一要严肃党内生活，指导党支部提高“三会一课”质量，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好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健全落实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主题党日等制度，确保党的组织生活经常、认真、严肃。二要强化党内教育，特别是针对青年师生，开展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党的宗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三要压实“一岗双责”，建设有规矩的“大家庭”，以铁的纪律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持续反对“四风”。四要落实工作责任，在加大基层基础保障力度的同时，也认真开展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确保党的任务实到支部、责到个人。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称“高校院（系）级单位党组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称“院（系）党委（党总支）”。

参考文献：

- [1] 潘小明. 大学的组织特性与教师教学发展 [J]. 教育探索, 2014 (2): 10-14.
- [2] 付八军. 激活学术心脏地带: 创业型大学学科建设图景分析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4 (7): 14-17.
- [3] GMELCH W H, WOLVERTON M, SARROS J C. Stress in academic leadership: U.S. and Australian department chairs/heads [J].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1999, 22 (2): 165-185.
- [4] 邱水平.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的若干重要问题探析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0 (1): 120-133, 191-192.
- [5] 克拉克. 建立创业型大学: 组织上转型的途径 [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169.
- [6] 方守恩. 以一流党建引领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 (9): 77-81.
- [7] 中共北京市委. 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部属高校党的政治建设 [J]. 党建研究, 2019 (11): 54-55.
- [8] 中国教育新闻网. 教育部: 全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比例达 82% [EB/OL]. (2020-12-03) [2020-12-08].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012/t20201203_378919.html.
- [9] 李立国. 大学发展逻辑、组织形态与治理模式的变迁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 (6): 24-31.
- [10] 柳翔浩. 转换与融合: 大学治理模式的历史社会学分析 [J]. 教育研究, 2016 (7): 83-90.
- [11] 肖红缨. 研究型大学院系治理模式——以清华大学为例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62-72.
- [12] 李福华. 论党的领导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内生性现代化 [J]. 山东高等教育, 2018 (6): 1-6.
- [13] 汤建. 我国大学院系治理现代化: 学理认识、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J]. 高校教育管理, 2019 (3): 44-50.

[14] 云上高博会. 杜玉波: 面向未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思考 [EB/OL]. (2020-09-14) [2020-11-12]. https://heec.cahe.edu.cn/news/dongtai/202009/t20200914_2011697.shtml.

[15] 陈相明, 陈金圣. 国外大学治理研究述评 [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2): 146-150.

[16] 习近平.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J]. 求是, 2020 (15): 3-6.

[17]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J]. 求是, 2014 (1): 3-6.

[18] 桑学成. 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N]. 新华日报, 2020-09-29 (15).

[19] 程静. 高校院 (系) 党组织强化政治功能研究 [J]. 思想政治课研究, 2019 (6): 126-130, 34.

[20] 杨长亮. 新时代加强高校院系党建工作的路径探析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 (1): 68-72.

[21] 祝灵君.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 [N]. 光明日报, 2018-03-27 (5).

[22] 李小新.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N]. 光明日报, 2017-11-27 (2).

[23] 黄翔峰. 组织力视阈下高校院系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调研与思考 [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20 (6): 55-58.

[24] 胡华忠. 新时代提升高校院系党建质量的多维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 (6): 71-75.

[25] 齐卫平, 金江峰.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密度与功能密度——兼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评估体系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6): 23-28, 174.

[26] 刘季平. 党建与学科建设相结合推进高校教育发展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9 (6): 36-40, 108.

[27] 赵楠. 高校二级学院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与完善服务功能研究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6 (10): 74-77.

(责任编辑 吴 虑)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ang Ming

Abstract: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t is a political requirement and a historical task for university Party building to lead the moderniz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and department Party organization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olitical core role, take system construction as the hub, transform the Party's political advantages and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to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the context of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systems of college and department Party organizations. Take the system execution as the main line,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ransform the system advantages of socialist universities in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with high-quality Party building.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ulty 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高校美育的逻辑起点、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

王 萌

(山东大学,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2020年10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对学校美育包括高等学校的美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指明了改革路径。高校美育在意识形态属性和审美独立性统一、高深知识性和审美情感性统一、学理研究性和实践探索性统一、理念先进性和现实补偿性统一的逻辑预设前提之下, 面临着高校固有的课程模式和国家顶层设计不匹配、美育评价指标构建和专业师资缺乏等问题。只有针对这些主要问题进行突破, 高校美育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关键词: 高校美育; 现实困境; 课程体系; 评价机制; 专业师资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68-08

美育, 简而言之, 就是审美教育。古今中外, 艺术教育为将人类由粗俗野蛮的生存层面上升到完整高尚的理想境界提供了一条“美”的途径。孔子一直强调“礼乐文化”, 制礼作乐在历朝历代对一个国家来讲都是关系到天地化育、国计民生的大事; 周王朝教化子民的重要教育内容“六艺”包含了文学与艺术。与之对应, 早在古希腊时期, 西方社会就面向自由民群体展开了史诗、雕塑、悲喜剧等形式多样的审美教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的教育思想里面, 艺术教育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用美的教育引导人们养成自由而高尚的情操这个目标上, 可谓是“东方有圣人出焉, 西方有圣人出焉, 此心同, 此理同”^[1]。但是, 就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源起和具体理念而言, 它首先是西方的舶来品。18世纪, 现代教育中的“美育”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德国哲学家席勒的《美育

书简》中。20世纪初, 美育作为中国现代教育中一项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的现代性设计工程, 被一些先行的教育家如蔡元培、丰子恺、王国维等倾力推出, 并从学理上接受了他们中国化、传统化的改造、转化与创新。

尽管有这么多的教育大家积极地鼓与呼, 但因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环境, 这些教育理念和美育思想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展开, 所以20世纪前半叶只能算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倡导和探索时期。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教育方针的不断深入, 到了20世纪80年代,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育工作才真正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相较于近现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施行通识教育(美育是通识教育中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多年的历史传统和学理研究来讲, 我国的美育研究和教育工作起步相对较晚, 在教学实践中也一直存在重德育智育、

收稿日期: 2020-10-21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思政专项课题“‘明德双师’模式对于提升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研究”(19CSZJ03)

作者简介: 王萌, 男, 副教授, 山东大学文学院, 主要从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轻体育美育的现象,尤其是美育,在学校教育中基本处于辅助德育和智育的从属地位。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政府的支持、学界的倡导,再加上教育界的积极参与,中国当代美育在学校和社会的推广不管是力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之前任何一个阶段不可比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针对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及人文素养等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成了我国第一个专项指导美育工作的政策文件。^[2]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和一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美育工作在全面育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3]2019年3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专门对高等学校的美育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顶层设计。^[4]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学校美育系统性、一体化、一贯式的全方位改革方案,其中高等学校的美育承担着“培养具有崇高审美追求、高尚人格修养的高素质人才”的使命和责任。^[5]高校美育在国家美育工程中作为家庭美育和社会美育的标杆形象,及其承担的中华美育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已经不言自明了。

一、高校美育的逻辑起点

高校美育,是高等教育和美育工作的交叉领域。从教育对象、教育方式和培养目标等方面来讲,它与小学、中学或社会上的成人教育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要完成高等教育体系中美育工作的规律研究和理念论证,首先得从国家和民众角度来与时俱进地研究时代赋予高校美育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即在中国当代语境中,高校美育的逻辑预设前提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它的逻辑起点最少包含以下四层意思。

1. 意识形态属性和审美独立性的统一

在2018年9月举行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新阐明了当前我国教育的理念和

方针,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实际上,作为现代文明产物的“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1947年调查发布的《美国民主社会中的高等教育》中,普通教育被赋予了“给予学生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正确完满生活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态度、知识和技能”的希冀。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的大学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相反,各个国家都把大学当作传播、弘扬自己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主阵地,其重要任务就是使自己国家的精英分子、未来领袖拥有符合国家发展方向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相应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之下,高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针,着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把立德树人作为自身的根本任务,而美育工作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根本任务。

事实上,美育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到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了掌握世界的方式,包括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四种。^[7]从艺术的角度,也就是从审美的角度来掌握世界,人类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即通过形象来观察和反映世界。美育的过程就是通过提升学生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进而使其能够理解美、欣赏美、感悟美并创造美。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美育是不同于德育、智育、体育、劳育的独立性存在。高校美育的基本属性是由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美的本质共同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于美的理解不断深入,高校美育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席勒在创造“美育”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将美育与其他教育并列,认为它具有完善人格、调节情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王国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审美无利害说”^[8]。蔡元培更进一步提出“美育”是和“德育”“智育”并举的教育手段,“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9],甚至提倡用“美育代替宗

教”。从哲学目标来说，德育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寻求伦理的“善”，智育的目标是追求事物之“真”，美育的理想是发现生命之“美”。^[10] 美育是通过审美鉴赏、艺术熏陶、技能训练等手段，借助艺术的自由思维性、情感愉悦性、形象创造性和熏陶渗透性等，通过美化人们的心灵，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体育和劳育则是人类为了种族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生存技能与生活技巧的训练。无论是从目的还是功能的角度来看，这五种教育方式之间都存在着鲜明的区分。因此，我们要强调意识形态属性和审美独立性的统一。任何将美育从属于德育、智育而忽视美育独特教育规律的做法都不能称为真正的高校美育。

2. 高深知识性和审美情感性的统一

高校是传授高深知识、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阵地。从科学的教育、知识的学习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到审美水平的提高和美好情操的形成，这些教育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认知”，是将看到的世界、事件等进行理性的分析，然后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面，从而得出对现象本质的认识。审美个体的认知能力是跟其知识水平、社会经验、人生阅历等紧密相关的。从整个人类艺术发展史来讲，科学的发展对人们的审美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当我们打开一部艺术史，就足以发现，具有伟大的理智、深邃的感情之天才，才能创造真正不朽的杰作。像达·芬奇，不正是一个兼长科学的大艺术家吗？”^[11] 这说明了一个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科学的认知方式和艺术直觉的培养并不矛盾。认知能力的发展能够很好地改变个体原有的艺术感知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从科学、理性的视角用自觉的逻辑思维来寻找艺术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极大地提高个体的审美能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美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我们要欣赏事物的美，就必须有能够感知美的心灵，而要使这种感知能力具有高度的理性和主动性，就必须经过理论的学习和知识的陶养。因为艺术作品的诞生绝对不是“直觉主义”所强调的具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性，而

是基于客观现实和创作者经验的有意识、有规律的创造。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主体认识客观现实的能力越强，其对于艺术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中所蕴含审美要素的领悟水平也就越高。同时，系统了解、学习审美历史和审美知识技巧等，不仅有助于审美主体进行有效的艺术鉴赏，也有利于其与创作者的生命和人格产生共鸣、共振，从而进入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

3. 学理研究性和实践探索性的统一

当下，尽管国家正在系统性地推进社会美育、家庭美育和学校美育的协同育人工程，但从学理研究的角度来讲，高校一直都是美学、美育研究的中心和高地。从研究队伍来讲，高校中有研究美学方面的学者，有教育学领域的学者，还有专门的艺术教师等。他们是美育理论研究的主体力量，同时也用论文、专著、政策建议等方式来影响国家教育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的学者们在美育这个新兴的学科中潜心研究，创造了中国美育的繁荣局面。从对美育的深刻认识而言，由王国维、蔡元培等先辈提出“情感教育说”开始，经过了生命教育说、人道主义说等不同流派理论的争鸣和探讨，再到后来素质教育兴起后“美育发展理论”和“大美育系统”等概念的提出和深化，我国教育界对美育本质和作用的把握与理解日渐提升。从理论研究的视角而言，教育研究者从原初的哲学、美学和教育学理论，逐渐扩展到心理学、人本主义哲学，乃至生态学、生理学，极大地丰富了美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使美育研究迎来了一个飞跃进步的时期。更可喜的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开始更多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生性的美育资源，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美育”系统。这些学理上的超越和突破，都为美育教学、美育实践、各类审美活动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学理基础。

高校就是将这样的学理研究和实践探索紧密结合起来的最佳场所。首先，高校的大学生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扎实的理论基础、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较强的学习能力，善于接受新事物、新理论，并能在生活中加以创造性地

运用。因此，从教育对象的层面来讲，他们是最佳的理论学习者和最好的教育实践者。其次，从课程体系来讲，高校的培养模式、教学计划完整而科学，美育课程可以通过美学理论课、公共艺术课、通识核心课等不同形式将理论和技能传授给大学生。最后，高校还可以通过第二课堂的延伸教育功能践行美育理论。如高校的社团活动、各类比赛等能够营造美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的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场馆和设施建设，可以增强学生对于美育的体验感和实效性；学生的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等活动可以更好地验证美育促进德育的功能性，等等。因此，高校美育中的学理研究和实践探索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

4. 理念先进性和现实补偿性的统一

从中国美育的发展史来看，高等学校中的美育研究和教学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理论先行，实践滞后，甚至可以说现实实践和教育普及程度远远落后于学术研究水平和理论更新速度。蔡元培等人的美育思想因为战乱频仍未能充分实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美育才在国家层面开始受到重视。但是，教育界对于美育的重要作用 and 独立地位一直存在争议和讨论，在教育教学中也长期存在重智育、轻美育以及美育从属于德育的不合理现象。当然，从本质上来讲，这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以及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的不均衡发展状况决定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助力下，各个教育阶段的美育工作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相较于德育、智育等其他方面的教育，美育工作的现代化建设、体系化完善仍然缺少统一规划，是各级教育链条中比较薄弱的一环。

从高校招生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招收的本科学生之中，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生源来自广大乡镇、农村区域或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师资力量、教育资源本身就比较缺乏，投入到学生审美教育层面的更为稀少。由于我国应试教育的现状和高考指挥棒的原因，进入大学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艺术教育缺失的状

况，艺术常识和艺术素养较为缺乏。因此，在理念先进和教育对象基础薄弱的落差下，高校美育在研究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具有弥纶之前教育实践不完善、不平衡的补偿性意义。

二、高校美育的现实困境

1. 国家顶层设计和学校课程惯性模式之间的矛盾

自1951年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以来，美育始终被明确列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教育相关部门更是要求各级文化教育部门把艺术教育放到应有的位置。1999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强调，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2015年以来，国家先后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美育不可谓不重视，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对高校的美育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和重点突破，凸显了高校在落实国家美育政策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和战略攻坚意义。

从实施效果来看，高校美育工作的普及和发展进程并不尽如人意。这一点与高校一贯奉行的工作理念和惯性思维相关。目前，整个高校的各级评估体系中，对美育教育实施效果的评估没有明确的数据要求和规范的质量标准，缺少量化的审美素质要求。高校的社会影响、人才引进、资金拨付、资源配备等都与各类评估指标密切相关，而美育工作的影响因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高校的培养计划和发展方案中对美育工作的一贯性忽视就在情理之中了。据调查，目前全国各省高等学校的美育课程（非艺术专业）有着相似的结构和形式。课程的开发和展开，无外乎美学理论、艺术鉴赏和课外实践三个部分或层级。而在课程性质上，高校往往采用必修课搭配选修课的形式，为以本

科生为主的大学生群体提供接受美育的机会和平台。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学理论被纳入必修课的情况比较少,覆盖面过窄;专业的艺术鉴赏课课程容量不够,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缺乏;高校在办学理念上对学生美育素养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均衡;大部分高校的美育实践,比如学生社团活动课程缺乏专业教师指导,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也并未受到大多数学生的欢迎;在校园人文环境建设方面,大多数高校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校园环境没有高雅的人文内涵、文化辨识度不够、历史基因没有很好地凸显等。由此可见,高校在跨界审美课程开发、校园文化氛围营造和条件保障等方面的资源和精力投入,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国家要求和社会期许。

《意见》中明确“把美育工作及其效果作为高校办学评价的重要指标,纳入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和‘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从根本的制度评价层面对改变高校轻美育的顽症痼疾进行了针对性改革,但是制度生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2. “大美育”体系的构建和美育评价指标量化之间的矛盾

高校美育之前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以艺术教育代替审美教育,通过“美育渗透”的方式单向度地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但这样的教育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当今社会美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高校美育需要与时俱进,进行改变和完善。《意见》在“深化美育教学改革”中着重强调,要扎实推进美育的联合创新,鼓励高校与高校、高校与企业、高校与地方共同探索合作培养模式,逐步完善面向不同团体、不同年龄段的协同育人机制。也就是说,高校要尽快完成由传统的“美育渗透”向系统的“美育整合”转变,充分挖掘艺术、自然、社会、科学乃至专业课程中的审美要素,在遵循审美规律的基础上用跨界整合的思维推动美育的课程化和课程的美育化,从而以美为核心构建高校课内课外以及与政府部门、社会企业等联动的“大美育”体系。

在形成高等教育“大美育”体系的探索过

程中,构建高校美育评价体系是一项必然的前提,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教育部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鼓励各地运用现代化手段对美育质量进行监测”^[12]。但截至目前,我国对高校的各类评价体系中并没有专门针对美育的评价指标,更谈不上科学、量化的审美素质要求。因此,我们怎样从整合了各个领域的美育资源中对美育的效果进行定性、分解、量化等,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西方的实证美学、实验心理美学和科学美学的诞生、发展都已经证明了美学测量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伯克霍夫(Birkhoff)曾经进行大量实验,探索提出了“审美程度公式”理论,并借由该理论研究衡量主体审美感受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组成部分的水平和关系。^[13]这为我们分别编制面向审美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既有科学规范性又有兼容可操作性、既体现共性又尊重个性的质量测评公式提供了经验和镜鉴。美育质量测评体系包含课内、课外多条教学途径,校内校外多类教学实践平台,涉及美育教材、教师、学生等多种教学因素,需要综合运用教育、心理、管理、数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这个科学体系如何建立以及在建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与高校“大美育”体系的同心同向同行,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3. 高校美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和专业师资缺乏之间的矛盾

2019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进美育工作,特别是《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针对高校美育不仅提出了开展工作的十四项主要举措,也清晰地规划出美育建设的时间表。为了尽快提升大学生的美育素养、完成全国范围内的美育目标,教育部也在积极地采取措施,要求所有高校面向全体学生深化普及艺术教育,并对公共艺术类课程的修习提出了专门的要求——学生未修满此类课程(及艺术实践课程)的学分,则不允许毕业。^[14]由此可见,教育部用目标设定、过程推动相结合的方法来激发高校加大美育资源投入和实施力度的内生性动能,倒逼高校出台

更完善、更行之有效的美育工作实施细则。

高校推进美育工作的积极性和迫切性毋庸置疑，但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或许不是态度和意识偏差，也不是经费支持、校舍投入不足，而是专业师资力量的严重缺乏。早在2006年，教育部就曾出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对高等学校美育师资力量问题做出了规定。根据通知要求，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师资数应达到在校学生总人数的0.15%—0.2%，其中专职教师应不低于艺术教师总数的50%。^[15]但是，综合性质的大学很少能够按照这个要求配齐专职公共艺术教师。造成这样的状况，既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将责任完全推给高校。我们应当注意的是，高校美育工作的开展，人才是第一位的。专业人才团队组成如果连基本的人数要求都达不到，何谈名师工作室建设和美育名师的培育工作。要解决这个矛盾，高校应该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利用引育并重的举措不拘一格地延揽人才，如有选择性地吸收社会上一些艺术技能突出而又具备较高知识素养的艺人作为高校美育的专家人才；同时也要通过为艺术教师设计专门的评审、考核、晋升机制来增强专职岗位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高校美育的突破路径

高校“大美育”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需要长期实践、不断完善、协同创新的过程，它最终指向学生“知情意行”合一的“完全人格”建设。这个综合体的完善，既需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和全方位协同，也需重点推进、专项建设和关键领域深化，以更好地打造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大美育”环境。

1. 打造“美须建构”的课程体系

在《意见》的顶层设计中，高校不仅承担着为大学生开设公共艺术课程的责任，还要落实美育教材建设的主体责任。这是国家根据高校美育资源的优势和特色而赋予它的历史职责和光荣使命。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将艺

术教育等同于美育。诚然，艺术教育可以说是美育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部分。但如果美育仅仅局限在意识层面和理论说教，没有艺术技巧领域的学习与培养，美育功能的彰显则很难落到实处；同理如果没有审美理论和审美意识的教育，只注重提升艺术技巧，那么个体的美感滋养和创造意识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因此，高校美育需要构建科学完整的课程体系；同时完整的课程体系也是构建美育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前提。

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范迪安建议“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加强‘美育学’学科建设”^[16]。“美育学”理念的提出，正是基于“大美育”的视角从根本上对美育学理的科学性建构与阐释。相较于“小美育”，“大美育”突破了之前观念中艺术教育等同于美育的狭隘观念，将审美教育回归到与德智体劳并列的独立性理论范畴。“美育学”完整课程体系的建立最少需要四个方面因素的支持：一是完整的教材体系；二是健全的师资力量；三是丰富的教学实践场所；四是科学的评价体系。在所有具备教育功能的实体机构中，高校无疑在满足这些基本条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育学”，除了传统美育中的基本理论、美育思想史、艺术修养、美育实践等知识体系之外，还涉及美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等多门学科中的知识内容和方法论，是一门典型的综合交叉学科。高校的四大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它有齐全的学科门类 and 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可以通过交叉学科组建团队的模式来论证“美育学”所属的学科门类和具体的学科方向，开发面向小学、中学、大学一贯式衔接的全新美育教材，同时大量培养相关领域的美育专业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避免各个高校单打独斗带来的一些问题，最好由国家从不同高校中整合各个学科领域内最好的专家组成团队来完成“美育学”教材的研发，并制定美育专业教师的从业规范等。

2. 构建“美可衡量”的评价机制

从理论上讲，当“美育学”建立起较为完

整的教学体系框架，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框架的不同组成部分分类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随着课程内容的不断完善，建立起更为系统的美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但在实践中，我们应同步展开教学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建设过程，因为这两者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艺术教育 是美育培养的基础路径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指标更易标准化，故以艺术素质中的艺术文化、艺术感知力、艺术表现力、艺术审美等为基本框架构建了相应的指标模型，但在一级指标构成和权重设置方面并没有统一。美育比艺术教育所涵盖的范畴更广，主客体等构成要素更加多样，存在状态也更加易变，因此，评价标准制定就更为困难。尽管如此，美育评价却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没有科学的评价就不会有真正科学的美育。《意见》强调，高等教育阶段强化学生文化主体意识。^[7] 因此，在高校的美育评价体系中，艺术素质的指标不应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将侧重点放在学生价值观塑造、人格养成、情感教育和综合性审美体验等思想境界层面。不同的教育内容需要有不同的评价方法，美育的整体效果评价则需要多样化评价方法的有机结合。首先，高校美育的特征和职责任务决定了对它的目标评价应该以定性为主，同时配合成熟的指标模型进行定量评价。是否有明确的审美主旨和指导思想，是否具有鲜明的情感性、形象性、艺术性等审美特征，能否促进学生的身心和谐与人格完善，这些凸显美育实践性质的内容是其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统领定量评价的主要动因和指导原则。其次，建立数据平台与教师观察相结合的过程评价体系。学生对美育的接受效果主要体现在他的日常言行中，这就使得对学生的观察和观测成为评价的重要基础。除了在集体生活和各类活动中通过教师察其色听其言观其行这样传统的方式来进行评价，我们还应该适当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大数据”来完善这个观测体系。最后，完善自评和他评相结合的结果评价体系。大学生的自我评价往往能够直接体现高校美育目标的完成程度、学生对美育本质

的把握情况，以及对美育理想的坚守态度等。当然，自我评价并不完善，比如学生容易因较为主观、缺乏参照对象等影响评价的准确性。因此，我们必须将自评与他评更好地结合起来。他评又可以分为教师评价、主管部门评价和专家小组评价等多种形式。

3. 培养“美贵教化”的师资力量

人永远是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教师要起到引领和示范的重要作用。对于追求学生境界高雅、人格完善的高校美育来讲，教师言传身教的“教化陶养”之功更是不可或缺。如果有完整的课程体系和科学的评价指标，却没有一支政治过硬、人数充足、专业扎实的教师队伍，高校“大美育”体系的建设就是空中楼阁，难以实现。

要从根本上解决专业师资力量缺乏的问题，需要在国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使整个教育机制变得更加完善、教育理念不断优化、师资传承实现良性循环。从目前高校所面临的困境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增强美育的专业师资力量。第一，利用高校良好的美育传统来培养教师。高校传统的艺术教育中就包含着一些高融合度、有文化底蕴的美育活动。这些美育活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审美水平，还培养了一大批对这些活动有热情、有专业能力的教师。这些优秀的指导教师，能有效缓解当前高校专业美育师资力量缺乏的现状。第二，与艺术院校进行合作，打通专业艺术教师的使用渠道。艺术院校培养的就是专门的艺术人才，其教师与学生都是艺术教育的主体力量和专业人士。高校可以跟附近的艺术院校进行师资方面的合作，将艺术院校的师资补充进美育队伍。第三，聘任社会上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等作为美育队伍的重要补充。高校应该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与社会上的各类剧团、表演团体、演艺公司等进行广泛合作，让学生从校园“走出去”，把有良好社会声望的艺术家从校外“请进来”。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艺术教师在承担相应的美育课程时，高校都应对其进行上岗前的政治审核和岗位培训，确保每一位教师都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然，美育

不仅仅是艺术教育，美育教师也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教师。作为美育的重要力量，其他课程的任课教师和管理人员也要积极地通过设计并参与学生活动，提供人性化的管理服务，来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并能够坚持用美好的语言和行为教化、感染学生的心灵。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正在进入综合治理、啃硬骨头的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得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国民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在这样的现实形势之下，充分加强高等教育范畴中的美育工作，从而形成全人格、内涵式、融合性的格局和氛围，成为高等教育改革攻坚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破题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制度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社会和家庭层面的协同共振，还需要高校主动作为，积极谋划，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大美育”理念的观照下，从美育工作的关键领域和重点区域寻找突破口和着力点，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整体，努力营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美育育人体系，让高校美育工作成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和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参考文献：

- [1] 南怀瑾. 南怀瑾选集：第2卷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40.
- [2]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N]. 人民日报，2015-09-29 (12).
- [3] 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 [N]. 中国日报，2018-08-30 (1).
- [4] 陈宝生. 做好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 [N]. 光明日报，2019-05-07 (15).

[5] [17]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N]. 人民日报，2020-10-16 (4).

[6] 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B/OL]. (2018-09-10) [2020-11-1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10/c_1123408400.htm.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4.

[8] 周泽东. 论当代环境美学对审美无利害的解构 [J]. 文艺争鸣，2014 (4)：42-47.

[9] 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1卷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57.

[10] 谷鹏飞. 时间性与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生成逻辑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2)：29-36.

[11] 范寿康. 美学概论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32.

[12]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9 (2)：19-23.

[13] 叶泽洲，赵伶俐. 我国高校美育研究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基于CNKI的文献分析 [J]. 美育学刊，2019 (4)：43-50.

[14] 高校学生修满艺术（含艺音）课学分方能毕业 [N]. 人民日报，2019-04-13 (3).

[15]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06 (9)：26-28

[16] 范迪安. 加强“美育学”学科建设 [N]. 北京日报，2020-05-26 (4).

(责任编辑 刘红)

(下转第95页)

强才智与强素质：素质教育改革新认识

陆 一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摘要: 素质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是长期困扰中国教育改革的难题。通行的素质教育含义是指全面教育中考试不涉及的部分。素质教育不仅是非应试的, 而且难以考评。根据理论分析得到“才智-素质”二维模型和两种教改路径。借助日本“新学力观”教改的实证数据, 揭示“弱才智”教改路径的学力陷阱和社会阶层分化的代价。应当采取“强才智-强素质”的教改路径, 使教育事业既服务于科教兴国, 又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全国范围的高水平均衡办学条件是实现“强素质”的必要前提, 并能缓和过度功利化教育竞争的局面。充实校内教育、增加政府的选拔制度供给、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提高教与学的适配效率, 方能为才智与素质兼强创造现实条件。

关键词: 素质教育; 考试制度; 可考评性; 因材施教; 教育成层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76-14

自从 20 世纪我国教育事业确立了“科教兴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宏伟蓝图后, 素质教育便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 素质教育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政府、学术界和教育实践者对此问题仍有分歧。^[1] 素质教育改革已正式推行了二十多年, 一些本应有利于素质教育的改革措施为什么在实践中运转不灵? 为什么一些措施实施后事倍功半、无济于事, 甚至事与愿违?

关于素质教育落实困难, 一部分观点将其归咎于严格的选拔考试制度对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 另一部分归因于教育的内容不恰当、负担过重和教学方法落后。然而, 相应的高考改革、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改革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2] 在接连不断的改革过程中, 常常发生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却引发了更多

问题的状况, 以致有观点认为由素质教育引出的一系列政策陷入了“麻烦治理”^[3] 的窘境。教育理念、教育政策和社会反应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在这些改革过程中显露无遗。

探讨素质教育问题不能仅限于教育原理、教育政策、教育教学及评价的范围, 需要把素质教育议题置于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和当下发展阶段之中来通盘考量。本文试图基于教育社会学和比较教育学的系统化思维方式来剖析素质教育问题。首先, 厘清素质教育的初始政策目的及其狭义文化流变, 然后从理论上辨析素质教育和考试制度的关系, 说明两者在实践中被认为势成对立的原因。其次, 引入才智与狭义素质构成二维理论框架, 解释可考测的才智与不可考测的素质之间的混淆。对于业已为他国初步实践的一种通过弱化才智来提升素质的改

收稿日期: 2020-11-20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建设成效分类评估研究”(CIA190274)

作者简介: 陆一, 女, 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比较教育、教育社会学研究。

革路径,本文援引针对日本“新学力观”教改的实证研究数据,反思同类改革对教育体系和社会变迁的综合影响。最后,本文提出“强才智-强素质”改革目标,以期为素质教育改革找到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出路,对当前教育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一、素质教育的政策目标与通用含义

1. 教育改革总目标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下文简称《深改决定》)的发布标志着国家层面正式推行素质教育。该文本显示,提出素质教育这个改革命题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既为了使国民能够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由此,素质教育被定位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对于国家和每一位国民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教育改革的总目标,政策措辞体现出全局性和协调平衡性的特征。全局性在于关注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协调平衡性在于对眼下目标与长期目标、教育公益性与私事性、国家社会需求与个人个性化选择的兼顾。

二十多年来,国家政策中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同样采用了相关的表述,包括“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坚持全面发展”“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等。2017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下文简称《“十三五”规划》),其“主题主线”一节中提出:“必须紧紧围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个主

题,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2. 素质教育的政策着力点

上述总括性的目标表述主要强调的是“好的教育体系”对现代国家、社会和个人所能贡献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阐明什么样的教育改革举措能够实现这个宏大目标,为什么在21世纪初我们以“素质教育”之名来统领这场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持续讨论,推进素质教育改革思路已经形成了三个着力点。

着力点之一在全面发展的育人结构。一边对“德”“体”“美”“劳”的重要性都予以加强,并提出进一步教改要求;另一边对于“智”的态度则与之相反,通过三个层次的举措改造智育。其一,转变过去的智育观念,以“能力培养”(如“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代替“知识学习”作为智育目标。到了2010年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能力为重”直接取代了五育中“智育”的表述,并强调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生存生活、做人做事、主动适应社会等能力。其二,改变旧的教学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用新的教学方式培养能力。随后,以“新课程”为代表的一系列课程教学改革将这一思路落实为具体工作。其三,教育减负被认为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关键手段,并成为长期主导教育改革的命题。以上三点可以归纳为“智育”的教育目标、观念和方法要完成新旧替换,将能力与知识对立,潜台词是过度的知识学习妨碍了能力发展。于是,由实转虚、强度减弱,成为素质教育目标之下才智教育的改革基调。

着力点之二在于改革考试评价。当世人相信现行高考制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阻碍,要改变“一次考试定终身”的状况,将改革高考制度作为推进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在“应试教育”弊病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素质教育”被树立为向“应试教育”开战的旗帜。据此推论,能够为素质教育铺平道路的高考改革关键在于要使学生能够从考分对录取的严格决定性中解放出来,具体措施被设想为用

多元评价（综合素质、多元能力等）取代一元评价（分数），以双向自由选择的市场化招录机制代替考分直接决定录取的选拔机制。这套设想非常接近美国式的招考分离大学录取制度。美国没有代表国家教育标准严格选拔的统一考试制度，因而没有应试教育之风，也没有素质教育的提法，没有对等的观念。^[6]这种教育改革思路并非指向完善既有的教育体系，而是不惜大动干戈地改换体系，使现有体系的问题消失。至于新的体系将对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怎样的新问题、新矛盾尚未得到系统研判。可以说，“体系转换论”与中国社会结构与传统的不协调性为后续改革无法彻底进行和进退维谷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着力点之三在于强化教育事业的评价机制。素质教育需要相应的评价机制来保障落实，包括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相关制度和法规的建设，以及“教育督导”的普遍设置。《“十三五”规划》中“评价”一词出现六十多次，可见其受重视程度。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概念的生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此类教育测量评价的操作化。^[7]

3. 狭义素质教育观念的形成

21世纪初，国家提出素质教育的总括目标是要在21世纪构建一个更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同时，从“智育”的转向与学科知识的弱化，到“考试制度改革”、从“分数中解放”，再到强化素质教育督评，这三条工作取向构建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可操作化的素质教育施策思路，并且在近二十年来影响持续扩大，成为素质教育改革真正的着力点。比起高屋建瓴的定义、众说纷纭的学术讨论，素质教育的政策取向有力形塑了人们对素质教育含义的认知。如今再问素质教育是什么，人们凭直感会说是教育减负，是“新课程”，是“综合素质评价”，是“素质教育督导”，是“禁止公布分数排名”等。

尽管应试教育缺乏严谨的定义，批判应试教育的弊病作为教育改革主张确实能够得到许多支持。长期以来，一味追求考试分数、不得

法的教与学、有失偏颇的评价导向等不良现象一直占据着教育现场，教与学的诸多方面受到考试竞争的强烈影响，发生种种异化，功利应试的教学对教育事业的危害不可忽视。^[8]应该说，如何减轻应试对教育的危害从而提高教育质量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和撬动改革的支点。

在上述背景下，狭义素质教育观念被树立起来，它主张仅仅针对考试科目的教育不是育人的全部，学生考试成绩优秀只能代表教育的部分成功，教育工作不能忽视考试不涉及的重要方面。早期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人才的素质分为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而素质教育着重的是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文化素质则又侧重人文素养、“做人”的能力。^[9]在更多主流表述中，素质教育特指要加强对德育、体育、美育、劳育和一些综合实践能力、知识的灵活应用能力，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素养”（如创新精神、心理素质、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在新近的官方话语中，素质教育尤其强调“立德树人”，^[10]对应“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念中的德性养成目标。总之，在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之下，如果说考试制度已经有力地支撑起才智的培育，提倡狭义的素质教育则试图支撑起其余“非应试”的部分，从而提高教育水平。通过这种狭义化，即从“全面发展”到“非应试”，素质教育原本比较模糊的内涵取得了实质化的再建构。为了行文简练，下文均以“素质教育”代表其狭义概念含义。

综上所述，有一类教育对青少年具有重要涵养价值，然而升学考试却不对其考评。由于许多人将学习完全对标考试，全面发展的目标便落空了。“素质教育”概念的批判性价值就此彰显。那么，如何系统性地改善这种情况？是否通过考评“素质”就能实现素质教育的强化？下节专门辨析两类教育目标与考试制度的关系。

二、考试制度架构下的才智教育与素质教育

1. 才智教育得到考试助益

才智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素质。如今我们

身处高度现代化、产业化，科技竞争激烈的社会，才智的重要性倍加凸显。著名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在 1916 年对人类将日益仰仗才智教育的处境曾做出预言：“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这个法则是绝对的：不重视智力培养的民族注定要被淘汰。并非你所有的英雄行为、社交魅力、聪明智慧以及在陆地和海洋取得的胜利，能够使命运之手有所退缩。今天我们保全自己，明天科学又将向前迈进一步，那时，命运之神将对未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宣告她的判决，没有人能会为他们诉求宽恕。”^[9] 20 世纪 60 年代，知识经济和相关产业在美国方兴未艾，有学者指出，“过去 30 年内，我们国家几乎一半的增长应归功于我国人民所接受的更多的教育以及更好的技术，而后者也主要是教育制度的结果”^[10]。曾长期担任加州大学校长并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克拉克·克尔更是直言，作为“才智之都”的“大学已经成为国家目标的至高手段”。^[11]

人的才智主要体现在高阶的认知能力，落实在对学科化知识的透彻掌握、融会贯通。才智教育是一个从基础到高阶，通过模仿、掌握与锤炼，在专业上精进乃至豁然贯通的过程。诸如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思想品德、历史、地理等各项科目的学习带来的知识、能力和观念态度构成了义务教育塑造每一位国民心智的主要方面，这在所有现代国家具有共通性。考试动员人们去学习这些学科领域，帮助教师与学生衡量学习进度与水平。一些新题型、高挑战的命题还能够更精准地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灵活应用以及在特定情境下融会多学科知识的才智能力。考试对才智教育的助益不仅是个人化的，也是社会性的。参与大规模考试的过程是一种有益的社会规训，使人习得在规则范围内公平竞争的秩序意识，承认在才智水平、学业能力上的客观差距，从而为科学知识普遍地树立威信，避免反智文化。

良好、普及、制度化的才智教育对国家复兴事业、经济与科技发展、个人生活幸福和社会和谐安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受惠于普遍的义务教育制度，所有人得以参与现代产

业社会和各种经济活动，考试强力而高效的“指挥棒”作用使人们能够总体上把握现代社会分门别类的才智要求，并促进向学之风，建立社会的才智秩序；能够制度化、传承有序地增长才智，培养国家社会所需的人力资源。这正是—国具有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表现。

2. 难以考评的素质教育

就人的全面发展而言，还有一系列更内在、更具人文性的素质无法像才智那样被科学地测量和评比，如品德、审美、价值态度、动机、兴趣等。素质教育对应的就是这个部分。曾担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黄达人说，素质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人的素质体现在细微处，不一定有定量的标准，只能是模糊地去把握，“我们常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培养他们的诚信之心、爱心、公德心、团队精神，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对他们进行教育，但其效果却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无形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12]。

假设不断优化考试技术，细化考核指标，乃至创造新技术实时监控，终究能否彻底地测评人的全部素质以及素质教育的实效？如果说考试导向的才智代表了人力资本价值、人的功用，素质教育则强调人的主体性，推崇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育人不同于制器，对于器具的各种物质属性总能找到科学的测量方法，然而内在的不可测量、不可实证、不可确定是人性的本质。教师如园丁，而不是工程技师。后者总是事先画好精确的图纸，在无尘厂房里精密控制每一道环节，尽力追求出品和设计图纸的最小偏差。教师不可能这样做，人的成长中必然有一部分不可见、不可知，也不可能完全隔绝外面的风雨。育人工作无法排除意外，园丁总是做好该做的事，然后交给自然的力量。这是一种埋头耕耘、不斤斤计较收获得失的豁达。在教育中，这份自然的驱使力就是学生有自我完善的生命力和天然的上进心。育人的信念在于尊重这份自然，教师做好了该做的事，哪怕无法时时监控、测量和证实，相信教育本身有其力量，只要耕耘，必有不期而至的收获。我

们要承认这种不可监测和不期而至，因为教育在服务各项事业的人才需求之余，终究还要为了人本身。这种“不受后果支配，不期望补充，不受目的的影响”^[13]不以结果效用论成败的教育信念就是素质教育的基本特征。

辨析考试与两种教育的关系，还要重视考试之于中国社会的作用。除了对学业和教学的测量评价功能，考试还发挥着建立社会才智秩序的功能。秩序意味着等差和成层（Social Stratification），与个人利害高度相关。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贤”文化信念和制度实践，还没有比考试更加公平和进步的大规模选才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考试可谓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承重墙”。才智教育主导下的学习以客观标准为准绳，它对错分明，能够比较水平高低。素质教育主导下的学习以个体为中心，具有相对和多元的价值，它无关对错，各有千秋，能给出不唯一的主观评断。学生在才智教育中可以通过考试竞争取得优胜，素质教育却不存在公平合理的竞争途径。总之，狭义素质难以测评，不应被测评误导，根据素质测评的竞争与分层无法避免主观偏私与政治风险，在上述多重意义上，我们提出素质教育是难以考评的。

所谓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更准确地说是不可考评素质与可被考评才智两者在教育过程中被错置的问题。表象上，考试成了素质教育观念下造成教育失衡的归咎对象。素质教育改革者认为，只有弱化这种考试竞争的选拔机制，才有可能为素质教育的推行提供制度性保障。须认识到，教育中两者的异质性根植于人类的天性。真正的挑战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追求兼容二者的现代教育目标。

三、才智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实践模型

1. 二维模型与两种教改路径

根据上文可否被考评、可否根据考评结果社会成层的分界依据，将人的才能分为两个维度，即才智与素质。图1概括出两者既非同向也非逆向的交叉关系。才智维度不仅可被科学考评，并且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直接有用，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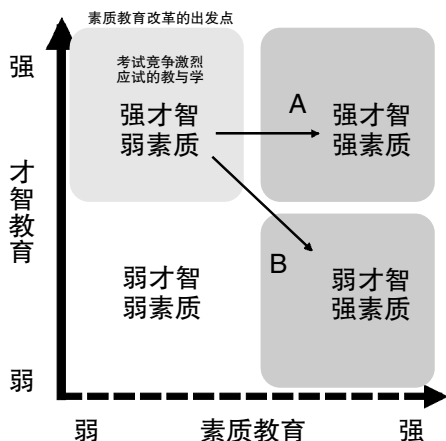


图1 “才智-素质”二维模型与两种教改路径

被普遍应用于人才的选拔与竞争，对应“五育”中的智育。素质维度代表人的内在涵养和潜力，难以被科学考评（用虚线表示），更不能据此公平竞争。具体而言，此维度对应“五育”中的德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①以及相关政策中同时提及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生存能力”等。

“才智”与“素质”既不相同，也不相反。两类才性各自都有强与弱的分别，组合构成了图中的四个区域，相应简称为“弱才智-弱素质”“强才智-弱素质”“弱才智-强素质”“强才智-强素质”。

我国教改的出发点即针对应试教育的现实弊端，对应图中“强才智-弱素质”区域。为了提升素质，图中A代表了在保持和巩固才智水平的同时设法加强素质的教改路线，指向“强才智-强素质”目标。

不过，一些中外改革采取了B路线，如降低知识学习深度、难度和系统性，减少学科教学增加自由探究时间，减低考试难度，削弱考试分数选拔效力等举措。公众会倾向于“弱才智-强素质”的路线是可以理解的。其一，与“强才智-弱素质”状态截然相反的是“弱才智-强素质”，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和强烈的改革愿望，未加深思地选择了图中居于对角线位置的“弱才智-强素质”方向，表现出“反才智”、“反应试”、推倒现有才智秩序的主张。其二，B

路线也表示通过降低才智教育要求使教学转变重心，从而单一地提升素质教育的改革思路。这种选择里隐含着一种对教育努力的总量难以改变的静态预判，仅仅把教育视作为资源的分配而非生长增殖，或认为兼容并包的雄心过大，不切实际，只有此消彼长才是改革的唯一途径，这属于一种远离主流才智秩序、躲避应试的观念。也就是说，当素质教育改革停留在与应试行为相同的操作性思考层次，就很容易在“反应试”与“避应试”的B路线上取得共识。有研究归纳，B路线的改革举措往往能得到温情珍爱独生子女的家长、提倡美国进步主义与个人主义教育思想的学者和青睐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人^[14]等群体的支持。

2. 实践遇阻的“新课程”

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发布，在素质教育的名义下针对课程体系、教学方式与评价制度的改革拉开序幕。这场被命名为“新课程”的改革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理念，以学生主体替代教师主导，以经验、综合的体验来消解学科专业系统化的知识学习，再以自主兴趣探究替代课堂周详讲授（即“满堂灌”）。^[15]当时美国、日本也流行此类教育教学观念，新课程论与教学论的著作被大量译介，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成了基础教育界的流行词汇。通过反对与变革旧教学，素质教育在理论上成了代表先进方向的“新教育”。

然而，课程改革推出后旋即遭到教育学者“轻视科学知识、轻视书本知识、轻视知识系统性”的严肃质疑。^[16]有中科院院士在两会提案中强烈反对数学新课标，指出“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全面否定过去的教学体系，总的水准大为降低，每个学段知识的讲授跳跃杂乱，在实践中已引起教学上的混乱”^[17]，称此举背弃了数学教育肩负“理性文明和科学精神的启蒙使命”与“科教兴国”的国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新课改”还遭遇到难以落实的尴尬，被形容为“穿新鞋走老路”^[18]、“素质教育喊得热热闹闹，应试教育搞得扎扎实实”^[1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理念难以操作或者缺乏现实条件、

有悖于常识感的理念，使基层教师在工作中感到迟疑。

根据上文提出的理论模型，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和目标趋向可以说都符合B路线的设置，然而“新课程”改革又很难说得到了全面彻底的落实，这个案例尚不足以作为实证证据来揭示B路线的可行性。为了减少政策目标和实践行动之间不一致的干扰，以更清晰、直接地开展论证，下文援引日本“新学力观”教改及相关实证数据来讨论B路线的得失规律。

四、“弱才智-强素质”教改案例

1. 日本提出“新学力观”修订《学习指导要领》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达到巅峰，当时中曾根康弘内阁信奉新自由主义，不仅政治经济政策紧随里根-撒切尔主义的步调，彻底的教育路线改革也同时展开。中曾根内阁设立“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4年至1987年发布四次答辩报告，全面批判日本战后长期以来的“受験（应试）教育”“填鸭式教育”“全国一律主义”，提倡“宽松教育”“人格的丰富性”“发挥个性与创造力”。这些报告为后续一系列改革做了全面翻新教育的理论准备，从而勾画出与旧有学力观念对立的“新学力观”。

教育路线转换的理论准备和观念宣传从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落实到明确的政策决议则是1991年至2008年期间，相对于旧观念偏重知识和学科基础、讲究统一标准、提倡严谨的学风和严格精确的知识掌握，新观念偏重学生的个性，推崇兴趣、宽容、多元、自由选择。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开始执政，巩固并推进了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新学力观”的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官方每十年左右修订一次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之中。

1977年和1989年发布的《学习指导要领》都有减少教材内容和课时数的情况，而1998年年末发布（2002年实施）的《学习指导要领》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标榜“教材内容削减三

成”、“圆周率=3”、“二次方程式”和“元素周期表”都从中学教材中消失。除了教学内容删减，新版标准改变过去统一规定的科目教学要求，推行每学期70小时的“综合学习课程”，赋予教师和学校在开设课程方面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学生学习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希望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以培养学生自我学习、思考、问题解决能力。

虽然大幅度削减学业标准的做法令人一时难以认同，但此举毕竟原原本本地落实了教改宗旨，在原理上是自洽的。以“圆周率=3”“二次方程式的消失”为例，为了培养综合运用能力、实际问题解决能力，过于精确的知识负载可能成为施展创造性的绊脚石，当学习难度有可能损伤学习兴趣和意愿时，知识的认知要求可以妥协、避让。

占据大量学时的“综合学习课程”具有跨学科特征，其内容是不确定、不统一的。由于总学时没有增加，各学科的教学时间被削减了，原本依托学科知识体系而建构的基础教育教学目标的结构发生了质变。新观念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个体差异，注重综合运用知识的便捷性。“新学力观”相信许多学科知识对多数人而言并没有一致的学习必要性，特定知识只有当学生自主选择去学，它才应当出现在这名学生的视野中，才有被学习的价值。旧观念下，某些知识由于占据构成特定学科知识体系的关键节点而不可或缺，新观念下学科体系和知识之间的系统性都变得不那么重要。综合的、探究的学习使学生卸下了由浅入深系统化学习某一科目的负担。这就意味着知识本身的递进关系消失，高深的知识体系在具体应用场景下变得扁平化，即用即取。

从观念到举措，日本“新学力观”系列教改贯彻一致地体现了为追求狭义素质（学习兴趣、自主探究、综合的问题解决能力、创造力等）得到充分发展，宁可牺牲一部分知识基础与才智训练要求的教改思路，符合前文理论框架中的B路线取向。

2. 教改前后的学业水平调查与学生生活调查

日本从1991年开始采取B路线的教育改革

带来了哪些变化？下面引用三批实证研究数据来分析。这些调查均跨越改革前后数年，调查问卷和测试题保持一致，具有较高的前后可比性。这些调查结果不仅公开发表得到学界认可，且对后续国家政策的修正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一批数据来自大阪大学池田宽团队和东京大学荻谷刚彦团队分别于1989年和2001年对关系都市圈的两次大规模中小学生学习与生活综合状态调查。调查跨度12年，对象为小学5年级和中学2年级学生。^[20]第二批数据来自青山学院大学樋田大二郎研究团队的“高中生学生文化与升学前途调查”。^[21]研究团队分别于1979年和1997年实施了2次针对相同学校高中2年级在校生的调查，包括日本2县11所公立高中，采取随机抽样，两次调查的高中所属学区与生源均无显著变化。第三批数据来自东京都生活文化局每隔三年实施一次的“大都市儿童·学生生活与价值观调查”。^[22]下文引用了其中1992年、1995年和1998年三次调查数据。

从学生平均成绩来看，2001年与1989年相比，小学、中学的语文和数学（算数）成绩（百分制，下同）均有下降，其中小学五年级的算数平均分下降12.3分，降幅最大，语文平均分下降8.0分；中学二年级数学和语文评分下降5.7分和4.4分。从成绩分布来看，高分段大幅度减少，小学5年级算数90分以上的学生，从1989年的超过40%，下降到2001年的不到15%。

同一项调查也涉及学生的居家活动时间。2001年与1989年相比，小学5年级和中学2年级学生在家学习、做功课、读书的时间均减少了，而在家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均增加了，增幅比学习时间的降幅更大。在1992年、1995年、1998年三次抽样问卷中，东京都公立高中二年级学生平均每天在家学习的时间从66.1分钟、55.5分钟减少到42.5分钟；看电视打游戏时间则从120分钟、129.1分钟，增加到139.1分钟。

当统一规定的学业要求下降后，学生获得了更多自由时间。然而现实中，小学、中学、高中学生都没有表现出积极利用自由时间开展个性化学习的趋势，而是把更多时间投入看电

视、打游戏等娱乐休闲之中，成绩降低可想而知。

为了进一步揭示“新学力观”教育改革如何发生影响，2001年的中学生调查试图比较新旧两类教学方式，在学生问卷中通过7种具体教学行为频率来反映。^②因为现实中7种教学方式的运用并不互斥，所以根据学生对学校教师教学行为频率的反馈，可以得到四种教学类型：新旧教学均注重型、仅注重“新学力观”教学型、仅注重传统教学型、教学方式模糊不明型。于是，初二学生的数学成绩与其在学校所接受的教学类型之间的关系得以揭示（见表1）。仅注重传统教学型和仅注重“新学力观”教学型的平均成绩差异不大。此类量化研究应当注意的是，为了论证学校教改的影响，仅仅看学习成绩的变化是不够的，因为学校不是唯一能够提供学习指导的地方。假如研究发现学生成绩下降，大致能够推论学校没有尽到足够的责任，然而当学生成绩上升，却不能想当然地归因于学校的功劳，还要从中排除家庭教育、校外补习（影子教育）的影响。东亚社会的家长普遍重视孩子学业，学校教育发生重大变化后，要是家长感到学校教育不充分、不放心，很可能会自发采取行动来弥补。如此一来，即使改革后学生成绩提高了，也不能直接归功于学校的教改。在评估教改影响时，要把学校和家庭的教育投入都纳入考量。

该调查也关注到了这个因素，表1可见，新旧教学均注重型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最高，并且补习和不补习的学生成绩差值也比较小；在仅注重“新学力观”教学型的数学课堂，补习和不补习的学生成绩差值最大，达到百分制下的25.3分，而在仅注重传统教学型的数学课堂，补习和不补习的学生成绩差值最小。另外，以中学数学成绩为因变量，在控制了性别、家庭文化阶层、父亲学历、每周补习天数、每周校外学习天数、学习意愿等变量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自变量小学里采用“新学力观”教学的课程数与中学数学成绩显著负相关（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1， $P < 0.0001$ ）。^[23]

如果说“新学力观”改革本意便是容忍成绩下降而解放学习兴趣，那么学习兴趣又实现了怎样的变化？表2显示，1979年和1997年两次调查东京都高中2年级学生的学习意愿和学习兴趣，注意到家庭背景的差异，统计时依据家庭文化资本的高低将受调查学生分成了上、中、下三个层次。跨越教改的两次调查结果比较发现，高二学习态度马马虎虎、不追求更好成绩的学生在每个阶层都变多了，而表示“课上所学激发了我的兴趣，使我想要了解更多”的学生却变少了。在阶层之间的比较又显示出，家庭背景越弱势的学生，在学习意愿、学业上上进心和拓展学习兴趣方面的劣化程度越高。如

表1 采用不同教学方式学校的学生数学成绩

	平均成绩	i. 课外补习者 平均成绩	j. 不补习者 平均成绩	差值 (i-j)
新旧教学均注重型	69.8	78.6	62.4	16.2
仅注重传统教学型	61.9	69.3	56.4	12.9
仅注重“新学力观”教学型	60.1	75.2	49.9	25.3
教学方式模糊不明型	63.5	74.5	51.6	22.9

表2 两次调查东京高中生学习意愿比较 (%)

		“学习成绩只要及格就够了”		“我对自己目前的成绩感到满意”		“课上所学激发了我的兴趣，使我想要了解更多”	
		1979年	1997年	1979年	1997年	1979年	1997年
家庭收入与文化资本的分层	下位	37.7	51.3	10.4	19.6	53.9	40.6
	中位	28.4	43.1	7.5	12.3	58.5	47.6
	上位	24.8	33.5	5.2	7.0	63.1	58.4

果说, 教改带来了些许远离学习的影响, 那么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较少受到这种不良影响。

2000年后, 日本教育体系中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包括学习机会、能力和意愿)正在不断扩大, 这一现象得到了日本和国际学界许多研究的一再证实。^[24] 对于弱势阶层家庭子弟而言, 他们只能依靠公办学校教育, 在改革之初, 由于负担不起校外教育的费用, 他们的学术能力得不到充分培养和发展, 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久而久之, 由于希望渺茫, 弱势学生连学习的意愿也减弱了, 他们不再相信努力学习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加光明的未来, 缺乏学习动力进一步危害其学业表现, 使差距加倍扩大。日本学界用“学习动力的鸿沟”(incentive divide)概念特指这种教育不平等加倍恶化现象。

“新学力观”改革付出了学业水平降低的代价, 却没有得到其他素质、兴趣、创造力等的提升, 还促使阶层之间教育更加不平等。在学术研究的有力举证警示和媒体、社会组织的强烈呼吁之下, 2008年3月, 文部科学省再次修订《学习指导要领》, 增加基础科目的教学学时, 提增各科目内容掌握要求, 增加文化传统和道德教育, 要求国语科重视古文教学, 而“综合学习课程”大幅减少40%左右。^[25] 对此有人担心教改的转向是否属于倒退, 文部科学省给出了正面解释: “此次修订是属于‘宽松教育’还是属于‘填鸭式教育’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实实在在地学到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同时, 培养他们的实际应用能力。这两者缺一不可, 必须同时推进。”^[26]

五、“强才智-强素质”: 支撑科教兴国与全面发展

根据前文的理论框架, 究竟如何才能推进素质教育, 优化“强才智-弱素质”的教育状况, 真正提高我国的教育质量, 我们从日本的案例中得到了双重启发。

第一, 要提升素质教育水平, 不应该采取“学科知识退让”的“弱才智”路径。排除传统模式而仅注重“新学力观”的教学被证明存在

很大问题, 不但使学业水平整体下降、高水平学生减少(数学尤甚), 而且校外补习依赖度变高, 家庭负担加重。这种模式下, 低收入、低文化资本家庭学生不只缺乏校外补习机会, 连学习意愿、学习兴趣也降低了。结果不公平且低效。对照“新学力观”改革初衷, “改变过去知识偏重型的教育, 弱化统一标准和学科体系, 只教授基本内容”实现了, 可是改革期待的学生自发学习的兴趣和意愿并没有随之增长, 反而全面降低。所谓“生存力”教育, 即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学习、自己思考的能力也没有显著提升。在教改的影响下, 由于学习能力和意愿均降低, 很难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学生的创造力与实践力能够比诺贝尔奖辈出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前辈有更好的表现。

虽然日本“新学力观”教改理念得到了实践贯彻, 却无法实现理论假设的“弱才智-强素质”。知识掌握得少一些、粗一些就不会妨碍学习兴趣的预期并不成立。真正求知欲强、自学能力也强的人往往是博学之士, 更不会畏惧知识。当时日本的改革者还有一种重要主张, 认为日本的教育太整齐划一, 总体低效, 要像美国那样, 没必要对多数人提出严格的学习要求, 只要让喜欢学习的人自由拓展即可。言下之意是要打破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育均等局面, 刻意扩大方差, 让优秀者更优秀, 哪怕增加不平等、平均值有所降低也在所不惜。这种观点忽视了“弱才智”不只是削弱了对某一种重要才能水平的平均要求, 还破坏了整体上基于知识学习而形成的秩序。学校教育无法脱开学业水平来构建秩序。学术性秩序崩解之后, 仅凭其他素质再难建立秩序。这是“弱才智”路径导致学校教育失败的主因。

尽管“强才智-弱素质”有可能导致应试教育的发生, 但“弱才智-强素质”却根本无法实现, 得到的只是“弱才智”, 并没有“强素质”, 成了一种柔弱、退缩、放任、失序的教与学。这提醒我们, 考试可测的学科才智水平和难以测量的素质水平并不仅仅相互独立, 有了前者, 未必有后者; 没有前者, 则很难有后者。对现

代教育而言，才智在人的全部才能和各种素质中具有优先性和基础性，对学校教育秩序具有奠基性。

第二，日本同时注重新旧教学方法的学校表现不俗，我们应该对“强才智-强素质”的方向抱有更大的信心。实证研究揭示，纵然仅注重“新学力观”的模式不可取，也不意味着要简单地退回到旧模式。如果学校既有严谨高效的学科教学，也有活泼开放的自由探究，如果教育者既注重严谨的知识传授，又设法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探究、表达、反思，不因用黑板讲授、布置作业、随堂测试等方式不够新颖又偏重知识传授而鄙弃传统，也不因课堂讨论、个性化探究既耗时费力又不容易掌控而拘泥守旧，那么学生将受益更多，整体学业表现更好。数据还显示，当学习采取新旧并重的教学，校外补习与不补习的成绩差别不大；当学校仅注重“新学力观”型教学，有一部分家长求助校外补习并且显著提升了成绩。有理由猜测，这种校外补习采取的还是传统教学。反之，当学校教育承担起两种教学责任，课外补习对学业的提升空间不大。

虽然新、旧学力的教育观念截然相反，但实证数据没能证明哪一种更先进，反而证明了两种教学并重的效果更好。同时，相关教改的失误也不说明新观念的错误。教育改革不宜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两种有张力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中不仅可以并存，甚至越积极地去兼顾两者，教育效果越好。其实在中国，有见识的家长们最希望孩子上的好学校、强学校往往也都采取这种“两手抓”的教学模式。现实中的好老师也是一样，总是设法兼顾“强才智”与“强素质”，对不同教学目标和对象因势利导，在每一个教学情境中缘机择宜。只有面向“强才智-强素质”的教改路线才是可欲求的。不轻易妥协、积极争取自我超越、心态强健的教与学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六、才智与素质兼强的多元化平衡

在考试制度影响下，才智与素质兼强的教

育真的有可能实现吗？平衡健康的人格发展与心智成长是人的自然本性，要达成才智与素质的平衡并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制政策要求或某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它的驱动力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正如人身体器官之间的平衡，没有一样是多余的，也没有一样是多多益善的。如果一种教育刻意挤占了所有学习时间，就会陷入一种令人难受的病态而难以持久，重新达成平衡的内在欲求会越发强烈。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是实现“强才智-强素质”不可小觑的原动力。不仅如此，教育实践中才智与素质的平衡是多元的、动态的，每个人的平衡点都不尽相同，在成长的过程中，平衡点也非一成不变。如何帮助学生实现才智与素质的多元平衡发展，也就是全面发展，我们回到了教育工作真正的初心和难题，下面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来阐明。

在每个独特个体特定阶段的学业中，根据他的身心发展特征、才性禀赋和志趣倾向，才智与素质应当如何配置，需要富有经验的教育者精细观察、沟通衡量，从而研判并制定恰当的平衡方案，实现个性化的培养。追求这种精心配置的因材施教正是许多家长的夙愿。理想情况下，学校教育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有针对性的培养，但终究不如家庭那样体贴入微。学校教育更无法取代的是对一个学生不计得失、“非他莫属”的父母之爱。个体层面才智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平衡会受到公共教育部门和政策的影响，却终究取决于家庭教育或家长信赖的机构教育。校外教育市场的兴起，代表着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家庭教育力量的延伸。重视教育的中国父母对孩子怀有一种终极责任感，不仅对孩子的潜力抱有最大的期望，还有责任对当前与未来的人生道路与社会境遇做出最诚实、最理智的判断，为孩子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教育上的权衡。比起学校，家长才具有终极主导权，学校的教育判断要起作用，得先过了家长这一关。在才智与素质的二维框架下，家长有理由做出最有益于孩子的清醒判断。其平衡的水平又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家长的见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源。

不同于家长的视角，国家教育制度与政策、

学校教育体系的设计则要顾及整体公共利益和有限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层面,人群的禀赋天性并非随机无序地均匀散布,而是形成类组,既有组内差异,更有组间差异。微观因材施教的奏效需要以师生大体适配为前提,教师很难应对一个禀赋异于其自身组类的孩子。教育力度的强与弱、超量与不足、平衡与失衡,都要根据所属组类相对而论。只有在对人的禀赋天性进行社会尺度筛选与分类的前提下,才能确定相应的才智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平衡标尺。因此,好的教育制度要致力于甄别应对组间差异,从而实现宏观尺度的因材施教。微观尺度的因材施教取决于家长、教师的个人水平与热情,宏观尺度的因材施教取决于制度化的大规模分类选拔的有效性。两者看似迥异,其实密切相关,如果后者失效,将使前者(个体的教育)陷于盲目和一厢情愿,导致教育失衡。强才智与强素质的目标之下,大规模考试、竞赛所能识别的才智水平有其关键的标定作用。

通过制度性的分类后,适应于一定强度才智教育的学生,应当匹配以相应的素质教育。有的人学得快,有的人学得深,各有短长,素质教育的实践空间来自教与学之间更好的适配、更高的效率。反观不平衡的教育现象,因才智教育过强而抑制了素质教育是一种误解,恰当的看法是,已经有了较强的才智教育,还缺乏相应的素质教育,为此需要进一步提高才智教育效率,充实素质教育供给。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抱持强烈的责任感不应被苛责。家长并非不懂教育或盲目反对素质教育。在前述多项日本调查中都可以发现,当学校教育有弱化迹象,家长就会努力弥补,导致家庭教育负担的普遍增加,同时,家庭背景差异还将扩大全社会的教育不平等。一名来自优秀县级中学的资深校长谈教育心得时说:“我们做素质教育首先要让家长放心,每年学生的成绩稳定保持优秀,家长就能放心让我们搞素质教育。其次,我们非常重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课业学习的效率,老师们为此花了大量的功夫,这样学生才有参与各种活动的时间精力。再者,依靠许多专业人士家长,

他们帮忙提供了科研、艺术、体育、社会实践等各类高质量的学习机会。”其实践经验与我们的论述十分契合。家长的态度需要被尊重,学校把才智教育做强为推进素质教育开辟了实践空间。如能以稳定的强才智教育为前提,很少有人反对素质教育。校内不足的素质教育资源可以通过外部力量来弥补,家长也以行动支持学校的素质教育。高效率的教学离不开生源的有效遴选。当师生适配,班级内差异较小,教学方式与进度便更有可能同时适合每个学生,效率自然提高。

七、小结与政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教育事业建设,我国基础教育总体上在考试可测的才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参与PISA等国际考试的地区成绩全球领先,近几代国民的整体学科素养也经受了中考和高考的检验,为各行各业社会经济部门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但同时,由于考试竞争激烈,仅以考试为目标的教与学带来诸多问题。为了改善现状,我国提出了素质教育改革。

通过本文一系列论证,我们提出只有“强才智-强素质”的目标才符合中国教育提质升级、科教兴国的愿景。素质教育改革应当采取强健的路线,在不降低学科知识标准、不放松才智挑战的前提下,设法提升各方面的素质。相反,如果把才智与素质的教学关系视作必然矛盾,在实践中放弃使之并存的努力,转而制度性地通过降低才智要求、削弱考试效力来给素质教育留出空间,结果既失去了强才智,也得不到强素质。

要使强才智与强素质在学校教学中并存确非易事,这份责任不能全部落在基层教师身上。素质教育的实现离不开有力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没有学会发达国家看似先进的教育理念,更不是基层教师没有领会贯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依旧是资源匮乏和高速发展下积累时间不足。那些长期富裕的国家所选择的教育理念未必有利

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不可盲目跟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学校教育远远不够，素质教育生长的土壤还普遍贫瘠。根据简单测算可知中国经济发达与欠发达的省级行政区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存在很大的不平衡，目前的学校办学标准和师资配置都谈不上符合素质教育的理想，全国基础教育资源的校际均衡水平尚不及日本的 20 世纪 70 年代。

眼下，政府推进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既不是考试改革，也不是课程改革，而是制定符合“强才智-强素质”理想的中小学办学最低标准，并通过立法和财政手段保障来落实。只有改善中国区域之间的基础教育投入不均，提升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教育领导力，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学校教育和办学功利化、竞争泛化的倾向。在科教兴国的总目标下，实现“强才智-强素质”的教育改革离不开一大批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均过硬的教师队伍。正如才智与素质的关系，教师养成中应首要强化学科专业水平，同时兼顾综合素养。如果不重视学科专业，哪种素养都不可能出色，也难以对学生和家长产生教育影响力。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各类大学培养的基础学科专业人才应当更多吸纳到基础教育师资队伍中去。

近年来，中国大学学术水平取得了整体提升，大学里已经发生的知识迭代、观念更新都应惠及基础教育。大学求真知，基础教育学校以知识育人，要以学科知识和学问品味为纽带，实现“大中衔接”。在知识体系充实与优化、学业标准的制定、教材教辅编写、考试命题等方面，大学教师值得担负起更广义的育人责任。

致力于“强才智-强素质”的教育改革还需要适宜的学校生态环境来孵化。近年来，教育评价问题受到关注。一方面，评价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细，评价项目和观测点越发详密；另一方面，评价的行政力度不断强化，评价结果越发利害关系，竞争性越发凸显。于是，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学校，为了“迎评”所需完成的任务越发烦琐，他们教与学的行动自由度变得越来越小。问题在于，素质教育的驱动

方式与才智教育的驱动方式有本质不同，行政评价主义的考绩与竞争能够促进后者，却不利于前者。以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建设素质教育无异于抱薪救火。不科学的过度评价导致基层只去做评价涉及的事，忽略教育中难以评价的方面，结果阻碍了素质教育发展。^[27] 驱动素质教育需要“休养生息”，使教师在日常工作中留有时间和精力做一些理想化的、不计成败的育人工作，唤醒教育的基层活力与创造力，孕育理想主义和因地制宜的创造力，给真正的素质教育留出生长空间。

为了防止素质教育改革滑向“弱才智”的陷阱，考试选拔制度仍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只要高考精神不动摇，在一流大学的招生录取中，学习成绩继续占据最大比重，那么我国基础教育的学术秩序就不会颠覆，“强才智”的基本优势便不至于松动。长期以来，严肃的考试研究被连篇累牍的应试教育控诉所遮蔽，缺乏实实在在的认识与技术进步。有一种误解是将考试功能泛化，由于考试的影响力显而易见，于是认为目前所有基础教育中的缺憾都是考试没能“指挥”到位。另一种误区是从本质上怀疑考试的有效性，不信任考试能够客观地识别才智差异。我们已经从原理上澄清，人的全面素质有的可考评，有的不可考评，所以考试不可能承载所有责任。考试能够给个人、国家与社会带来什么？考试制度是否恰当地发挥了其应有作用？为了建设与素质教育、考试制度兼容的发达教育体制，迫切需要对现代考试技术、教育评价方法、人才选拔制度做出与时俱进的研究。

《尚书》云：“君子所其无逸。”展望未来，当生活条件达到普遍的富足优裕，国家实现富强，人们不必为了改变生活处境而刻苦学习时，教育标准也不能后退、松弛。

注释：

①劳动教育混合了才智素质，即劳动技能，和德性素质，即参与劳动的品性和生活态度，

作为学校教育目标，应当主要侧重后者。严格地辨析，前者在本框架内归属于才智，后者归属于狭义素质。所以大体上将劳动教育归于狭义素质。身体素质虽然可测，但不具有制度性的社会竞争和成层价值。作为有限度的达标项，身体素质也不对其他素质构成相对消长的影响，因而归入素质维度。

②该研究操作化的传统教学方式：老师上课使用教科书、黑板来讲解；在课堂上当场做题、随堂小测验；课后布置回家作业。新学力观教学方式：在课堂上学生自己查资料学习；课上经常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课上学生可以选择自己要学什么；去教室外面参观、体验的课程。

参考文献：

- [1] [19] 王义道. 素质教育：回顾与反思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9, 17 (4): 58-74, 185-186.
- [2] 王策三. 保证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关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5): 59-84.
- [3] 孙凝翔, 林子. “麻烦治理”与无声革命：素质教育再审视 [J]. 文化纵横, 2018 (4): 116-125.
- [4] 瞿振元. 素质教育要再出发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7 (4): 26-29, 36.
- [5] 辛涛, 姜宇, 刘霞.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1): 5-11.
- [6] 周勇. 捍卫教育界的独立尊严与追求——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与高考结构调整 [J]. 全球教育展望, 2005, 34 (12): 11-13.
- [7] 周远清. 素质·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关于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改革的再思考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0 (3): 1-4.
- [8] 杜玉波, 赵长禄, 李和章, 等.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大力发展素质教育 (笔谈)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 (2): 7-12.
- [9] 怀特海. 教育与科学理性的功能 [M]. 黄铭, 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0: 18.
- [10] DENISON E F.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1962.
- [11] 克尔. 大学之用 [M]. 高钰, 高戈, 汐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50.
- [12] 黄达人. 关于高校深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思考 [J]. 中国高等教育, 2006 (1): 9-11.
- [13] 纽曼. 大学的理想 [M]. 徐辉, 顾建新, 何曙荣,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28.
- [14] 刘云杉. 自由的限度：再认识教育的正当性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6 (2): 27-62, 188-189.
- [15] 钟启泉, 崔允灏, 张华.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解读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6] 王策三. 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 (3): 5-23.
- [17] 姜伯驹. 新课标让数学课失去了什么 [N]. 光明日报 (教育周刊), 2005-03-16 (5).
- [18] 郭华. 新课改与“穿新鞋走老路”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0, 30 (01): 3-11.
- [20] [23] 荻谷刚彦, 志水宏吉, 清水睦美, 等. 調査報告「学力低下」の実態 [M]. 東京: 岩波書店, 2003: 11. 54.
- [21] 樋田大二郎, 耳塚寛明, 岩木秀夫, 等. 高校生生の生徒文化と進路形成の変容 [M]. 東京: 学事出版, 2000: 25.
- [22] 東京都生活文化局婦人青少年課. 東京都大都市における児童・生徒の生活・価値観に関する調査 [M]. 東京: 東京都生活文化局, 1999.
- [24] HANNUM E, ISHIDA H, PARK H, et al. Education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postwar expan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equalit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9, 45 (1): 625-647.
- [25] 谭建川. 困顿中的摸索：解读日本新一轮《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 [J]. 比较教育研

究, 2010, 32 (2): 29-32, 48.

[26] 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審議会. 幼稚園、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及び特別支援学校の学習指導要領等の改善について (答申) [EB/OL]. (2008-01-17) [2020-12-02]. 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0/

toushin/___icsFiles/afieldfile/2009/05/12/1216828_1.pdf.

[27] 钟启泉. 走向人性化的课程评价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0, 39 (1): 8-14, 20.
(责任编辑 吴潇剑)

Strong Intelligence and Strong Quality: New Understanding of Quality Education Reform

Lu Yi

Abstract: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quality education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has perplexed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for a long time. The general meaning of quality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part not involved in the examination in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is not only non-exam oriented, but also difficult to evaluate.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intelligence quality" two-dimensional model and two kinds of teaching reform path are obtained. With the help of the empirical data of Japan's "new concept of academic competence"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reveals the academic trap of "weak intelligence" teaching reform path and the cos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We should take the path of "strengthening intelligence and quality" to make the education not only serv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but also benefit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high level and balanced school running condi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is the necessary premise to realize "strong quality", and can ease the situation of excessive utilitarian education competition. Only by enriching the school education, increasing the selection system supply of the government, and improving the matching efficienc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can we create realistic conditions for both intelligence and quality.

Key words: Quality education; Examination system; Testability;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优化探析

闫雪琴 刘永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丰富, 特征鲜明, 并呈现出以人为本、互联网嵌入思维、全员协同教育、方式化整为零等新发展趋势。当前, 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网络思政教育需求与内容供给不足的矛盾、互动开放的多维沟通和单向灌输型教育方式的矛盾、网络思政队伍高标准要求与团队建设滞后的矛盾、网络思政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失衡的矛盾等。通过提升网络思政教育话语权、创新网络思政教育管理机制、建设高素质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队伍、优化网络思政教育环境等措施, 提升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实效。

关键词: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互联网; 挑战; 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12-0090-06

当今社会, 以互联网、信息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化时代”。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 互联网正在彻底颠覆人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 万物互联、万脑互联也正在实现。网络社会正在塑造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人类工作、生活新场域, 教育的概念、教育的定义、教育的生态环境、教育的形态、教育的方式、师生关系以及家庭关系等都发生了改变, 这颠覆了整个传统教育观念。^[2] 互联网也必将重塑高等教育的生态, 引发高等教育领域的巨大变革。在此背景下, 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以下简称“网络思政”)的理论内涵、教育内容、实施方式和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改变, 成为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内涵意蕴

思想政治教育是铸魂育人的工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体更加多元, 内容更为全面, 手段更为多样, 环境更为复杂, 其基本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拓展。本文所指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各主体运用互联网思维, 通过互联网平台和融媒体技术,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大学生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和信息素养教育等方面施加影响的实践活动。做好网络思政教育是促进现代网络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是帮助大学生抵御不良网络信息侵蚀的重要手段, 更是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渗透的有效回击。特别是新冠肺炎

收稿日期: 2020-08-26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生成机理研究”(17YJC710076)

作者简介: 闫雪琴, 女, 讲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刘永栓, 男, 讲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疫情发生以来,2020年上半年全国各高校几乎所有的教学实践活动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专业课教师实施网络课程教学,思政课教师进行在线思政课讲授,辅导员、班主任与学生在线互动交流,高校院系实行在线党建和思政工作等,这些都是网络思政教育生动写照。

1. 网络思政教育的内容

网络思政教育涉及用什么样的理论、思想和手段进行教育引导学生的问题,主要内容包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网络政治教育。强化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等重大问题的政治认同和实践教育。二是网络思想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三是网络道德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用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熏陶学生,营造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网络道德生态环境。四是网络心理行为教育。通过网络行为分析大学生思想和心理活动规律,将线上和线下思政教育相结合,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五是网络法治教育。引导和教育大学生学法、懂法、用法,坚决同网上不法行为做斗争,做网上守法公民典范。六是网络文化教育。教育引导大学生学习和传播健康积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远离腐朽低俗的不良文化,自觉做优秀网络文化的传播者。

2. 网络思政教育的特征

一是教育个性化。互联网互动、开放、共享、多元的网络特征,使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我学习,进一步激发了大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定制化服务的需求,需要探索构建多样化、精细型和个性化的思政教育模式。二是资源共享化。互联网为思政教育资源提供了存储和传播的网络空间,课程资源、教师队伍、教育活动等教育资源的共享,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全新教育体验。三是要素多样化。网络思政教育主体不仅仅限于高校,还包括新闻媒体、社会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教育内容不只要传统思政内容的讲授,还要解决大学生网络行为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教育载体也愈发多样,网站、微博、微信和自媒体平台等都是网

络思政的工作载体。四是网络渗透化。互联网对大学生学习生活进行全方位渗透,网络思政教育也呈现无处不思政、无时不思政的发展态势。

3. 网络思政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网络思政教育将精准定位教育人群,根据人群特征分配教育资源,形成定制化网络思政教育方案。网络思政教育过程也更加人性化,教育模式将从“大水漫灌”转化为“精准滴灌”,针对性和时效性空前提升。二是嵌入互联网思维。随着“互联网+”社会形态的加速演变,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环境的重要场域。互联网去中心、平等简约、开放互动、即时高效的特征深刻改变了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也将重塑网络思政教育生态。三是全员协同教育。网络思政教育不再单单依靠传统思政工作队伍,呈现全员化、全程化的发展趋势,全体社会成员将自然地成为网络思政教育的主体和受益人。全社会思政教育资源也将通过互联网得到充分利用,各方主体凝聚教育合力,最终形成责任明确、齐抓共管、覆盖社会的网络思政工作机制。^[3]四是方式化整为零。信息化时代,一切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都将被开发利用并深刻影响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将更加注重从微观角度加强教育内容供给,把思政教育内容细化为微小、细碎、随性的微文字、微视频、微课程等,通过点滴渗透、聚少成多,推动网络思政教育实践发展。

二、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近年来,网络思政教育发展已进入快车道,正在从幕后走向前台,从支流变为主流,从局部战场上升为主战场。互联网时代,网络思政教育面临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也为网络思政教育带来新挑战。

1. 日益增长的网络思政教育需求与内容供给不足的矛盾

互联网为大学生提供了海量信息和丰富教育资源。面对网络“信息大爆炸”,大学生信息获取呈现出盲从性、无序性、学习低效度等特征。网络空间不但是知识存储和传播的重要渠

道,更是国内外思想文化交融交锋的重要载体和前沿阵地。互联网世界充斥着各种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之风。面对网上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局势和西方自由主义表象合理化的思想冲击,迫切需要解决大学生“信仰什么,为什么信仰,如何认同和实践”的问题。因此,坚定大学生共产主义信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当前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高校承担着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双一流”建设、社会服务等多项任务,高校各主体往往更关注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思政教育任务中的硬要求,缺乏对网络思想问题的深层次剖析和合理解释,更很少关注到大学生个体对网络思政教育内容的现实诉求。同时,网络思政教育存在“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内容缺乏理念创新和现实价值的有机融合。思政教育工作者只是通过微信、微博等各类客户端,机械地将传统思政教育内容搬到网上。相较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网络领域无孔不入的思想渗透形式,传统思政教育空洞的理论说教难以得到学生的认同和共鸣,更难以调动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导致网络思政教育吸引力不足、互动不够、效果欠佳。

2. 互动开放的多维沟通和单向灌输型教育方式的矛盾

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削弱了大学对知识的垄断权威和大学场域存在的唯一性。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高校师生之间更多呈现出一种平等交流、双向互动、交互作用的关系。大学生个体不再满足于教师的单向传输,而是从网上汲取知识和精神营养,这也让大学生面临更多意识形态冲击和网络安全风险。知识虽无国界,但意识形态有国别。目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眼球经济”的挑战,网络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就要求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保持高频、深度沟通,构建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政教育新模式。虽然网络思政教育比传统思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互动性、感染力更强,但部分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仅仅将网络手段作为传统教育的辅助和工具,依旧把在线课堂授课、宣传

教育、交流谈心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式,师生交流频度不高、深度不够。同时,高校开展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具体方案和实践计划也缺乏组织性、系统性和针对性,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建设滞后,网站建设不完善,无法满足网络思政教育的现实和未来需求。

3. 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队伍高标准要求与团队建设滞后的矛盾

建立一支具有信念坚定、思维创新、素质高的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队伍,是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坚强保障。网络思政教育不仅要求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熟练掌握专业学科和思政教育知识,更需要善用网络语言,熟练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加强与学生的线上多维互动。目前,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主体主要包括思政理论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党政管理干部、学生骨干等。从现实情况看,他们虽然已经认识到网络思政教育的重大战略意义,但对网络思政教育规律的把握还不是很到位,部分人员对网络思政教育新场域的认知充满迷茫和无措感。加之部分人员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对网络技术手段的把握也还不够娴熟,导致网络融合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现象存在。此外,随着网络资源获取的便利性,网络教育也使得学生与教师处在不同时空环境,教师依靠知识积累所获得的原有传播权威被削弱,导致思政教育工作者面临场域转换的困境,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质量。

4. 网络思政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失衡的矛盾

互联网已成为影响高校思政教育的最大变量。如何对网络思政教育实践进行破题和闯关,是当代思政教育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随着网络思政教育实践快速发展,网络思政教育理论研究日益紧迫。但是,网络思政教育研究焦点大多并未脱离传统思政教育研究的框架,与传统思政教育的拓展和区划不清晰,研究层次不够深入,缺乏前瞻性的创新成果和高质量的实用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网络思政教育实践发展。目前,网络思政教育实践已经在高校呈燎原之势开展,各高校也产生了一批具

有先进性、可复制的思政实践成果，这迫切需要总结网络思政教育理论经验，站在更高的视野推动新时代网络思政教育理论创新，推动网络思政教育实践高质量发展。

三、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路径优化

面对高等教育变革新时代，高校要发挥传统思政教育优势，拓宽互联网思维，运用网络手段革新内容供给，提升网络思政教育话语权，创新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管理机制，建设高素质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队伍，优化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环境。

1. 提升网络思政教育话语权

结合互联网特征，优化网络思政教育内容供给，提升网络思政教育话语权。一是构建权威的网络思政教育话语主体。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网络思政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彰显话语主体的权威性。二是把控网络思政教育话语讨论内容。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引领网络话语主题，内容创作和议题设置凸显教育主旋律。^[4]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关注度高的媒体平台，增强主流话语内容的传播力。同时，注重分类收集网络舆情热点，通过帮助大学生分析阐释事件的来龙去脉，引导大学生认识事件背后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提高网络思政教育引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创新网络思政内容载体，增强载体新颖性、时代性和生活性。将网络思政教育与大学生网络交往有机结合，剖析大学生个体的困惑和问题，实现网络思政内容精准推送。将网络思政与大学生网络娱乐有机结合，将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的思政教育资源与学生分享，让大学生在游戏娱乐中潜移默化接受主流意识形态。

2. 创新网络思政教育管理机制

创新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管理机制，重新定位教育活动个体组成要素的功能、优化组织架构、理顺交互作用方式。^[5] 一是完善协调统一

的全方位教育体系。加强网络思政教育组织领导体系建设，成立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学院协同攻坚的网络大思政工作格局。建立线上和线下全方位融合的教育制度，线下做好网前教育和网后教育，线上做好教育过程控制，构建符合大学生身心特点的网络思政教育模式。二是拓展思政教育平台和渠道。将网络思政教育和传统模式有机结合，吸收传统思政教育优势内容，做到线上线下信息共享，形成线上线下的统一实践共识。同时，发挥新闻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的作用，建设好融媒体平台。三是创新评价激励机制。在职称评审、工作量考核、职位晋升等方面体现网络思政工作价值，强化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队伍的激励措施，夯实典型激励，塑造网络思政教育工作者扎实的敬业精神、专业的网络素养和敏锐的时代感。同时，对重点学生做好安全防控，防止学生个体的极端事件和极端行为发生。

3. 建设高素质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队伍

网络思政教育离不开一支兢兢业业、甘于奉献、奋发有为的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队伍。一是增强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强化网络思政教育工作者主体意识，站稳主体立场，保持主体定力。树立平等的思政教育观，了解学生网上心态和行为习惯，鼓励采用交流对话方式做好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二是加强素质能力建设。提高道德素养、职业能力素养和政治理论素养，将个人自学与组织培训、实践锻炼与理论学习相结合，让思政教育工作者在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实践上保持清醒头脑，熟悉互联网特点、掌握互联网技术、熟练与大学生进行网络沟通，培养一批网络思政教育理论学者、实践能手和网络达人。三是强化网络思政教育主客体协同。强化大学生网络思政主客体之间的协调，构建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秉承开放胸怀，强化网络思政教育主体之间的协同，促进网络思政教育的群体和个人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强化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与传统思政教育的协同，整合思政教育工作体系，实现思政教育各要素各环节的环环相扣、协同

前进。同时，激发大学生主观能动性，在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激发大学生自觉意识，鼓励大学生成立各种网络社团，培育学生网络思政骨干力量，推动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队伍整体发展。

4. 优化网络思政教育环境

面对多元、开放、复杂的网络信息空间，积极构建健康向上的网络思政教育环境。一是优化网络思政教育话语环境。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个人价值语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领导权和话语权。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宜“疏”不宜“堵”，创设多元文化共生语境，促进网络思政话语与外部话语共生发展。二是构建规章制度保障。规章制度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捍卫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根本保证。要完善网络审查机制，制定科学有效的网络思政教育监督规范和管控办法，加强对网络思政教育课程内容和形式的质量监控，对师生网络违法和失范行为进行惩戒。三是健全网络事件预警机制。做好网络思政教育预警，研判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及时向广大师生传达事件真相，做好舆情宣传引导工作。

总之，面对当前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新环境和高校思政教育新挑战，一方面，要将互联网技术、开放的信息资源、交互即时的信息传递等有效应用于思政教育工作实践中；另一方

面，更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去中心化、开放、共享、多元的文化形态，更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教育理念，创新高校思政教育实践。最后，在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实践中，聚焦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矛盾挑战，通过思政教育主体协同、内容优化、机制创新，真正将互联网思维与立德树人有效融合，将互联网技术与高校课堂教学有效融合，将网络思政教育与传统思政教育有效融合，提升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 [2] 顾明远. 互联网时代的未来教育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38（6）：1-3.
- [3] 胡树祥，谢玉进.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J]. 思想教育研究，2013，（6）：60-62，102.
- [4] 李超民. 新时代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04.
- [5] 左殿生.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11.

（责任编辑 刘红）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mproving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Yan Xueqin Liu Yongshuan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rich connot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ource sharing, education personalization, elements diversification, network penetration and others. It show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dhering to people-oriented, Internet embedded thinking, all staf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breaking up the whole into parts. At present,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fac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conten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teractive and open multi-dimensional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the one-way indoctrination education mod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high standard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m and the lag of the team developmen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master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ilding a high-quality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m, optimizing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ctual effect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s

(上接第 75 页)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Realistic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Pat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Meng

Abstract: In October 2020,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ublished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aesthetic education in higher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era, which pointed out clear requirements and reform paths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logical premise of the unity of ideological attribute with aesthetic independence, high knowledge with aesthetic emotion, academic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advanced nature of philosophy with reality of compensati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mismatch between inherent curriculum models and national top level design, and the lack of aesthetic evaluation index 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teachers. Only by breaking through these main problems c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hieve a leap forwar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Realistic dilemma; Curriculum system; Evaluation mechanism; Professional teachers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Vol. 276 No. 12 2020

Monthly

CONTENTS

- The Integr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reschoolers to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Cognition..... **Yu Guoliang** (3)
- Research, Judg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Liu Zaizhou** (12)
- Nurturing “New University of China”: Practical Direction and Route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ang Zhiqiang** (20)
-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Opening–up: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Jiang Kai** (28)
- Innovating and Reforming the Education of Foreign–related Outstanding Legal Talents **Guo Li** (38)
- Acceleration of the Promo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o 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Liu Sannyvya** (46)
- Research on the Intelligent Campu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Li Wu** (52)
-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ang Ming**(59)
-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Realistic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Pat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Meng**(68)
- Strong Intelligence and Strong Quality: New Understanding of Quality Education Reform **Lu Yi** (76)
-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mproving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Yan Xueqin & Liu Yongshuan**(90)

明德 笃学 励志 求真

20世纪80年代末，黑河学院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开启了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先河，先后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阿穆尔国立大学、俄罗斯远东国立农业大学等30余所高校开展校际交流和合作办学。2007年，学院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联合建立俄罗斯远东地区第一所孔子学院，走出了一条人员合理流动、优势教育资源共享的独具特色的国际化办学之路。

承担中俄教育合作与交流枢纽站的神圣使命，目前黑河学院已与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连续举办五期中国青年画家油画研修班，与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三期中俄音乐人才研修班，逐步拓展形成中俄合作交流为主、多国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办学格局。近年来学校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发挥“黑河学院俄罗斯远东智库”平台作用支持黑龙江自贸区黑河片区建设，在拓展人文交流、促进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学院中俄科技文化艺术产业园



省级重点实验室
——熔盐与功能材料实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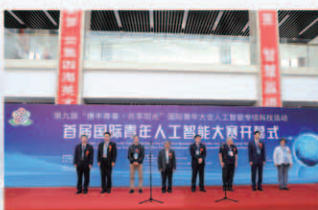
深化校地合作



俄罗斯音乐教授为学院
本科生授课



明德楼



首届国际青年人工智能大赛



“携手青春 共享阳光”
国际青年大会



孔子学院成立周年晚会

黑河学院



黑河学院

黑河学院始建于1958年，是中俄4300多公里边境线上我国境内唯一一所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历经2004年5月四校合并教育资源重组、优化，填补了区域本科教育的空白；2015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17年获批黑龙江省新增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学院目前在校生11400余人，建有40个本科专业，涵盖九大学科门类，本科教育体系化发展；建有俄语、绘画2个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3个省重点专业，4个省一流专业建设点；建有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个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校获批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中国侨乡文化研究中心”2个国家级科研平台，获批“黑河学院俄罗斯远东智库”“黑龙江省鄂伦春族非遗研究基地”等6个省级科研平台，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黑龙江省熔盐与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和省级TRIZ理论研究机构——黑龙江省TRIZ理论研究所。

空谷幽兰，不以无人而不芳；北国学府，不以地偏而心远。黑河学院人传承“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创新发展、育人戍疆”的办学精神，已把学院建成黑龙江北部边疆地区规模最大、学科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

沐新风而振奋，肩重任再启程，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黑河学院将继续高擎立德树人教育旗帜，立足北疆、服务地方、面向大众、突出应用，秉承“转型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五大理念，按照“十四五”发展蓝图，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大美龙江，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着的追求，努力建设国内知名的应用型、国际化、地方综合性大学，共同谱写黑河学院更加灿烂辉煌的崭新篇章。



统一刊号：ISSN1672-4038
CN11-5047/D

国内邮发代号：82-484 国内定价：15.00元
国外发行代号：M2076 国外定价：\$11.00元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京大工商广登字20170005号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